

【学习型社会研究】

- 我国老年网络教育发展十大建议 查代春, 罗军涛(3)
- 高职与电大开放本科学习成果纵向衔接模式应用研究——以江西广播电视大学为例
..... 黄林凯, 曾宪宁, 罗义(10)
- 大数据背景下安徽电大助推社区教育发展之探析 田红梅, 张文盛(15)
- 构建开放大学教师科研能力评价体系数学模型的研究 程海水(20)

【文史研究】

- 西方视域下中国妇女“下属群体意识”的差异性言说
——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寻茹茹(22)
- 基于现实的超越性——福克纳与莫言小说的地志空间创作分析 杨红梅(27)
- 军阀、媒介与政治宣传——从舆论宣传角度看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北归之行 张建冬(32)

【经济·管理】

- 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探索 朱沁瑶, 黄熾(37)
-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路径研究 何建功, 武永超(42)

【法学研究】

- 反腐倡廉漫画的图像语义建构:基于视觉语法的多模态分析 张丽(47)
- 青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的科学立法完善——以“扈强案”为切入 封韬(55)
- 民事伴侣关系立法模式的域外经验探析 朱琦(59)

【教育教学研究】

- 英美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封梦媛(64)
- 谷歌翻译与百度翻译APP的功能三维度之比较 涂正正(72)
- 中部地区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评价 阚大学(78)
- 大学生气质类型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刘华, 曾九江(87)

【职教实践】

-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情感教育对策 王永保, 许静(92)

Journal of Jiangxi Radio & TV University

Vol.20 No. 1 2018(Serial No.77)

Contents

- Top Ten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for Senior Citizens in China*
..... ZHA Daichun, LUO Juntao (3)
- Research 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Open Universities Opening Undergraduate Study Achievements longitudinal Connecting Mode Application --- Taking Jiangxi Ope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 HUANG Linkai, ZENG Xianning, LUO Yi (10)
- Analysis on Anhui Open University Boosting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Big Data*
..... TIAN Hongmei, ZHANG Wensheng (15)
- Research on Building Open University Teacher Research 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Mathematic Model*
..... CHENG Haishui (20)
- Difference Discourse of "Subordinate Group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Women on the Horizon of the West --- Review on Dangerous Pleasure ---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 XUN Ruru (22)
- Transcendence Based on Reality - Topology Space Creation Analysis of Faulkner and MO Yan's Novels*
..... YANG Hongmei (27)
- Warlord, Medium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 Review on WU Peifu Disarming from Hengyang and Moving Back North in 192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ensus Propaganda* ZHANG Jiandong (32)
- Reform Exploration on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Rural China*
..... ZHU Qinyao, HUANG Yan (37)
- Metho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Elimination in Minority Areas on the Horizon of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HE Jiangong, WU Yongchao (42)
- Image Semantic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Bid Caricature: Multimodal Analysis Based on Visual Grammar* ZHANG Li (47)
-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egislation of Teenager's Age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 Taking "the case of HU Qiang" as the Pointcut* FENG Tao (55)
- Analysis on Foreign Experience of Legislation Pattern of Civil Partnership* ZHU Qi (59)
- Inspir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Teenager Education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on China's Education* FENG Mengyuan (64)
- Three Dimensional Comparisons in Applications of Google Translation and Baidu Translation*
..... TU Zhengzheng (72)
-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in Undergraduate Colleges of Central Region* KAN Daxue (78)
- Empirical Analysis on Effects of Temperament Type of Undergraduates on Employment*
..... LIU Hua, ZENG Jiujiang (87)
-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motional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Five-year Higher Vocational Left-behind Student* WANG Yongbao, XU Jing (92)

我国老年网络教育发展十大建议

查代春,罗军涛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发展老年网络教育,为老年终身学习提供服务,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基础。通过对老年网络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老年人信息素养不高、适用的网络教育资源不足等诸多问题的剖析,提出发展老年网络教育的十大建议。

关键词:老年网络教育;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G724.8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2000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6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8亿,占总人口的35%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国家。^[1]

老龄化趋势是世界性难题,而老年教育是解决这个难题的重要方法。许多国家通过兴办第三年龄大学,推动社区老年互助学习,倡导老年人利用网络开展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发展老年教育。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老龄问题日益显现,老年教育有利于将老年人口压力转化为动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积极老龄化,在解决老龄社会问题,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彭文勤^[2]、平利珍^[3]、鞠健^[4]等研究认为,老年教育是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重要途径,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价值;提高老年人口素质,有利于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释放老年人口红利;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需要,促进社会和谐;黄燕东认为,老年教育应具备福利,救济与投资的功能。老年教育是老年人的福利通道,提供给老年弱势群体的救济通道,成为老年人提高就业能力的一种手段。^[5]

然而,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各类老年大学、老年学校仅有5.4万所,在校学员710.2万人,而同期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23086万人,获得老年教育服务的人口仅为3.07%。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许多老年人对目前老年教育的开展情况不满意,当问及为何不满意时,主要是老年教育设施和机会缺乏。显然,当前老年教育覆盖面较小,地区间、城乡间老年教育业发展不平衡,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教育需要,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矛盾非常突出。

一、老年网络教育的涵义、形式和内容

1. 老年网络教育的涵义

老年教育是针对老年人开展的教育活动,是

[收稿日期]2017-12-11

[作者简介]查代春(1972-),男,江西都昌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远程开放教育,开放大学建设等。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35.html>

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实现再社会化的提供的一种教育服务。老年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范畴,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文献中也称老龄教育、老年公民教育、第三龄教育等。国际上如日本的老年教育主要分为老年大学和随班就读的老年班两种形式,美国的老年大学形式主要有各种讲座、学习班、老年学校、老年学院和老年大学。^[6]

由于传统的学校老年教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教育需求,运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举办老年网络教育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举措。老年网络教育是指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的老年教育的一种形式。老年教育包括老年学校教育、老年社区教育、老年网络(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其中,老年网络大学、老年开放大学是举办老年网络教育的主体。如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上海老年开放大学、浙江老年开放大学、江苏老年开放大学等。我国老年网络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以非学历教育为主。

2. 老年网络教育的内容

老年教育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目标,公益性、休闲性、多样性是其主要特点。王英认为其特征包括:福利性和公益性、非正规性,自助性以及自主性。^[7]利用互联网举办的老年网络教育与传统的老年教育的内容大致相似,丰富多彩,充分满足老年人的个性需求。

从国际上看,老年网络教育主要包括身心休闲和健康教育,退休准备教育、死亡教育、生活调试教育等。国内老年网络教育一般以文化课程、文艺课程、卫生保健课程为主。有些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老年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能够结合老年人心理,生理特点或兴趣开设有关课程,如卫生保健、体育、营养学、园艺、书法、美术、摄影、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但大部分老年教育机构受师资、场地、经费等限制难以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和需要来安排教学。一项有关老年远程学习的调查表

明:老年人开展远程学习的物质条件已基本满足,老年人大多学习医疗保健和旅游度假方面的知识,主要凭个人兴趣学习。^[8]

二、当前我国老年网络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传统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网络老年大学发展缓慢

我国的老年大学主要设置在省、市、县三级。县以下基层老年学校普遍存在机构不健全、办学条件不足,场地与师资紧缺,招生办学规模有限等问题。从媒体对老年大学报名场面火爆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年大学常常是一座难求。与现在的老年人数相比,老年大学的数量、招生规模和办学能力无疑是杯水车薪,老年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非常突出。^[9]调查显示,当前有愿望参加老年教育学习的老年人约占全体老年人总数的20-25%左右,现在的入学率与老年人的学习需求相比,其供给缺口很大。老年大学等老年教育机构尚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需要更多的老年教育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平台。^[8]

但受制于办学历史和资源投入不足,当前传统老年大学举办老年网络教育的能力不足,发展缓慢,而政策导向和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得其它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发展老年网络教育的动力不足。

2. 老年网络教育发展不平衡,办学网点分布不合理

我国积极推进老年教育形式的变革,从发展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到利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老年开放大学,开展老年网络教育等,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阶层老年人的教育需求。但是因为我国老年人的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城区、区域差异大,很多地方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许多老年人缺乏必要的计算机网络操作能力等,使得老年网络教育发展受到一定局限。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1.4%的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而多达78.6%的老年人是从来不上网的(2015)。互联网并没有在

中老年人群体得到普及,大多数中老年人被隔离于网络世界之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差异,我国老年网络教育发展存在城乡、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异大,大城市与乡镇农村差距明显,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的市、县、乡镇以及农村老年网络教育资源极其缺乏。据统计,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超过六成。由于农村老年人大多经济状况不好,经济独立能力相对较差,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温饱和健康问题,加上农村老年教育机构缺乏,老年网络教育设施更是凤毛麟角,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更难获得老年网络教育服务。

3. 老年网络教育资源适用性不强

当前老年网络教育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类别不丰富,不能满足多样化的老年教育需求。从现有的网络资源看,许多免费提供的老年网络教育资源主要是文化普及,养生保健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适合老年人开展网络学习的资源不多,加上各类学习资源尚未进行有效整合,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而且,老年网络教育资源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文本资源多,音视频和动画资源少,在线教学录像和视频课件大部分是教师课堂授课的再现或是文本教材的电子翻版形式。能够满足老年人特定需求,有针对性、个性化的网上学习资源不够。

健康知识是许多老年人想学习的内容,这一点通过老年人对健康养生电视节目,以及各类健康养生讲座的热衷程度可见一斑。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他们希望参与增强生活技能,提高生命质量,丰富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关学习,尤其是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课程内容。当今,互联网深入到经济社会与生活的各个角落,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的知识技能成为很多老年人特别渴望学习的内容。

4. 管理体制不顺,老年网络教育评价标准缺失

当前,宏观层面关于老年教育政策较多,但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则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和办法。老年网络教育的经费保障、管理体制、质量评价、激励考核等方面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且无相应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对老年网络教育的办学成效以及老年人的网络学习缺乏测评标准和办法,导致老年人参与网络学习的成就感偏低,缺乏有效激励举措,社会和政府投入支持老年网络教育发展缺乏动力。

我国老年教育管理体制处于边缘化、碎片化状态,没有明确负责规划、管理的部门。^[9]如老年大学主要是由老干部局主办,按照事业机关进行管理,部分老年学校则由民政文化部门主管,民政部门也将审批老年教育机构则成为老龄福利政策的一项内容。管理体制不顺,导致老年教育与国民教育体系协作不够,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老年网络教育持续发展乏力。

5. 老年网络教育师资力量弱

当前,我国老年教育师资队伍的数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能熟练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老年网络教育的教师更是缺乏。由于老年网络教育机构基本没有专职教师,而聘任的教师则难免有“过客”心理。由于待遇较低,对专业教师的吸引力小,老年网络教育往往难以找到好教师,且其教师队伍人员也不稳定,无法保障教学质量。

尽管老年人在学习中对师资并无太高要求,更重视的是参与学习带来的快乐。^[11]但老年网络教育师资队伍力量薄弱,导致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学习活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容易挫伤老年人的学习热情,影响学习的成就感等。

6. 老年人网络学习能力不高

我国早期老年大学主要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低学历群体出于自身素质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未能成为老年教育的主要对象。因此,学员文

化教育水平较高,主要以具备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为主,各项教育活动开展,学员的积极性、参与程度都较高。随着老年教育对象向企业退休、下岗工人、乡镇及农村老人的拓展,受教育对象的文化水平较低,将对老年教育带来新的挑战,“马太效应”更为突出。国际上关于终身学习教育项目中的“马太效应”(所谓“马太效应”,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显示,那些已经受到最好教育的人们参与到成人教育项目中的程度,比那些只有较少学校教育经历的人要大的多(Illeris, 2004)^[12]。我国的老年教育也存在这一现象,即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更愿意参加老年教育,而受教育水平低的老人则对参加老年教育的参与度较低,许多农村老人和城市退休工人等接受老年学习的意愿较弱。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学习理念越强,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高于初中、高中和中专学历的老年人。^[8]

老年网络教育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信息素养及文化基础,能积极主动地接收、理解和消化所学知识,克服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然而,由于我国老年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了绝大部分,大部分潜在的老年学习者因为文化基础弱,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查询、获取资源和学习支持的能力不够,缺乏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能力。

此外,我国老年网络教育还存在网络教育资源整合共享不足,教育系统参与严重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网络教育课程的系统性程度较低、学习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13]

三、老年网络教育发展的建议

1. 建设老年教育网络学习平台,提供学习渠道

按照“教育养老,学习修身”的理念,设计开发集在线学习、自助考核、新闻资讯、便民信息、志愿服务于一体的老年学习门户网站,使之成为老年人的网上学习、网上娱乐、网上交友的学习平台和精神家园,成为老年人发展兴趣爱好,交流学习心得,

联结学伴友谊的平台,成为老年人融入现代信息生活的重要入口,并且成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开展自主学习、接受继续教育的新途径,宣传老年网络教育特色的重要窗口。网络开设针对老年人特点的在线听书,看报纸,听戏曲,测健康,视频课程等栏目,支持多渠道、多终端访问,使老年学习者可以通过电脑、手机、IPAD、数字电视等不同终端进行访问。

考虑到老年人视力不好等问题,老年学习网的网页文字可采用了大号字体,让老年人不用放大镜、老花镜,也能看清楚网页内容,并增加手写输入、语音输入等方式,方便老年人进行文字输入,开展信息搜索和网络交互活动。

2. 健全老年网络教育支持服务体系,加强线下学习支持

大力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完善网点布局。发挥老年大学、开放大学(电大)等不同办学系统的优势,形成由“省老年大学、地(市)老年大学、县(市)老年学院、乡镇(街道)老年学校”构成的老年教育支持服务网络,使有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的老年人基本都能享有不同形式的老年教育,获得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一座难求”的现象基本得到缓解。如丹麦为方便农村老年人接受教育,在教学场地和活动范围的选择上,主要在农村老年人群居或易于集中的地方,如图书馆、教堂或老人的家中。^[14]

构建泛在学习空间,方便老年人的跨空间学习,享受到先进的,较高水平的老年教育。充分利用微课、MOOCs、视频分享等新技术、新方法,有效促进老年人享受互联网文明发展的成果,满足不同居住地和不同文化层次的老年人学习、生活和娱乐需求。推进网上学习与线下辅导,家庭自学与学校教学,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等多种形式并存,促进老年人学习,生活和休闲娱乐的有机结合。通过完善网点布局,建立老年协作学习小组,班级学习微信群,使老年人学习过程中获得更

多的支持。结合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开发养生、休闲、艺术、营养、护理、游戏、智能手机等技能培训项目,实现线上输送课程,线下组织活动互动。

3. 建设老年网络教育学习资源库,满足不同形式的学习

开发适合老年人开展网络学习的课程专业教材资源,充分整合国内外优秀的老年教育资源,建设老年网络教育资源库。

老年网络教育资源开发要考虑到老年人的需要和兴趣特点。如,为便于老年人学习健身,养生的知识与技能,可开发健康养生类课程资源;为满足老年人兴趣爱好,开发艺术休闲类资源;针对老年人提升信息素养和技能的需要,可开发信息技术与科技应用等课程等。针对老年大学女性学员不断增加的状况,可适量增设女性老年人教育相关课程。

针对老年人的网络课程资源,还必须考虑到老年人的身心特点进行设计,如,字体不宜太小,语速不宜太快,适当控制画面变换节奏,每节课程主题突出,增加分享和求助功能等。每门课程应设计开发2种以上的资源形式,既要有印刷材料,也有多媒体资源,包括纸质书籍与广播、电视、网络和微视频等多种媒体材料,方便不同老年人的选用,让老年学习者既可以“看书”,也可“听书”,或通过“课件”学习;既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平板APP、电脑、网站等进行学习,也可以借助广播、电视、纸质材料进行学习。

4. 发挥“移动互联网+”优势,满足随时随地学习需求

相对基于计算机网络的老年教育因覆盖面以及技术壁垒等原因受到一定的限制,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手机的普及,使得老年人利用手机等移动工具开展移动学习,满足学有所教的夙愿成为可能。移动学习的泛在性、个性化对于那些不知如何选择学习内容,不知能否适应学习生活,又不便参与学习活动的老年人来说,从时间上和

空间上给予他们一个选择、适应、接受的过程,可以增加学习安排的灵活性,丰富性和自主性。“移动学习”让教育信息和文化知识的传播更加迅捷,更加开放,有利于建构信息共享的公平环境,扩大老年教育供给,使更多老年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

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教育服务。包括:提供适用的个性化学习资源、学习支持服务等,奠定老有所学,学有所教的意愿和基础;提供人际交流,沟通提供渠道,以为老年人排解孤独、寂寞,满足老有所乐、乐有所在的精神需求;提供完善自我的平台,帮助老年人提升能力和素质,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等,培育老有所为、为有所能的素质基础。

5. 创新老年教育形式,满足各类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改变单一教学模式,确立自主学习、网络教学和面授辅导相结合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老年网络学习平台,支持老年人通过手机微信、平板APP、电脑微学网站等开展学习。支持发展老年学习团队,积极培育老年网络学习圈,加强对老年人自主学习的指导、支持与服务。通过办学类型、教育途径、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改革,创新体现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群需求的教育模式。

围绕老年人群的需求和特点,开设面向老年人的各种课程,开发包括书法、绘画、国学、红色经典,以及电脑、智能手机、钢琴、舞蹈、太极拳、健康养生等各种培训和游学项目。通过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体系(俗称“学分银行”),搭建老年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衔接和融通平台,为老年学员建立个人学习帐户,所有学习结果记入本人学习帐户,实现老年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并探索建设一批适应老年人学习特点的学历教育专业,为部分老年人圆大学梦。

6.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老年网络教育质量

积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将热爱老年教育事业、有专长的人才充实到老年教育师资队伍中来,组建由法律、政策、医疗卫生、生活保健,以及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老年教育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老专家的专业特长和优势,发掘和选择老年学员中有一定特长的人来担任临时老师,讲授相关知识,为老年教育提供服务。

老年网络教育师资建设过程中,还应注意把好入门关,明确应聘对象的职责、任职年限、工资待遇以及应达到的教学效果等。加强对教师的各方面考核,促进其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并加强对老年网络教育教师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保障老年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职称评聘、薪酬福利、绩效考核等的待遇和权利。

7. 理顺管理体制,推进老年网络教育终端延伸

不断完善老年教育法规和政策,理顺老年网络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由教育部门为主要责任机构,由民政部门、文化部门以及财政部门协调开展工作的老年网络教育管理体制。

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末端,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老年网络教育,要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现有的终身教育网络平台,依托各级开放大学(电大)系统,完善老年网络教育终端体系。以“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为依托、“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为根据,推进养教结合,把老年网络教育纳入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体系,实现老年网络教育的“三个延伸”,即向城乡社区延伸,向高等学校延伸,向企事业单位延伸,丰富中国特色的老年网络教育体系。

8. 完善评价体系,建立老年教育激励机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老年关爱服务体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老年教育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主要举措,也是完善老

年关爱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同时,形成学习型社会需要广大老年人群积极参与,满足老年人的教育需求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发展老年网络教育,作为完善社会服务,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政府应建立和完善老年教育评价体系,激励社会各界对老年教育的投入热情。

构建老年网络教育评价体系,要综合考虑到老年教育的目的和特性。老年网络教育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活动,以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为使命。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采取多种形式,广开渠道,促进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老年教育这一途径惠及全体老年人。^[15]老年教育的质量观是服务型的质量观,强调的是老年教育机构的服务质量。老年网络教育的质量标准与普通教育不同,强调服务性的质量标准,更多以老年人学习的满意度为目标。

9. 加强理论研究,促进老年网络教育持续发展

老年网络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老年网络教育的基础理论、政策举措、应用实施等方面的研究。老年网络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探索老年网络教育的本质、特点、目的、价值、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为老年网络教育实践发展奠定基础。老年网络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为政府老年教育发展规划制定,政策实施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老年网络教育应用研究,主要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创新老年网络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更好指导老年网络教育和教学工作。同时,加强老年网络教育学术期刊建设,搭建优秀成果共享和推广平台,组织开展老年网络教育优秀成果评奖和表彰活动,为促进老年网络教育研究创造有利条件。

10. 营造氛围,支持老年教育发展

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老年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各地老年网络教育的典型经验、做法和成效,促使广大群众更多地关注和了解老年网络教育发展,为老年网络教育工作奠定良好的社会基

础。充分调动老年人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培育老年学习文化,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老年网络教育的浓厚氛围,树立老年友好型社会理念,使学习风尚融入老年人的生活。

四、结束语

面对日益加快的老龄化社会进程,我国的老年人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老年教育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前提和基础,接受老年教育,实现老有所学有助于老年人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发展老年网络教育事业,是我国加快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享有更好的老年教育是每个老年公民的权利。通过大力发展老年网络教育,努力让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均有接受老年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是促进教育公平,完善老年关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当前基层、社区、农村缺少老年教育供给的现状,优化城市与农村、城区与社区之间的老年教育的空间布局。

当然,发展老年网络教育,既要遵循老年教育规律,也要遵循网络教育规律,不断创新理念、拓展内容、完善模式,以人为本,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学习渠道、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更加自主开放的学习方式,满足各类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

参考文献:

[1]李亮亮.聚焦中国式养老:多种方式应对老龄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yanglao/2015-](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yanglao/2015-11/24/c_128459375.ht)

11/24/c_128459375.ht

[2]彭文勤.浅谈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J].科技致富向导,2009(24):20-21.

[3]平利珍.浅谈新时期老年教育的发展现状及思考[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2013(03):57-60.

[4]鞠健.浅议人口老龄化与发展老年教育的必要性[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3):116.

[5]黄燕东.老年教育:福利、救济与投资[D].浙江大学,2013.

[6]万军.美国的老年大学管窥[J].老年教育(老年大学),2014(10):22-23.

[7]王英.中国社区老年教育研究[D].南开大学,2009.

[8]孙传远.老年人远程学习现状调查研究——以上海老年人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2013(12):41-46+96.

[9]张昊.我国老年大学教育的成就、问题及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16(14):121-124.

[10]娄峥嵘.国外老年教育政策的分析与启示[J].继续教育研究,2012(8):101-103.

[11]黄健,吴真.教育公平视域下老年教育的发展研究——基于上海老年教育的一项实证研究[J].当代继续教育,2016(4):8-15.

[12]克努兹、伊列雷斯著.孙致璐译,我们如何学习——全视角学习理论(2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13]杨淑珺.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与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职教论坛,2016(27):61-65.

[14]刘洪林.丹麦农村老年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成人教育,2015(11):92-94.

[15]曲玉萍,杨奇.论老年教育的困境与出路——以吉林省为例[J].老龄科学研究,2015(5):62-70.

责任编辑:罗义

高职与电大开放本科学习成果纵向衔接模式应用研究

——以江西广播电视大学为例

黄林凯,曾宪宁,罗义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当前,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多项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工作都在各地开展,本文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习成果纵向衔接的经验,对高职与电大开放本科学习成果的衔接模式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学分银行;学习成果;纵向衔接

中图分类号:G724.82

文献标识码:A

自2012年国家开放大学启动学分银行体系的研究与建设工作以来,我国对学分银行的研究与建设工作逐步重视起来,国家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比如,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惠及全民的终身教育培训体系。推动各类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办好开放大学,……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分转换互认。”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里也提出,建设“学分银行”,实现学习成果积累和转换,加快学习成果认定,制定学分转换标准,对学习者在正规教育 and 非正规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学分、证书、工作和生活经验及技能等进行认定,确定学分,实现学习成果转换。主动沟通高校、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通过协议或联盟等方式,推进相互之间学习成果的互认。

实践方面,除国家开放大学外,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云南省、福建、河南、四川、浙江、湖南、吉林、陕西等地都逐步开展学分银行建设和试点工作。江西省也启动了面向普通高校的课程转换试点。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国家开放大学第一批认证的学习成果认证分中心,开展了多项学分银行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试点工作。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试点工作方案》,我们以高职(江西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与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试点专业,在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框架的基础上,探索电大开放本科对高职学生的学习成果认证。

一、高职与电大开放本科学习成果纵向衔接认证主要内容

通过对高职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与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成果的梳理,我们认为,在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电大开放教育本科对高职学生的学习成果认

[收稿日期]2018-1-3

[基金项目]国家开放大学课题(G16A2113Y)

[作者简介]黄林凯(1977-),男,福建仙游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远程教育,学分银行制度。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36.html>

证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高职学生获得的证书类学习成果进行梳理、比对和认证,与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课程学分对接。

2、对高职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省级、国家级等竞赛奖项类学习成果进行梳理与对比,与电大开放教育本科实践学分对接。

3、对高职学生在校期间的企业实践经历进行认定,与电大开放教育本科实践学分对接。

4、高职与本科课程学分的纵向衔接。

国家开放大学现阶段学习成果框架共分10个等级,各个等级由一套学习成果等级指标加以描述。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框架中的学习成果分属于20个行业领域。同时,根据学习成果的不同呈现形式,可将其分为学历教育学习成果、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和无一定形式学习成果三种类型。

我们认证的学习成果类型包括了上面所有的三种类型。对于学习成果框架现有的转换规则,可以直接应用,但是目前的标准和框架,还无法覆盖我们当前所有的学习成果认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经验来探索如何在不同教育层次之间进行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事实上,国外资历框架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以新西兰为例,该国初期的资历框架就没有将国内公立大学纳入其中,直到第二阶段8所国内公立大学才加入认证体系。综观当前比较成熟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比较典型的是基于资历框架的和基于协议的认证体系。加拿大的BCTS体系、美国的AP课程认证和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学习成果认证方式对于纵向学习成果的衔接都是较有参考价值的范例。

二、新西兰与英国资格框架与启示

以新西兰为例,NZQF资格框架主要基于学习成果的,以资格为基本单位,每一种资格都是通过对一组针对特定目标的学习成果的正式认证,由低到高共分十级,其中所有的资格都必须有如下几个要素:质量保证主题、资格的标题和详细说明、资格定义的类型和级别、分配的学分值、主题分类、状态说明(运行、过期、中止等)。

NZQF资格分配学分与学习者通过测试完成学习目标所要花费的时间相关,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分配学分值的多少。学业成绩通过考试来评定(External Assessment),也有部分科目通过授课老

师来评定(Internal Assessment)。NZQF规定1个学分等同于10个名义学时(notional learning hours)。

名义学时主要包括:面授的时间、学习花费的时间、完成作业及实践任务的时间、学习评价花费的时间等^[1]。

英国也是采用统一的资格框架进行学习成果认证。在2008年英国开始QCF资格框架中,资格由学习单元(units)组成,这种方式为学习获取资格的形式提供了灵活性。主要包括:

学习单元:每个学习单元分配了学分值,QCF框架中的学分与NZQF框架一样,也代表在一般情况下,学习者完成一个学习单元或获取一个资格需要花费的学习时间。通常情况下一个学分需要花费10个小时学习的名义学时。

资格:QCF框架中每一个资格由一组学习单元构成。QCF资格分三种类型:资格认定(Award):要求1-12学分;资格证书(Certificate):要求13-36学分;学位文凭(Diploma):要求至少37学分。

在QCF启动后的四年间,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不同类型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还存在问题,资格的质量下滑等,因此2015年,英国用改进的RQF资格框架全面取代原有的QCF框架。RQF与QCF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不再刚性规定学时要求,而是用资格总学时(Total Qualification Time)来描述资格,此外还给出了最大指导学时和最小指导学时,体现个性化的差异。^[2]

在基于学习成果的资格框架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中,名义学时是一个充当“中间货币”的重要变量,基于名义学时分配的学分相当于一种“时间本位”的兑换中间货币,使得不同学习成果间的认证有了比较的基础。但是我们从英国资格框架的演变可以看出,RQF的学时要求已经有了较大的弹性。此外,学习成果的要求和学时并不能完全反应教学质量,在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质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社会声誉相差较大的学习成果互认也存在很大的障碍。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资格框架的建立与完善,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当前情况下,对于纵向学习成果的衔接,还不能完全用基于学习时间的学分来评估。

三、欧洲ECTS学习成果认证体系与启示

欧洲的ECTS学习评价体系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最早,也是欧洲唯一经过实验证明比较成功的

高等教育学分体系,是基于协议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的典型代表。

ECTS学分的评价标准是基于学生学习工作量(也称为课业负荷量(workload))的评价体系。为了便于欧洲各国学分的比较与互认,ECTS制定了统一的学分标准,ECTS学分是为每个课程单元分配的整数数值(1-60之间),代表了学生学习该课程单元所需的工作量,学生的工作量包括完成教学计划的全部要求(包括课程、学位论文、工作实习、实验室工作等)需要的所有时间^[3],1学分对应于25-30小时的学习工作量。

ECTS为使学习成果认证所需信息不同机构之间更好地传递、共享,设计了专门的系统,主要由信息包、学习协议和成绩档案三个核心要素组成。

ECTS认证的运行主要基于三个核心元素:信息(关于学习计划和学生成绩)、学习协议(合作组织与学生之间)、ECTS学分的使用(说明了学生的工作量)。这三个核心要素主要通过使用三个关键性文档来运行:

(1)信息包

信息包在ECTS运作的各个阶段中都不可或缺。每一个ECTS成员机构使用信息包为合作机构、学生、合作机构的教职工提供课程、学术以及行政安排等方面的指引。

(2)申请表格/学习协议

学生可通过查阅留学目的学校信息包,并咨询所在学校ECTS联络员以确定自己的去向及将来的学习计划,然后填写申请表格,签署与本校及留学学校之间的三方协议。若计划去多所学校留学,需要与每个学校都签署相应的学习协议。

(3)成绩档案

学分在ECTS体系之间的转换主要依靠交换转出学校与接受学校之间的学习成绩档案,反之亦然。对于学生来说,成绩档案既是为其转换ECTS学分,进行一体化学术认证(full academic recognition)的主要文档,也是为其将来就业提供海外留学的证明。^[4]一体化学术认证是伊拉斯莫和苏格拉底体系中学生学习成果互认的必要条件,指的是学生留学期间的(包括考试及其它形式的学习评价)替代一段原就读学校的学习时间内相对应的(包括考试及其它形式的学习评价),即两个可能不尽相同的学习计划的相互替代。

对于学分授予,ECTS为每个课程单元分配了

学分,但是只有当学生满足课程评价要求时,他才能获得学分。换句话说,如果学生在留学期间仅仅参加学习是不能获得学分的,他们还必须满足所在学校的学习评估要求以证明他们完成了课程单元的目标。评估过程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如笔试、口试、课程作业、多种方式结合的测试如研讨会的展示等,所有这些都应包含在信息包中。^[3]

ECTS的认证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将两种基于课业负荷量的,且并不完全相同的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整体替代,欧盟对于留学经验的重视是根本原因,它展现学习成果的认证与转换的另一种形式的“等价交换”。这说明,在特定的愿景和条件下,学习成果的认证对于教学内容的差异要求可以最小化。

四、纵向学习成果认证的案例与启示

(一)BCTS学习成果认证体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BCTS体系标准是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招生转学委员会”(British Columbia Council on Admissions and Transfer,简称BCCAT)的指导、管理及协调下,由各专业或学科认证委员会及BCTS体系内的39所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参与而产生的一系列学分转换协议构成,学习成果认证的主要目标是使二年制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的无缝衔接。

BCTS体系认证的主要类型有三种:双边课程认证、多边课程认证及组块学分转换^[5]。双边课程认证主要是两所学校之间对课程内容和评价标准一致的课程的学分互认,多边课程认证则是多所学校基于共同开发的课程标准对相互间等价的课程的学分互认,组块学分转换则是对学生获取一个证书、文凭或成功完成一组课程授予一整块的学分。

BCTS体系的设计初衷就是为边远地区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因此,它从开始就是为了学习成果能够纵向衔接而设计的,这种模式既体现了学习成果在纵向认证过程中教学内容与学习评价的一致性,双边或多边认证协议也为彼此认可对方教学质量的学校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

(二)阿萨斯卡大学的学习成果认证与转换

加拿大的阿萨斯卡大学,可以对学生以前的教育经历和经验进行认证和学分转换。主要有单门课程评估、组块学分转换(block transfer),后文凭(post-diploma)或第二学位等。

对以往学习成果认证的时限要求:

通常对以往学习成果并无时限要求,但对时效性较强的课程中,分别有不同的时限规定,比如5年以上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学习成果,就不能申请学分转换。例外的情况是:如果学生之前的学习成果超过5年,但仍然活跃在相关领域,那么需要在申请学分转换时提供雇主推荐信或职业会员资质证明等材料。

如果学生已经拥有一个大专以上文凭或相关资格证书,最多可以申请转换到50%的专业学分,但新申请专业必须与原专业不同。阿萨巴斯卡大学与许多2年制社区学院签署了学分互认协议,学生可以组块学分认证的方式将学分整体转换到阿萨巴斯卡大学。^{[6]104-108}

阿萨巴斯卡大学在先前学习评价方面做得比较有参考性。先前学习评价是指对在学历培训和正规教育项目之外所获得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和认定,与国家开放大学认证体系中的无一定形式学习成果的认证有着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阿萨巴斯卡大学先前学习评价的内容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作年限、参加过工作坊的数量、职位、为准备档案袋材料所耗费的时间或精力。

阿萨巴斯卡大学主要采用档案袋评价和课程挑战模式对先前学习经验进行与评价。

档案袋评价主要由学习者提交能够展示自己在非正式学习过程中获得的项目档案和课程学习成果,以及阿萨巴斯卡大学对学历学分的要求。^{[6]114-126}

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学分转换机制非常值得借鉴,比如一些专业学习成果的期限,组块学分最高比例,有关无一定形式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方式等都有鲜明的特点。

(三)美国 AP 课程

美国在学习成果纵向衔接方面最典型的措施就是 AP 课程。AP 课程是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制定的教学大纲面向高中生设立的先修课程。^[7]

传统的 AP 课程主要包括艺术、英语、历史与社会科学、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世界语言及文化等领域。^[8]

以往学生可以通过只以 AP 课程的考试结果来换取相应的大学学分,大学理事会通常每5年会对 AP 课程进行改革和调整,比如2016年对计

算机科学课程的改革,在自然科学(化学、生物等)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中增加了15~20小时做实验的要求,未修习相关课程将不能使用 AP 考试成绩在大学换取学分。^[9]

2014年秋季,美国大学理事会又在传统课程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 AP Capstone 文凭项目,着重培养学生在逻辑、批判性思维、小组合作、论证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能力,适应大学和终身学习的需要。AP Capstone 项目在既有的 AP 学科科目外增加了两门基础课程——AP 研讨课程(AP Seminar)和 AP 研究课程(AP Research)。

如果学生完成 AP Capstone 两门课程,可获得 AP 研讨和研究课程证书(AP Seminar and Research Certificate)。如果在此基础上还选修了四门 AP 学科课程并通过考试(获得3分以上的成绩),可以获得 AP 文凭(Capstone Diploma)。

相对而言,AP 课程也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成果纵向衔接模式,采用适当的课程体系和评价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缩小不同教育机构学习成果的质量差异。

五、高职与江西电大本科学习成果衔接模式

在充分借鉴以上各种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江西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与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成果纵向衔接的基本模式:

(一)课程学分的认证与转换

目前国家开放大学资格框架还不能直接支持课程学分的纵向认证,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家开放大学倾向采用类似美国 AP 课程的方式实现学历教育课程学习成果的纵向衔接。依据不同等级的专业领域认证单元,搭建不同层次之间内容不重复、经过优化而且上下连通的专业课程体系,在高一层次的专业中设置高级可替代课程(“AP 课程”),制定选课或先修 AP 课程的条件,针对高中毕业生和同专业的专科毕业生确定补修课程。

对于有条件的高职学生可以选择电大开放本科相关专业的 AP 课程学习,通过考核,可将其存入学分银行,进入高一层次的专业学习,即可转换 AP 课程的学分,避免重复学习。

在实践中,AP 课程来源可以分为两类:

1、国家开放大学直接提供 AP 课程,相关专业学生可直接采用。

2、国家开放大学没有直接指定 AP 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采用开放教育中相应的课程和教材,二是结合高职的特点,对现有的教材进行改革,使之在教学内容上能够与开放教育本科教学要求大体一致,另外还能体现高职教育本身的特点。

以高职“微机组装”课程为例,本课程4学分,共64课时,开设一学期。根据我们学分认证的设计,在新修订的高职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学生需补修8课时,共72课时。原有课程内容也拟根据电大开放本科课程内容做相应调整,使之内容趋于一致。这个比例是多少,可以参照江西省普通高校的试点。2017年开始,江西省启动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改革试点,打通省内校际间学分互认途径。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14所江西省内普通高校参加试点。学生可登录江西省高校学分互认管理信息系统选课,到指定学校参加课程学习并通过课程考试后可取得成绩和相应学分,可在试点高校间互认。按通识课和专业课分类认证。对于专业课学分,认定原则为课程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且教学内容相似率达到80%以上^[10]。因此,采用80%这个比例在江西省内目前是比较合适的。采用这种方式,无论在学时上还是在教学内容上,对评价结果都能够提供较为可靠的支撑。

(二)对课程与非学历证书学分的认证

如果国家开放大学资格框架中已有相关标准,则直接采用。如果没有现成标准可用,则涉及到学习成果认证分中心参与认证单元(标准)制定的程序,需要在后续工作中在国开学分银行的指导下,开发完善。另一方面,也涉及高职专业课程改革,在对相关证书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原有课程进行改革,使高职课程与证书标准无缝衔接,从而为后续学分转换打下基础。

(三)对无一定形式学习成果的认证

主要针对学生学习期间的竞赛奖项和企业实践经历进行认定。阿萨巴斯卡大学对先前学习经验的评价与认证方式非常值得借鉴。高职学生可以向学院提交相关支撑材料的档案袋,通过学院审核通过后提交江西电大学分银行管理部门进行

学分认证与转换,与电大开放本科的实践学分对接。考虑到计算机类专业的时效性,可以对以往学习成果设置5年有效期限。

总之,当前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工作,很大程度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尽管理论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在具体的实践与应用中,采用怎样的模式,在国内可借鉴的案例和经验都相对比较缺乏,在标准、政策,以及机构与保障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省级电大来说,在学分银行的研究与实践中,可以在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体系框架内,吸取各类学习成果认证的优秀经验,加以整合贯通,指导我们的研究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工作真正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满足终身学习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Understanding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 [EB/OL].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nzqf/understand-nz-quals/>, 2013-06-02.
- [2] 白玲.从QCF到RQF:英国资格框架改革的新取向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6(11):31-43.
- [3] ECTS USERS' GUIDE [DB/OL].<http://www.crui.it/crui/ects/english/doc%20En/guide.doc>, 2013-04-24.
- [4] 王春晓.“学分银行”对学生学习方式影响的研究[D].西南大学,2012.
- [5] 孔磊,殷双绪.欧洲和北美学分积累与转换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欧洲ECTS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TS为例[J].远程教育杂志,2012(3):44-51.
- [6] 杨永博、李锋亮等,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研究[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7:104-108.
- [7] 王丽燕、王星晨.美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大学先修课程——AP课程和IB课程的特点与思考[J].考试研究,2016(3):91-96.
- [8] Course and Exam [EB/OL].<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courses>,2018-02-27.
- [9] 从国际课程走进海外名校,AP课程学习及选课常见误区解析 [EB/OL].<https://kknews.cc/education/nmxm33g.html>,2018-02-27.
- [10] 江西普通高校学分可跨校互认 14所高校试点, [EB/OL].<https://gaojiao.jxedu.gov.cn/info/1034/20432.htm>, 2018-01-05.

责任编辑:熊江鹏

大数据背景下安徽电大助推社区教育发展之探析

田红梅, 张文盛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大数据正在成为推动教育系统创新和变革的力量,社区教育承载着光荣且重要的社会责任,完善高水平的信息服务体系是社区教育深入开展的重要标志。从大数据的视角出发,对安徽电大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优势进行了归纳:社区研究指导中心的成立,学分银行的认定,打造数字化学习平台。接着对社区教育实施大数据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包括为个性化学习推送资源;为活动开展指引实践方向;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效果评价拓展新的思路四个方面,由此提出大数据对社区教育发展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社区教育;学分银行;学习平台

中图分类号:G724.82

文献标识码:A

终身教育理念下,学习将伴随人的一生,成为个人全面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社区是民众生存、交往、共谋发展的区域性环境”^[1],也是个体实践自我学习、交互学习的重要场域。社区教育将成为人们实现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2016年教育部联合九部委颁发的《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近年来我国多部门联合印发的第一个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意见》从国家政策高度,深化了社区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社区教育的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国社区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安徽电大远程教育与社区教育之契合

安徽省政府于2016年12月研究制定了《安徽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转发〈意见〉的通知》,文件中明

确指出:“依托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建立‘安徽省社区教育研究指导中心’,市、县依托本地广播电视大学、职业院校建立社区大学或社区学院”,在安徽省全面开展社区教育。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安徽电大)作为安徽省唯一一所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省属本科高等学校,实行省校、市分校、县工作站三级办学,至今设立了17所市级分校,69所县级工作站和7个行业系统教学点^[2]。依托燎原全省的电大办学网络,有利于构建社区教育体系,有利于社区教育服务功能的扩展、服务范围的扩大,服务内容的延伸。目前安徽电大建设并开通了“安徽全民终身学习网”,并建立18个县市子系统,在全省电大系统内开展社区教育试点,已经成立了多所社区教育大学和学院。安徽电大远程教育与社区教育之所以能协同促进,主要是基于远程教育在办学社会功能、专业体系建设、教育师资等方面,与社区教育存在着高度的契

[收稿日期]2017-11-10

[作者简介]田红梅(1972-),女,安徽合肥人,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信息管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37.html

合,同时社区居民中,远程教育服务品牌具有一定的识别度。

1. 办学社会功能

远程教育具有对象和内容的广泛性和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具有辐射广阔、覆盖全面、机制灵活、运行便捷的优势。秉承服务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办学宗旨,安徽电大以培养职业性应用型人才和促进全民终身学习为根本任务,坚持面向区域、面向行业、面向社区、面向农村的办学方向。可以说电大教育是面向全民的平民教育,是“草根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人民教育需求的大众化、社会化教育^[3]。远程教育作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综合载体,为所有的学习者提供了学习机会,同样为社区居民训练技能,更新知识,提高素养搭建了一个灵活、开放、多元的学习平台。

2. 开放融通的专业体系建设

安徽电大的专业体系,服务于学员职业入门和成业成长的需要,坚持社会导向、市场导向原则,举办社会急需的,具有地域产业特色的专业,在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坚持多样化,注重专业体系与信息技术的结合,重点建设的专业,适用于培养现代化生产、流通、管理、服务等职业岗位第一线应用技术型人才,进而“集聚一大批适应社会成员在职学习和岗位技能和职业素养提升的开放式融通课程和专业模块”^[4]。可以与社区教育中的课程进行有效衔接,迁移适用于社区教育的专业知识课程中。社区教育在吸纳远程教育课程相关元素的同时,围绕线上和线下,结合远程、面授和实践的学习环节,有利于创新自身课程的一体化设计。

3. 并蓄壮大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安徽电大经过38年的发展,成为一所以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为主体,多层次、多规格、多功能、多形式办学的综合性现代远程开放大学。“电大的特色在于其开放性、适应市场和社会需求灵活办学”^[3],办学模式全面综合,集开放教育、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于一体,同时汇聚有专业技术人员、建筑工人、中小学教师、职业经理人、月嫂等各种形式和类别的培训,锻造出一大批德才兼备、专业扎实的专兼职教师,其中专任教师1200多人,外聘教师2900多人。他们熟悉教育规律,掌握授课技巧,经验丰富、阅历广泛,能够为社区教育提供智力支撑和师资保障。

4. 社区居民对安徽电大具有较高的认知度

与其他高校的毕业、结业学员相比,远程教育学员在社区居民中占比最大。安徽电大建校以来,学历教育中先后开设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和医学等学科,100多个专业,累计培养学历教育毕业生51万多人次。学校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并重,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国家人社部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安徽)、教育部‘国培计划’省级教师远程培训机构、省委组织部安徽省干部网络教育管理中心、省教育厅安徽省远程教育中心、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中心、安徽省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等落户安徽电大”^[2]。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与行业、企业合作,承担并组织实施开展了20多个培训项目。截至2016年底,非学历教育累计培训考核365万多人次。突破400万人次的远程教育学员,在安徽城镇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社区居民对安徽电大的品牌,具有良好的认知基础。

二、大数据背景下安徽电大推动社区教育发展之优势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来临,直接推进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国家计划2018年进行大规模测试组网,2019年启动5G网络实际建设,将开辟移动通信发展新时代,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5]。同时,安徽电大拥有各类高性能服务器110多台,网络资源储存能力超过200TB。校园网已接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教育科研网,总出口带宽达到1.31G,与国家开放大学高速连接,与电大各分校、工作站互通互联^[2]。由此,不论未

来趋势催生大数据时代的来到,还是现在安徽电大网络硬件设施保障了大数据的有效存储,会让大数据驱动方法逐渐为远程教育所采用并普及,同时服务于社区教育的发展。

1. 社区研究指导中心的成立

新成立的社区教育研究指导中心,由省教育行政部门统筹领导,开展政策理论研究、业务指导、资源开发、信息服务、队伍建设和宣传交流的六项职能。^[6]逐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实现社区教育规章制度标准化,教育活动开展程序规范化,更新大数据时代的社区管理模式,依托于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和电大教育办学管理体系,与省内各高职院校协议合作,注重反馈和评价,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客观考察实际,实现安徽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的科学化,避免决策的经验性、主观性。在管理上建立起社区教育网络系统,上下沟通左右贯通;统筹中对行政推动工作与业务指导工作进行结合,优势互补合力推进,达成优化机构设置的效果。

2. 学分银行的认定

大数据时代更多地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把社区居民的基础信息、继续教育档案、学习管理与服务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智能化融合。2014年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成为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成果安徽认证中心,学分银行成为每个学习者建立的个人终身学习档案的永久数据库,学习者在“学分银行”开设账户,取得的技能证书经标准认定后,可折算成相应的学分,并把学习情况、学习奖励存进“学分银行”,随时可以兑换^[7]。由此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累积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沟通,打破社会工作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隔阂,搭建终身教育“立交桥”。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同时,降低了个人教育成本,提高了教育个人收益率。推进了社区教育与不同类型教育形式的横向沟通,与不同层次教育形式的纵向衔接。

3. 打造数字化学习平台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结合,将实现社区教育全新的网络环境。安徽电大为发展社区教育,专项承建的“安徽全面终身学习网”(图),是社区居民进行社区教育学习的门户,网站设置有教育动态、通知公告、法律法规、理论研究、学习资源、社区活动、魅力安徽等7个网页模块,主页内容丰富,特别是魅力安徽模块中,对名人的传神介绍,戏剧的精彩演绎,美食的诱惑讲解,名胜风景的诗画叙述,无一不散发出浓浓的安徽地域文化气息。

“安徽全面终身学习网”搭建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涵盖全省十八个地州市平台,这些子平台可以独立运作,同时又可以和主平台共享学习知识资源和数据。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适合地域发展特色和需求的的学习资源,支持在线学习和移动学习。平台开设互动栏目,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利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技术,评估平台的使用状况。平台上汇聚有类别丰富的文字资料,集结了形式多样的视频资源,创设了呼应自由的对答区域。除了安徽电大自建的资源,还购置了大量优秀经典的教育资源。各地市电大分校、工作站及社区,根据本地社区教育发展实际和发展诉求,对接建设终身学习子平台,实现统一规划、资源共享,保障了协同互动的业务组织管理,创建了互动交流的数字学习环境,提升了社区教育学习的选择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社区教育实施大数据的现实价值

社区教育是全面开放、全面规划、全面为社区服务的全纳教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局限性,成为地域性的全新的教育机制。具有对象上全员性,内容上全面性,时限上全程性的特点^[8]。社区成员存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围绕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提供不间断的全程连续性教育服务,包括婴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青壮年教育、老年教育等。社区教育学习者人数多、规模大、涉面广、多特征趋于常态,且涉及领域众多,社区教育的大数据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为满足社区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打破地域局限提供了可能。

1. 大数据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内涵

快节奏的互联网带动了网络硬件的发展,诸如智能手机功能更新换代的加速,各种云服务、分布式系统的技术进步,使得如今的信息数据量极速乃至爆发式增长。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数据不断扩展,很多数据开始交叉,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极大增强,量变带来质变,大数据随之产生^[9]。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美国数学家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曾提出信息量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假如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件非常不确定的事,甚至对此事一无所知,就需要了解大量的信息。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信息量的度量就等于不确定性的多少。他还指出要想消除系统内的不确定性,就要引入信息。大数据内含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其“本质就是利用信息消除不确定性”,让社区教育发展中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2. 大数据对社区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

(1) 为个性化学习推送资源

如果说互联网促进了教育的民主化,那么大数据将实现教育的个性化,而教育个性化的首要体现就是学习的个性化^[10]。大数据目的就是通过量化观照学员网络上的每一个细节,在数据学习平台中,根据不同学习者选择课程,点击浏览,搜索查询的状况,大数据可以框定出学习者的喜好,不仅在学习平台里对应着推送信息资讯、学习内容和课程资源,而且通过APP和微信公众号信息的定向推送,激发和强化学习兴趣,架构知识的多层次,拓展知识的维度,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2) 为活动开展指引实践方向

社区居民的多元化要求学习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提供线上学习资源的多类别,更要为线下学习活动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内容。只有设立多维度的学习方式才能适应新时期不同类型学习者的需求。大数据收集学习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聚合大量独立的数据,如海纳百川,易于获得客观而准确的统计结论。围绕社区居民集中的需要和诉求,以便针对性的组织开展线下主题社区教育活动,丰富居民生活,提高技术能力和文化素养。主题社区教育活动内容繁多,不仅包括知识技能培训,诸如计算机、书法、摄影、手工编织、婴幼儿教育、老年教育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等方面内容,而且包括室外走访观摩,诸如游览科普馆、博物馆等地方,还包括举办集会,诸如开运动会、举办电影晚会、阅读茶会等类型,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线下教育活动门类的多样,更需要发掘大数据的需求关联度,有的放矢就社区居民的急迫需求开展社区教育活动。

(3) 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大数据的核心在于挖掘数据中蕴藏的价值,通过一个个数据库联动,实现更大规模的数据共享”^[11]。大数据可以将分散在不同个体、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数据作为整体,全面地感知、收集、分析大数据,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数据的融合、摄取、共享,实现统一管理和利用。大大提高数据的相关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有利于提高相关政府部

门、社区教育实体的预测能力,增强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包括政府各个部门的协同合作、学员通知与组织、授课教师的遴选、教学质量监控等,让社区教育全过程控制更加直观,管理决策更加准确,实施结果更加高效。

(4)为社区教育效果评价拓展新的思路

社区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或办学目标,运用有效的评价技术和手段,通过系统地搜集信息资料和分析整理”^[12],对社区教育活动满足社区居民需要的程度作出的价值判断活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为大数据提供了基础支撑,也使社区教育的综合评价模式成为可能,并且有效改善传统评价方式中存在甚至无从着手的难题,例如“反馈信息抽象致使操作难”与“证据片面性”等。通过评价,综合出社区教育活动开展的情况,包括学习者评价、教师评价、办学机构评价、区域社区教育发展评价、课程评价等。进而运用大数据,有助于社区教育实体找准工作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助于授课教师反思需要提高的教学领域,在数据之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发现因果,探索新时代社区教育发展的规律,达成社区教育效果的良性循环与深入发展。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城,不谋长远不足以谋一时”。社区教育承载着光荣且重要的社会责任。在大数据时代完善高水平的信息服务体系是社区教育深入开展的重要标志。安徽电大远程教育与社区教育联手合作,既是各类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又是教育学习手段和路径的最佳组合与搭配^[3]。安徽电大更要不断助推信息技术与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社区教育得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武装,也必将如虎添翼,为广大居民提供更为开放、灵活、方便的学习服务,让社区居民体验

获得感,提高幸福指数,为学习型社会建设贡献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马金东.终身教育体系下社区教育实践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
- [2]学校简介.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网[EB/OL].[2017-9-28].<http://www.ahtvu.ah.cn/portal/xxgk?id=gyqgajqmmphds-gqrbSupa>.
- [3]李向荣.远程教育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研究[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6-85.
- [4]张海波.蜕变——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升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8.
- [5]我国5G网络有望2020年实现商用[EB/OL].人民网.(2017-07-25)[2017-10-15].<http://it.people.com.cn/n1/2017/0725/c1009-29426407.html>.
- [6]江丽.安徽省2017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工作协调会召开[EB/OL].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新闻网.(2017-08-21)[2017-10-15].<http://www.ahtvu.ah.cn/portal/detail?id=0cwyadangbdfbpxb8xcdwg>.
- [7]田红梅.发展非学历教育提升开放大学生态竞争力的策略研究[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4):27.
- [8]张燕农,张琪.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 [9]吴军.职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7.
- [10]杨现民,唐斯斯,李翼红.发展教育大数据:内涵、价值和挑战[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6(1):51.
- [11]耿亚东.以大数据助推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型[J].新疆社会科学,2015(3):4.
- [12]胡锐.大数据时代远程与继续教育应对策略[C].第十六届海峡两岸继续教育论坛论文集,2015:141-149.

责任编辑:罗 义

构建开放大学教师科研能力评价体系 数学模型的研究

程海水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衡量一所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科研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科研能力。开放大学作为一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关于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和远程开放教育方面的科研能力对开放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急需构建科学的开放大学教师科研能力评价体系数学模型,建立一套评价体系。

关键词:开放大学;教师科研能力;评价体系;数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 G724.82

文献标识码: A

目前,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能力评价仍然缺少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如在职称评审工作中,评价教师科研业绩主要还是简单的以论文和课题的数量,结合主观判断为主。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高校领导对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判断,对高校的人才队伍的建设、引进和培养非常不利。

在开放大学“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建立客观、科学的教师科研能力评价体系数学模型,正确分析和研究开放大学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水平,能够为开放大学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对教师队伍科研能力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强大的教师队伍科研能力最终将为开放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和科研支持。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体系进行构建研究。

一、层次分析法

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主要有机理分析、统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三种方法。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 AHP)就是系统分析的数学工具之一,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分析方法。AHP具有系统化、层次化的特点。它将一个现实中的复杂问题进行层次化,将每个层次元素进行两两比较,按照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最后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所有元素的权值。

二、科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价教师的科研能力关键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具有代表性、全面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设计开放大学教师科研能力评价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到开放大学的独特性,将课程资源建设、远程教育技术研究等因素作为一个单独的占有相当权重的指标。

科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基本能力、科研产出和拥有资源等三方面^[1]。具体科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科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能力 A1	学历 B1	专科 C1
		本科 C2
		研究生 C3

[收稿日期]2017-11-11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151583)

[作者简介]程海水(1981-),男,江西乐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38.html

	英语水平 B2	四级 C4
		六级 C5
	
		专业八级 C6
科研成果 A2	课题 B3	课题级别 C7
		作者排名 C8
		课题获奖 C9
	论文 B4	SBI、EI、SSBI 收录数 C10
		引用次数 C11
		论文级别 C12
		作者排名 C13
		论文获奖 C14
	课程资源建设	国开使用
		分部使用
远程教育技术研究	
拥有资源 A3	专业团队 B9	博士人数 C19
		硕士人数 C20
	
	实验室 B10	重点 C21
一般 C22		

三、数学模型的建立

根据 AHP 分析法,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式,请专家对体系中同层次所有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通过 AHP 采用的 1-9 标度方法确定判断矩阵 A 值 $a_{ij}(i, j)$ 。现以一级指标 (A_1 、 A_2 、 A_3) 为例,计算出这 3 项指标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权重系数。

1、构造判断矩阵

$$A = \begin{bmatrix} 1 & 1/3 & 3 \\ 3 & 1 & 5 \\ 1/3 & 1/5 & 1 \end{bmatrix}$$

此矩阵满足 $a_{ii} = 1, a_{ij} = 1/a_{ji}, (i, j = 1, 2, \dots, n)$ 。

2、最大特征向量

最大特征向量使用和积法计算:

(1)判断矩阵归一化处理

$$a_{ij} = a_{ij} / \sum_{k=1}^n a_{ik} (i, j = 1, 2, \dots, n):$$

$$\text{归一化矩阵 } A = \begin{bmatrix} 3/13 & 5/23 & 3/9 \\ 9/13 & 15/23 & 5/9 \\ 1/13 & 3/23 & 1/9 \end{bmatrix}$$

(2)按行相加

$$V_i = (V_1, V_2, \dots, V_n) = \sum_{j=1}^n a_{ij} (i = 1, 2, \dots, n)$$

$$= (0.7815, 1.9, 0.3185)^T$$

(3)对向量 V_i 进行归一化得到特征向量

$$V_i = (V_1, V_2, \dots, V_n) = \sum_{i=1}^n V_i (i = 1, 2, \dots, n)$$

$$= (0.2605, 0.6333, 0.1062)^T$$

V_i 即为指标权重系数。

3、一致性检验

$$(AV)_i = A * V = (0.7901, 0.9456, 0.3197)$$

$$\lambda_{\max} = \sum_{i=1}^n \frac{(AV)_i}{nV_i} = 3.0387$$

$$CI = \frac{\lambda_{\max} - n}{n - 1} = 0.0194$$

$CR = \frac{CI}{RI} = 0.0334 < 0.1$ (当 $n = 3$ 时,一致性随机指标 $RI = 0.58$)。一致性检验通过。因此,一级指标 (A_1 、 A_2 、 A_3) 的各指标权重系数分别为 0.2605, 0.6333, 0.1062。

以此类推,采用上述数学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出科研能力评价体系中的所有指标权重系数^[2]。

四、科研能力综合评价

科研能力评价体系中的各层次、各类别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计量单位),不具有可比性。为此,在给各项指标进行赋分时,需要对各指标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使各指标能够具有相同的量纲,以便相互对比。具体方法为给每个指标赋予一个最高分 X_{\max} ,归一化(无量纲)处理后的指标评价价值 Y_i 的计算公式为: $F_i = X_i / X_{\max}$ 。经过归一化处理后,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 $Y =$ 计算出最终的科研能力综合评价得分。

参考文献:

[1]刘微微.国防高校科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

[2]百度文库.[EB/O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jp_cGcJbc05QGjP_OBE_fDC-Cu0me1cBZiRN0nGRY6xbnFQkQnKYQsbght3KLVX-Ev9u7MUy2QBF63v7A7AIVL6MUCUaBvC0Lkzkn1Szy43V.

责任编辑:汪红亮

西方视域下中国妇女“下属群体意识”的差异性言说

——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寻茹茹^{1,2}

(1. 南京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23; 2.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是美国当代女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研究中国上海娼妓史的一本专著,其研究方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的影响,将历史史料与自我的阐释相结合,在多重语境与关系场域中试图去探寻“带有性别指向的主题之轨迹的构造”,从而呈现出从西方视域下对中国“娼妓”这一敏感、边缘女性群体的差异性关注。此著作一方面从西方视域中反观中国特殊的妇女群体——娼妓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西方视阈中中国刻板的“他者”定位等受质疑之处。

关键词:中国妇女;下属群体;娼妓;西方视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是美国当代女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研究中国上海娼妓业的一本专著,其研究方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的影响,将历史史料与自我的阐释相结合,在多重语境与关系场域中探寻“带有性别指向的主题之轨迹的构造”,从而呈现出西方视域下对中国“娼妓”这一敏感、边缘女性群体的差异性关注。“本书虽不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1]这是此书开篇第一句话,也是作者的写作宗旨。

作者认为“不是想象性重构”,是因为与其他下层群体一样,妓女没有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生活的权利^[2]。当官方或文人对娼妓进行描述、谴责、统计、管制、警示、拯救、取缔时,娼妓才会进入历史记载。虽然在中国这些记录娼妓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繁多,但是这些文献资料大多体现的是社会上层人士借“娼妓”的问题阐释其本阶层的认识动向与价值观念,娼妓最终成为上层人士建构

并控制的“他者”类型。有关娼妓的丰富史料均不是发自妓女自己的声音,是有由他人的声音与机构建构的。所以,作者认为“复原”历史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历史学的关怀都是隔着时空的跨度,对历史的关系进行模糊的理解与猜测。

虽然历史复原具有局限性,但是作者仍希望借以此书进行“甚于想象性的重构”(非“无中介、不失真”的重构)。一方面,上海娼妓在历史表述中具有变更性的多重研究意义。“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1]。在上海,有的认为娼妓提供了都市的欢愉,有人说娼妓是贪脏肮脏的行当,还有人认为娼妓标志着国家的衰败。“每个社会阶层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1]。阐述娼妓表述中变动的多重意义是探究中国社会性别、现代性争论的很好的切入口,这正是上海娼妓史研究的“重构”意义所在;另一方

[收稿日期]2017-12-24

[基金项目]2015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YS1560)

[作者简介]寻茹茹(1981-),女,山东枣庄人,南京大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影视文化。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39.html

面,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娼妓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完全沉默,“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于存在。”^[11]作者试图努力去寻找及辨识“下属群体”娼妓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作者希望此书对历史有所“重构”之处。

一、肯定与启发

因跨文化、跨学科、跨性别的积极学术努力,本书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夏洛特·弗思(Sherlock Firth)在《美国历史评论》中也盛赞这部书是“一部语义丰富的、勇敢的著作”。从个人评析角度,此书值得肯定的研究方法包括:

(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新历史观研究方法的借鉴

作者一再强调“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11]因为历史复原的虚妄性,所以贺萧对史料的“无缝隙”性叙事保持警惕,同时放弃了创造浑然一体与了无接缝的文章的执念。这种从历史记载中聆听“静默”,探寻沉默之后的存在性,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倡导的“症候性阅读”相似。阿尔都塞要求在阅读中穿透有形文字,读出空白读出失语,从而真正把握作者写作文本的“深层理论问题式。”^[3]

虽然书中没有提及,但是贺萧的史学研究方法明显借鉴了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的新历史观。福柯在其著作《认知考古学》中提出了基于指认隐性话语实践的历史研究新方法。福柯提出“考古”的对象不是现有的物质遗存物,而是在物性实在之外并不在场的“未说出之物”。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是要寻找一般历史学者觉察不到的事物,这与传统史学研究最大区别在于——关注非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分析法。关注矛盾和差异中出现的“话语的特殊性”,就是要对被主流目光所忽视的不直接在场的言语方式本身作出差异分析。福柯的考古学不再试图建立一种研究对象的主宰状态,而是要微观地刻画话语塑形的“个体化”。^[4]这使得福柯对沉默的边缘群体尤为关切(例如疯子、无家可归之人等)。

与福柯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新史学方法论相

似,贺萧在阅读有关娼妓的记载文字中,发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上层人士在书写娼妓之时,会将自身“情景”投射其中,通过妓女形象表达忧患意识。所以,贺萧时刻警惕“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记”^[1]¹³。例如:在第二章《分析与统计》中作者对20世纪20、30年代官方统计娼妓人数的认识,并非要从这些数字中考查出中国娼妓在当时准确的变化情况,而是引导读者去思考这些数字变化的统计方法与目的——统计什么,为何统计,谁作统计。

贺萧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娼妓史就是想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的游移不定的关联”^[1]¹³,即“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个方面互相之间的游移不定的关系”^[1]¹⁴。贺萧在书中提及这种做法是对罗伯特·伯考弗的“种族语境”的实践与超越,但是这与福柯“考古学”中关注细部断裂和非连续性更为相像。

(二)后殖民语境下“下属群体意识”的探寻

基于福柯考古学中对“沉默史实”的关注,作者在书中也试图采用从“下属群体意识”切入的方法,探寻娼妓在史实记载中被隔绝的声音,这是西方视域下勇敢的研究尝试。“下属群体”是历史学家拉那基·古哈(Ranajit Guha)提出的概念,意思是“低等人”,这个群体“无论从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5]³⁶。作者在书中还提及葛亚特里·斯皮瓦克对“下属群体意识”的质疑。葛雅特里·斯皮瓦克(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认为下属群体不可能拥有独立、自主叙述历史的权利,“就在它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就已被抹平了”^[6]²⁸⁷,“如果说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下属群体更是处在浓重的暗影中”^[7]³²。

斯皮瓦克令最积极用功的历史学者都陷入绝望的论断,并没有影响到作者对此方法的使用。作者否认了斯皮瓦克的“绝望说”,认为“下属群体会说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表现自我。历史学家可以从文字记载中寻找“下属群体”活动的种种迹象。例如,在第二部分《愉悦》中,贺萧从当时指南书中大量劝戒客人不要上高等妓女当的内容中,推断出高等妓女拥有自己的谋略和一定的操

纵手段。贺萧进一步指出“下属群体”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在社会话语系统中表述自我。所以,要从话语存在的复杂关系之中,去追寻“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在不协调的多重嘈杂的话语言说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

贺萧在书中还结合中国半殖民化的特殊语境,提出了“套中人下属群体”的概念。“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1]29}即使地方上有权势的军阀在政治上也会受到殖民势力的打压,所以当时中国“下属群体”身份具有广泛性。一些阶层^①既享有特权又受他人^②奴役,他们会以等级更为低下的群体^③作为“隐喻”,传达自我阶层的从属性。甚至1949年之后,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但仍处于“下属群体”地位^④。因此,20世纪中国大多数群体都具有多重性,作者将其定名为“套中人下属群体”——“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1]30}作者也注意到如此“宽泛”界定“下属群体”会失掉研究效用,但基于中国特殊化语境,作者不得不坚持这一界定。

(三)“女性主义”的现代性审视

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同时基于“娼妓”这一论题,贺萧自然会使用女性主义理论去审视中国妇女问题。“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这样的寻觅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中国”^{[1]28}。贺萧认为妓女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努力去改善生存状况^⑤,都可视为是妓女能动性或者反抗性行为,是对当时报纸或文学创作中视妓女为牺牲品与受害者的刻板形象的反驳。

当然,作者也提醒读者对诸如此类的妓女行为不应求意过甚,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Abu-lughod Lila)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8]。即提醒读者不要将妓女这些行为进行“颠倒性”读解,例如:从妓女作妾或妓女告状还可读解出这是妓女被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之中的社会安排。在

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上,贺萧表示“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件,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1]29}。这点其实很难达到,所以作者也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述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1]29},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愚侠之举。

(四)淡化中国传统及意识形态的西方视角

因为贺萧的西方文化身份,其受中国传统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少,所以她在分析一些史料之时,采用西方视角看待中国问题,反而会有一些差异性的研究成果。在第二部分《愉悦》中,作者发现在当时的指南书与小报中描写的高等妓女不仅在妓院的业务中,而且在涉及民族大义的历史事件上,也呈现出行动的积极性,而非是受害者。例如,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高等妓女也响应号召,宣布暂停营业,散发传单,支持全市罢工,抗议“国耻”^{[9]35}。1906年中国设法回购洋人的铁路投资,一个妓女捐款1000元,受到了官方赞许。1914年,高等妓女成立了“青楼进化团”宣讲爱国和进步思想。在指南书和小报中,贺萧读解出了“那是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其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环境”^{[1]17},这些“自主性”是当时中国社会即便是体面人家的妇女都难以享受到的。史料中记载高等妓女“姘戏子”、“养小鬼”、“磨镜子”等事情,贺萧对此的评述是“女人养男人,控制男人,尽管不言明却已直逼传统的性别身份安排”^{[1]112},甚至是动摇了权利的性别身份。作者的西方的文化身份,自然屏蔽掉中国传统中“男尊女卑”、“妓女戏子不入流”等观念的渗透,难能可贵地发现了20世纪中国娼妓中的女性现代意识的痕迹。

另外,作者也可摆脱1949年后中国强大意识形态的影响,去看待新中国政府对妓女问题的处理。1949年之后中国的主导性史学是以阐述和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己任,但是贺萧敏感觉察到“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⑥开口发言时,他们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1]22},

① 当时上海的上层人士,例如文人知识分子。② 西方殖民者。③ 娼妓。④ 1949年之后的中国先是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从属单位,后仍处于全球政治经济的欠发达的下属群体。⑤ 例如第二部分《愉悦》中讲述有些妓女当小妾来换取金钱以及到法院里状告鴉母等。⑥ 通常是工人和农民。

所以1949年之后包括娼妓在内的下属群体仍是使用官方语言说话。

二、质疑与商榷

“没有完美之著作”，这本书同样存在让人质疑、值得商榷之处。

(一) 西方视域下对中国刻板的“他者”定位

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其研究方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去积极的、有效的、中立的、公允的去看待中国娼妓及中国问题。但是,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依旧可以从作者的表述与观点中察觉到西方视域下对中国“他者”的定位。首先,作者的选题“娼妓问题”,这种阴柔、卑微的历史群体正好应和了西方对东方一贯的想象。第二部分《愉悦》在分析高等妓女时,贺萧有这样一段评述:“高等妓女在性的方面表现得妩媚、优雅、含蓄,没有一点淫荡之意,在想必是十分枯燥无味、单调郁闷的中国生活中提供了绚丽多彩的插曲,因此高等妓女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构件”^{[1]103}。这不但是对中国高等妓女,更是对中国亘古不变的“他者”定位。

其次,在将中国视为“他者”的前提之下,贺萧论述有关“洋娼妓”以及娼妓对洋人健康威胁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凌驾于“下属群体”(中国)之上的种族优越感(西方)。第一部分《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中,贺萧单列出了“洋娼妓与‘冒险家的乐园’”这一内容,列举了一些“外国作者构造出他们想象中白种女子遭受中国男人摧残的可怕故事”^{[1]50},同时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外国妓女也是分等级的(俄妓是欧美妓女中人数最多、地位最低的,日妓在受嘲笑之余,又被视作为洁净和精致的)。这是史料(西方史料)记载,非作者评析,但因“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1]52},作为读者我们就得格外关注这些“西方史料”的选择。贺萧曾在书中提醒读者要警觉书写的构造而不仅仅是其表述及反映功能,所以我们要警觉作者对史料的选择,为什么她会选择列举这些史料?在史料背后,贺萧传达了什么?第九章《性病》开章提出“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信息资源中这样的警告^①已很常见,他是

殖民主义总体关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227}。可能是翻译语词选择的问题,但其中“关怀”这一字眼仍将作者的种族优越感显露无疑。贺萧在此章还单独列出一部分——“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这些内容都是在讲中国城市中的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培训过的中国医生对性病的关注。其中“权威”“专业性”的标题设置,同样显示出对“他者”(弱者/中国)拯救之举的颂扬。在“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这一部分中,贺萧再一次在末尾补充了“外国妓女的威胁性”论述,她指出“有关外国妓女及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妓女的警告,其语言多有按国力排列的味道。欧美和美国女人一般被列为比较卫生的一类,相对来说染病的较少”^{[1]249}。作者之前曾说过在中国的指南书中对外国妓女很少关注,这些论述就有作者自我观点阐述之嫌!

(二) “愉悦”的矛盾性——诱发想象的“窥视”视角

作者在第十五章《历史、回忆与怀旧》开篇提及《旧[地名]的烟赌娼》、《旧上海娼妓秘史》等记录娼妓史实时会出现一些矛盾性——“编书者毫不动摇地反对这些罪恶的习气,但书中却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这些习俗本身,这反倒使现在的人更容易想象从前的情景了”^{[1]93},贺萧指出孙国群在《旧上海娼妓秘史》中一再强调自己是为了揭露这一罪恶制度,但是书中描写当时淫业鲜艳而入胜的景致,对读者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其实,历来对娼妓业史料的陈述,都极易陷入色欲窥视的境地。此书中,贺萧同样遭遇了她所批驳的其他书写者的矛盾性,诱发了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的“窥视”欲望。前面提及贺萧这本书中写得最详细、最精彩就是第二部分——“愉悦”,从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可以读解出作者在深挖当时中国娼妓体现的女性现代性痕迹,但是有些史料同时又是在揭秘高等妓女的隐私。例如:第四章“情感事务”,作者极为细致的列举了高等妓女与“干”客^②、“湿”客^③、“恩”客^④不同的关系,详尽描写了小先生^⑤的初次性活动和仪式(“点大蜡烛”、“梳梳”、“开苞”或“破瓜”),还介绍大先生^⑥如何选择客人,如何

① 对性病的警告。② “干客”是妓女与嫖客没有发生性行为。③ “湿客”是妓女与嫖客发生了性行为。④ “恩客”是妓女与嫖客落了相好。⑤ 处女,没有性行为的雏妓。⑥ 有了性行为之后的妓女。

“出局”^①“出堂差”，如何“养小鬼”“姘戏子”，甚至还有如何“磨镜子”^②，如何当情妇、做小妾。书中还介绍了高等妓女如何被聘用、典押或卖绝，巨细无遗地列举了指南书中教客人如何招妓叫局、打茶围、办花酒、设赌局，如何避免当“阿木林”^③和“瘟生”^④。另外，第二部分《愉悦》在体例设置上，共分四章^⑤，可见作者对此部分的“用功”，当然这部分也最讨读者喜欢。

这种诱发“窥视”视角的书写缘由，一方面来自书写对象——“娼妓”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定位，女性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影视传播中，一直都处于“被看”“被凝视”“被窥视”的位置，而娼妓与性有关，自然就是被“窥视”的对象；另一方面“娼妓”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隐喻”，在殖民主义视角下，中国最为东方文化景观的代表一直是西方“窥视”的对象。

(三) 研究娼妓的文本狭窄与体例不均

在第一章《导演：认识与记忆》中，贺萧指出本书研究资料来源有两类——一是游记、指南书^⑥和被称为“蚊虫报”的通俗小报^⑦，主要是以报道名妓为主；另一个是主流报纸^⑧，报道各级别妓女的情况，描述妓女怎么被压迫及如何危害社会。在论述1949年之后的中国娼妓问题时，贺萧主要引用了一些中国的研究论著，报告文学及通俗书刊。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20世纪上海娼妓业的研究文本只限于书写文字资料。当时，在电影、戏剧、绘画等领域均有对上海妓女的表现，尤其是电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看电影是极受观众喜爱的娱乐形式，以老上海妓女为原型的电影作品^⑨较多。但是，作者都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之中，研究文本受到局限，论题得不到充分论证。另外，本书开篇强调写作的时间上限（19世纪末）到下限（20世纪80及90年代），概述整个20世纪的上海娼妓问题。但是，从内容体例分布来看，作者

用笔最多的是20世纪20到40年代的娼妓问题，而49年之后娼妓问题涉及相对较少。由此呈现出了“虎头蛇尾”“用笔不均”的写作缺憾。

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变革，中国国内的“性”研究^⑩更为丰富，能否与西方进行一种对比研究？“娼妓”从古至今都是个“话题”，是折射历史、文化、社会症候的“照妖镜”，而“怎么拿”“怎么看”“怎么照”，最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 [1] 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2] Hershatter Gail. The Hierarchy of Shanghai Prostitution, 1919-1949[J]. Modern China, 1989, 15(10).
- [3] 张一兵. 析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2002(3).
- [4] 张一兵. 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福柯《认知考古学》解读[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3(6).
- [5]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6]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7]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M].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8] Abu-lughod Lila. 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 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 [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0, 17(2).
- [9] 汤国祯，朱大陆，杜黎. 上海轶事[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邱美玲

① 妓女出去应酬。② 妓女之间的同性恋。③ 乡下人。④ 冤大头。⑤ 此书中其他部分大部分为二章或三章。⑥ 源于娼妓回忆录，这类书有《上海六十年花界史》《沪人宝鉴》《花园百美图》《海上冶游备览》《柔箱韵史》等。⑦ 主要是李伯元《游戏报》，吴研人的《笑报》以及《晶报》。⑧ 例如：《申报》。⑨ 例如：《神女》《新女性》《马路天使》等。⑩ 例如：李银河、潘绥铭等。

基于现实的超越性

——福克纳与莫言小说的地志空间创作分析

杨红梅

(长沙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福克纳和莫言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杰出的作家。两位作者在小说体系中共同构建了独特的文学地志空间。本研究主要从两位作者地志空间创作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两方面来分析两位作者地志空间的创作特征。从现实性和超越性的角度对两位作者的地志空间创作展开分析,有利从文学创作的现实来源性和艺术表现性来进一步地把握和认识两位作者的艺术创作。

关键词:福克纳;莫言;地志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提出了的空间三维辩证法。“空间实践”可分为物质空间的生产实践和文化空间的生产实践。文化实践方式通常也称之为“表征的实践”。霍尔指出表征的实践是“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1]10}在这个主体观念的具体化中,来自现实的物质客观性为“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的生成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现实参照。威廉·福克纳(Willam Faulkner, 1887-1962)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饮誉世界、有着广泛国际接受度的作家,他一生的创作几乎都植根于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美国南方“那片邮票大小的地方”的书写。莫言是中国当代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在世界文学地图中也创作出中国“高密东北乡”这个特殊的地理概念。在这个地理概念中,民间的叙事、个人的记忆和历史的传

说交融在一起,向读者展开了近现代中国人在历史行进中的徐徐画面。每一部小说既是故乡意向的构建,又是灵魂和力量的奏鸣曲。在小说体系中,它们层层叠叠,相互晕染,在作家笔墨挥洒下相得益彰而又各具特色。两位作家在十余部长篇小说和百余部中短篇小说中分别建构了“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高密东北乡”这样两个特殊的地志空间。在小说地志空间创作中,现实的生存环境是作者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和艺术升腾的沃土。两位作家在小说地志空间的创作中完成了基于现实的想象性和艺术创作性的巨大努力,构建了具有艺术整体性的文学空间创作。以下将从两位作家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及超越性两方面分析两位作家小说体系地志空间创作的整体特征。

一、地志空间创作的现实性和艺术整体性

文学实践是文化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的实践中,现实的地理景观为文学的空间

[收稿日期]2017-11-12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6YJC752024);2016年度湖南省教改项目(湘教通[2016]797);2015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15YBA022);2015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15C0129)

[作者简介]杨红梅(1980-),女,湖北襄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西方文论。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0.html

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客观参照,它是作者主观情愫萌生的基础和概念抽象化的来源。在福克纳和莫言的小说体系中,他们共同把故乡作为其文学创作的源头。以这样的源头为参照,他们建立起了独自の文学叙事王国,创作出了典型的地域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风貌,在整个小说体系中建构了独特的地志空间。这个空间里体现了作家对生活主观评价和主观情感的真实,它是事真、情真、理真的高度统一。

福克纳一生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和16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一大半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945)曾指出“在奥斯福,福克纳完成了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别的例子的精神劳动。这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劳动:第一,创造了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县,它像神话中的王国,而且包括所有细节在内部都是样样齐全的,栩栩如生的;第二,使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成为最边远的南方的寓言和传奇活在人们的心中。”^{[2]20-21}这个地区有结构完备的地方志。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曾经专门为这个区域专门绘制了一张地图,并从种族、人口对该区域进行了描绘。虽然文学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现实的作者的故乡——美国南方奥克斯福在很多地方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在基本的地志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中,我们仍然体察到小说体系的地志创作有着很大的现实性。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曾经指出“约克纳帕塔法小说,比我脑子里一下子能想起来的任何一部小说,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它从属于时间,从属于变化,还挟带着自身的记忆。福克纳的世界的亮点之一是它里面发生时间的质地,是事件中人类经验的范围、规模和动力。小说的地图是有生活这样强质的材料绘制而成的。因为人的激情即是那真正的地域。杰弗森镇、法国人湾、萨德本百里地——分布在这张地图上的每一个地名——都是这种激情。其起因于后果的见证处。”^{[2]297}现实地志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大的客观体系。这种来之地域的历史及其情感张力也正是催生作者

艺术创造力的重要条件。

虽然每一部福克纳的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再创作,它们有独立的内容表达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但是福克纳小说体系中包含着整体性,每一部作品都起源于这种整体的历史和情感的张力,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地志空间的整体气象。马尔科姆·考利指出应该“比较自觉地把他的作品规模、魅力与互有关联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约克纳帕塔法体系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同有一个有生命的图景的一部分。福克纳真正的成就还在于这幅图景,而不是记录了其一部分内容的一本本印出来的书。这个图景的存在帮助我们了解他作品的一个特色;每一部长篇小说,每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所表现的似乎都比它直接说的要丰富些,它的主题也比它本身要大一些。所有一本本书都像是从同一个坑里开采出来的大理石块:它们都带有母体的纹理与瑕疵。”^{[3]19}在创作中,每一部小说都带有小说体系独特的气质和氛围,这种特点植根于小说创作的现实地域历史和文化情感特征,它被作者保存在艺术风格的创作中。它反映了作者对南方问题和南方历史思考,是一种区域情愫和激情的产物。它创造出的是作品的生命景象,也是作品的生命力量。正因如此,与现实地域文化的内在气质以及现实触感的血脉相连正是作品体系建立宏大、自成体系的最根本原因。小说地志空间与现实地域特点最本质的关联性是小说地志空间的最大特点。

莫言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和数百篇中短篇小说,在这个庞大的小说体系中莫言同样也建立了气势磅礴的地志空间景象。这个空间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民俗人土风情。从创作时间上看,莫言从1985年的《秋水》起开始了高密东北乡的创作,他在《白狗千秋架》中第一次提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的地理名词。从此,《红高粱家族》(1987)、《天堂蒜薹之歌》(1988)、《笼中叙事》(1988)、《酒国》(1992)、《食草家族》(1993)、《丰乳肥臀》(1995)、《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等系列小说都像取之不竭的泉水一样

咕咕从这个源头喷涌而出。文学的“高密东北乡”有着很强的实证性,在现实中,它有着切实的参照。莫言曾指出他的故乡跟他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他曾经在《超越故乡》里提到过《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一句话: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他作品的一些素材都来自于他的成长的经验,其中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原型都取材于其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蛙》中管计划生育的女干部就是他的姑姑,小说的发展见证了一个乡村干部兼计生专员在变换的时局中的从业轨迹和心灵变化史。《生死疲劳》的主要人物——戛然子立的单干户蓝脸就是他从小见过无数面的邻居。这个单干户的执拗与倔强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上吊自杀后,莫言还曾去看过他的尸体,正是来之生活的感触谱就了《生死疲劳》在跌宕起伏中的铿锵生命拷问和生命力量。这种来自地域生活的创作情感和激情构成了小说空间创作的底色和主要特点。

在莫言的小说体系中同样也见证了来自地域情感表达的艺术整体性。每一部作品都带有作品整体气质的特点与风貌。莫言在谈到这块生养他的土地时曾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从《透明的红萝卜》中那晶莹透亮的萝卜意象到《红高粱》那一簇簇激越人心的高粱红,从《天堂蒜薹之歌》中那弥漫着蒜薹味的家与情到《丰乳肥臀》中那片养育上官一家的热血与土地,从《檀香刑》中那荡气回肠的猫腔到《生死疲劳》和《蛙》中的弥漫着故乡想象的河与谷,在艺术的整体性中,我们看到的是莫言对故乡的山水传奇、民间风俗的“感”与“爱”。这种艺术感觉如同福克纳小说中对南方广阔的土地和南方植园文化的温情与回忆,它们共存于每部小说的创作中,是每部小说创作的来源,也是作者对故乡的最朴质的追寻。莫言说道,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他成长,因此民间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他作品的艺术风格。这种来自民间故乡的素材与感受从整体上塑造着作品的整体艺术内容与艺术表现,这种统一的“精气神”构建了小说体系

的整体意象。

文学中的地志空间的建构,并不是简单机械式的复制和再现,它渗透着作者对空间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对其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以区域文化为中心对区域问题的共同探索和发掘也是小说体系空间建构凝神聚气的重要原因。福克纳的小说体系中渗透了没落的南方贵族对南方问题和南方历史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家庭的、种族的、生活的和社会的内容统统纳入了小说体系的描述范围。莫言这个山东籍的农民作家表达了其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思索。他说道,作家需要写乡土,需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不断地深入到乡土里面去。在这种思索中,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与中国高密这片传奇的土地和热血的人民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域的方寸上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上官鲁氏、西门闹等具有山东特色、卓尔不群的农民形象。他通过对山东高密东北乡社会万象的描写勾勒出中国——这个蜕变中的农业大国在近百年发展中的沧海桑田。两位作者以作品系列的整体性向读者展示了特定区域的社会发展全貌。这也是他们地志空间叙事及整体地志空间得以建立的最大出发点。

二、地志空间创作的想象性与超越性

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现实空间的生存体验和哲思为文学想象开启了无限的创造空间。文化空间生产是以现实空间为参照的精神生产实践,它是“运用文化的象征(symbol)、想象(imagination)、意指(signification)、隐喻(metaphor)等手段,对空间进行文化编码组构,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过程。”^{[4]61}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创造主体表征性参与使空间意义发生不同转换,产生不同的意义。小说的空间创作既是现实的反映,也是一系列趣味、经验和知识的景观。文学的空间创造体现了作者文化表征生产的情感性和能动性,也体现了作者艺术创造个体性及其与之相联系的时代性。福克纳和莫言地志空间的创造既是想象性的文化再生产的产物,又是创造主体融入社会空间

客观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地志空间的创造中,既体现了想象基于现实的超越性,也体现了艺术与时代相结合的独特性。

福克纳和莫言文学世界的地志空间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同时在艺术表征实践的主体性和想象性的创造中,地志空间与现实地理也有着一定的背离和扩大。它是融入作者想象、个人情感和艺术创作的产物。从艺术创造的源头来看,它从属于故乡;从艺术忠于现实的角度,它超越了故乡。在超越性方面,两位作家在故乡的超越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点。地志空间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故乡的想象,也包含了作者对故乡扩大化的理解。这种扩大化的理解是作者穷尽毕生之力艺术探索、生命探索 and 思想探索的结晶和产物。

米沃什曾指出,想象力总是具有空间属性,其中心点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也许是孩提时代的某个村庄或者出生地。只要这个作家还呆在自己的国家里,那么以这个中心之地为圆心不断向外延伸,直到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他的国家。福克纳和莫言的艺术空间建构都始于家乡。在艺术创造中,想象的力量却张开了无限的翅膀遨游于来自故乡心灵的河流之上。琼斯坦因曾问福克纳他的创作有多少是以个人经历为素材的。他回答到:“‘多少;并不重要。一个作家需要有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两项的不足。对我来说,往往一个想法,一个回忆,脑海里的一个画面,就是一部小说的萌芽。’”^{[5]320}在小说的创作中,故乡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但想象力却超出其外,建构了更加驰骋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福克纳建立了起了自己独自的王国。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945)在谈到福克纳的地域创作时说,“这个图景是一个密西西比州小镇上长大的男孩熟悉的故事——不过全部经过福克纳自己情绪的加工、改制、并赋予了痉挛的生命;以致只要把色彩稍稍加强一点,里面的人物就变得不太像真人,要么英雄化,要么魔鬼化,成为古老南方的象征,战争与重建的象征,摧毁了旧标准的

商业与机器的象征。”^{[2]20-21}小说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现实,但其又是对生活艺术性、超越性的想象与建构,这样的创作特点同样表现在莫言小说的地志空间创作中。1986年莫言在读完《喧嚣与骚动》后说他被作者的想象力所折服。他说曾指出:读福克纳的,他服气了。以前的创作写的太实,把真实误解为生活的原样照搬。其后他进行了上大胆的突破与创新,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狂欢化和意识流等艺术形式融入到故乡的想象和艺术构造中。在《红高粱家族》中,他说:“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与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6]13}从莫言对祖先敬畏的言辞中,可以看到艺术创造对现实的想象性的大胆探索以及作者对现实的敬畏。莫言依据现实素材以超凡艺术想象力建构了一个文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地志空间的建构是他以现在为圆心对故乡、对历史的丈量;是艺术化思索和艺术化塑性的产物。

在想象力的驰骋下,故乡的构建还表现为扩大化的特点。在故乡地志空间的建构中,故乡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中心、一个主题。在这个中心和这个主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对生活现实和人生、艺术的思索,它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识。地志空间扩大化不仅表现在作品地志空间容量的扩展,而且包含作者对地志空间概念理解的扩大化。

福克纳和莫言在故乡地志空间的建构中包含了比简单现实更为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中西文化对建构历史现实的不同理解。在西方,人们对历史和文化思索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思索,事物在时间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中国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空间概念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人对世界和自我存在环境的基本认知。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扩大和实践空间的拓展是紧密相连的。在故乡地志空间的建构和故乡的扩大化的方面,福克纳对故乡空

间的表现更多是一种时间维度的拉升和意义上的追索。马尔科姆·考利指出“虽然这个图景局限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县的疆界之内,可是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到整个边远的地方;看来福克纳是一个意识到它的广义范围的。当他在《去吧,摩西》一书中描写到麦卡斯林种植园仓库里的账本时,他很有可能想到了自己的小说。他说,这些账本记录了‘一点点流出去的糖浆、饭食、肉类,还有鞋子、草帽与工裤,以及犁绳、笼头、靴钉和轱辘,这些东西每年秋天又变成棉花流回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当地的事,范围有限,可它们也是:‘一部绵延不断的记录,不仅是两百年的事,再加一两百年也不足以把欠的债还清,这是缩小的整个地区的大事记,只是累积起来加以综合,这也就是真个南方。’”^{[3]29-30}在福克纳的地志空间建构中,可以看到他对事物存在价值以及意义在时间延续上的探索,这种探索把区域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展现出来,它呈现的是区域的问题,却获得的是普遍的概念。这个普遍的概念与区域范围有关,又超脱区域范围延伸至更深邃的时空隧道。在这个隧道中,故乡地志空间的创造获得更广泛的意义。“威廉·福克纳所处的时代与地理环境使他有可能扩展这一欧洲传统,使之超越新英格兰、中西部或西部沿太平洋地区的小说家们目光所及的任何界限。”^{[2]264}

相比福克纳,莫言在地志空间的扩大化上更表现的是一种空间范围包容性的扩大。莫言地志空间就像广袤的大地,莫言说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我创造了这个‘高密东北乡’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7]12}故乡没有平原,没有森林,没有山,没有熊,也没有鲑鱼,莫言在这个没有国界的创作中都把它们移植移过来。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莫言曾指出它“更重要的是思维

空间的拓展。”^{[7]106}在这里,他延伸了故乡的概念,“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快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快乐保持一致。”^{[8]42}福克纳与莫言都从不同的维度拓展了其地志空间的范畴。它拓展了现实故乡的内容和承载能量,通过艺术表征空间的生产实践,两位作者创造出独立的和具有文化个性的生产艺术,它代表的是对故乡扩大化的想象和理解。在这种扩大化中,他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手法,但他们创造的是一个异质文化和普遍文化共寓一体的文学空间。这个独立的文学空间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是一片文学森林,是一个国家的缩影,也是一个小宇宙。^{[7]24-25}在这里上演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戏剧,这也是福克纳和莫言在小说创造中殊途同归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李文俊. 福克纳神话[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 [3]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4]谢纳.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空间研究[D]. 辽宁大学,2008.
- [5]李文俊. 福克纳的神话[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6]莫言. 红高粱家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7]莫言. 莫言演讲新篇[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 [8]莫言.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 小说的气味[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邱美玲

军阀、媒介与政治宣传

——从舆论宣传角度看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北归之行

张建冬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摘要:1920年5月吴佩孚由衡阳撤防北归,在北上途中,吴佩孚凭借其政治宣传智慧,牢牢的掌握了舆论话语权。于是其斗争对手“皖系”及其“安福系”则成为了十分被动的政治目标,被贴上“祸国殃民”的政治标签,而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与唾弃。吴佩孚的撤防北归,一方面是直系战前的一场战争动员,但同时也是一场规模空前舆论宣传之旅,为直皖战争进行了舆论准备,奠定了直系胜利的民众基础,同时也对北洋政局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吴佩孚;媒介;撤防北归;政治宣传

中图分类号: K261.5

文献标识码: A

以往学界对于吴佩孚的衡阳撤防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和再现吴佩孚的罢战主和、撤防北归的具体活动,分析和评价吴佩孚撤防北归的政治影响,^①而忽视了吴佩孚作为直系的后起之秀如何运用大众媒介进行自身主张的宣传和自身形象的塑造。1918年4月——1920年5月,驻防衡阳前线的直军将领吴佩孚屡屡通电罢战主和,撤防北归,最终于5月20日获准撤防,6月9日抵达郑州,在直、豫两省要隘分兵驻扎。由于直皖两派之交恶,由来已久。而吴佩孚撤兵北归,更是两派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的突出表现,“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1]。吴佩孚正是认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他借助撤防北归的机会,在北上途中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奋斗目标,树立自身为国为民的舆论领袖的形象,将此次撤防之行变成一次舆论

宣传之旅。除了利用当时主要的传播媒介报纸进行鼓吹之外,吴佩孚还多次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与公众团体进行谈话,大力阐发自己的主张,以争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这充分显示出作为“秀才军阀”的吴佩孚,对于媒体与舆论特有的关注与重视。

本文通过对1920年吴佩孚撤防北归的舆论宣传分析研究,来探讨在当时皖强直弱的政治环境下,吴佩孚如何通过新闻界进行宣传,最终在直皖战争前取得“北方舆论大多数表同情于吴佩孚”^[2]的绝佳舆论氛围,以及北洋时期军阀与媒介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一、撤防时吴佩孚“主和”领袖角色的确立

一个政治家在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身主张能否与民众心理、时代

[收稿日期]2017-11-20

[作者简介]张建冬(1992—),男,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1.html

^① 笔者所搜集的资料主要有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郭剑林先生的《吴佩孚大传》等著作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研究。此外论文类主要有陈长河的《西南军阀与1920年直皖战争》,《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郝天豪的《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南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刘兰昌《论吴佩孚衡阳撤防的社会影响》,《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以及《论衡阳撤防与直皖关系的演变》,《福建论坛》2007年第7期等。

潮流思想契合的问题。“无论目标如何混杂在一起,任何一方都需要另一方并调整以适应另一方。政治家需要掌控在大众媒介手上的传播渠道,包括他们所提供的理想的受众信息接收情境。这样,政治家们就必须调整他们的讯息以适应大众组织所制订的规格和样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语言风格、故事模式和受众形象。”^{[3]130}吴佩孚正是根据时代潮流的发展、公众舆论的呼声,而积极地改变自身的政治策略,以期来获取公众对自身的信任与支持的。

1918年欧战局势已日趋明朗,英美等国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多次要求北洋政府停止内战,召开南北和议。而公众对于长期的南北战争也渐生反感,《申报》评论就言:“我人民之望和平久矣”^[4]。吴佩孚正是敏锐洞察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公众心理的需求,于1918年8月,连续四次发表主和通电,可谓是“制造舆论,广树直声”^{[5]676-677},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与支持。可以说,“全国的和平运动,是从吴佩孚等通电罢战主和开始的”^{[6]271}。吴佩孚在此正是充当了“主和”领袖角色的。此后,吴佩孚更是积极践行其“主和”的主张,实施衡阳撤防,罢战北归。吴的这种态度及其行动,无疑会赢得公众的好感,同时也争取到同样渴望和平的新闻界的支持。

此外,吴佩孚也积极通过语言、行为来迎合公众的心理需求,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与当时的军阀干政祸国的不良形象相比,吴佩孚在衡阳撤防之时就以“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来自律”^{[7]249}。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公众对军人的期望,而驻湘期间吴佩孚所率领的第三师,“军纪严肃,秋毫无犯”^[8],也增加公众对吴的信任与吴自身的政治威望。

由此可知,吴佩孚在衡阳撤防之时,他已经通过明确的政治表态以及自身形象的树立,使自己顺利地取得话语权,扩大了自身以及直系的政治影响,获取了期望和平的公众支持,为自己撤防北

上舆论宣传做好了准备,充分显示作为“秀才将军”吴佩孚的舆论宣传的智慧。

二、吴佩孚撤防北上及其舆论宣传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身宣传实践证明,宣传手段和宣传艺术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宣传者自身要形成吸引人的特色;第二,综合利用口头、文字和图画等多种宣传载体。第三,了解和尊重宣传对象,为了产生宣传效果,需要适应宣传对象”^{[9]228}。吴佩孚作为当时的直系形象的代言人,在直军撤防北归的途中,他确实运用了各种的宣传手段以及宣传载体,为自己以及直系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进一步取得民众的好感与拥护,同时也为直系在两派军阀势力从政治角逐到军事冲突的过程中取得了舆论上的先机。

吴佩孚的宣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树立良好的军队形象,不同于当时军阀经常性的肆虐扰民,吴佩孚衡阳撤防之时,即先期发布布告,沿途张贴,即“本军经过之水陆各区,已责成各长官,严行取缔,不得有强拉夫役搬运军物,及索取地方上一枝一叶之供应”^[10]。而后途径长沙时,吴军“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船而高唱军歌者”,使得当时民众“一望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11]。在岳阳驻留期间吴佩孚更是有在岳阳楼开追悼会,祭奠直军死义将士之举。吴佩孚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以及自身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及直军赢得了一个良好社会印象。吴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望风而动,夹道欢迎。吴军的纪律严明、仁义之师的形象恰恰就是吴吸引公众的特色之所在。

其次,在宣传载体上,秀才出身的吴佩孚也可谓是别出心裁,主要采用的是口号、军歌、诗歌等具有感染力的宣传形式。诸如在撤防北归途中直军一路上高歌的军歌,这首由吴佩孚依照《满江红》词牌所撰写的《登蓬莱阁》歌,表现的是针对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占我国满蒙地区,国土沦丧现状而抒发的反对侵略、恢复国土山河的爱国情怀。

当时武昌市民欢迎吴军时,听到这首军歌,无不为之“热泪盈眶”,甚至连外宾都感到凄然,大有田横五百壮士之慨。^{[12]73}此外,作为当时北洋时期少数拥有文化的军阀将领之一,诗歌也常常成为他言志宣传的工具。如1920年6月6日的《晨报》就以大幅版面介绍吴佩孚的《咏铁树开花》等十四首诗歌,诗中以“铁树开花”来喻“和平统一”,借助铁树开花之难来表达自己对南北和议、和平统一矢志不渝的坚持。^[13]除此之外,吴军所做的《回防途次》一诗,也为时人所传颂,称赞不已。这首诗主要表达吴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豪情壮志,以及以家国天下为重的儒将情怀。吴佩孚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这个载体,将自己刻画宣传成一个为国为民、有情有义的儒将形象,以此来获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综上所述,吴佩孚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以及借助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社会舆论宣传,为自己以及直系打造成了一个合乎历史潮流,社会公众拥护与支持的新形象。从这点看,吴佩孚的舆论宣传可谓是极其成功的。

三、国民利益的代言人

作为军阀,同时也是政治家的吴佩孚,在舆论宣传过程中必须明白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规范。“当政治家作为传播者出场时,他们同样得按照自己特定的角色规范行事:‘代表’政党、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利益;对政治同盟的期望做出回应——他们的公众形象与同盟的荣辱休戚相关;以一定的方式换取选民的支持。”^{[3]133}而在舆论宣传的过程中,吴佩孚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民意的代言人,国民利益的争取者和捍卫者。

从《致苏李督痛言不可战之理由》到《致各省军民长官请求罢战主和》,驻湘期间吴佩孚之主和通电可谓是“无日不见于报端,皆以国计民生为前提”,这也使得“吴氏之宗旨,了然于国人心中矣”。^{[14]630}在此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吴更是旗帜鲜明的声援民众爱国活动,充当民意的支持者与

捍卫者。这也为其赢得“赤诚爱国,大义昭然,人民托命,薄海钦崇”^[15]的“爱国将军”的美名。可见,吴佩孚在面对当时重大的国是问题时,总是利用传播媒介旗帜鲜明的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充当民意的代言人与国民利益的捍卫者。

实际上,在衡阳撤防问题上以及北上途中,吴佩孚也都不失时机的强调其作为“民意代言人与国民利益捍卫者”的这一角色。对于衡阳撤防之缘由,吴佩孚就先以“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同属一家,并非外患仇讎,何须重兵防守”之言将自身的军事活动与公众期望联系在一起,以此来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后又以“一为顺兵心以保健国军,二位班师后整顿补充,作异日效命疆场之准备也”。^{[12]646-648}将撤防北归上升到为国为民之高度。不经意间已将自身“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根植到公众心中。

撤防途中吴佩孚倡导的“国民大会”主张,更是为其“国民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宣传。吴佩孚在其电文中言:“三年政若焚,局同釜破,舍谋统一,无以为救国之方”,针对这种时局纷乱的局面,吴佩孚认为:“惟有出于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16]吴佩孚本意是以“国民公决”的形式来抵制由安福系所包办的南北上海和会,为解散安福国会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这种站在“国民”的角度上“言民声,伸民意”的举动,也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吴之好感。鄂省两联合会致吴佩孚的函电中就言:“元日通电,辞严义正,言吾民之不敢言,为吾民之所欲为,淋漓痛快,深切民隐。洪宪以后,罕有仗义敢言如师长者”。^[17]总的说来,“国民大会”主张不仅使吴的威望与声誉在国人心目中进一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吴通过此主张也强化其作为国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

此外,吴佩孚在汉口与记者谈话中更直言:“顺国人之公意,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恶,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

体”。^{[18]39}此言足以表明,吴佩孚寄希望于通过舆论宣传将自己塑造成“国民利益的代言人”。

在北归的舆论宣传中,吴佩孚将自身角色定位为民意的代言人、国民利益的捍卫者,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秀才军阀”特有的政治智慧,既然吴以及直系要成为“民意及其国家利益”的代言人,那么毫无疑问,吴佩孚将在获取更多舆论话语权的同时,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尽管我们不能断言吴佩孚的政治主张完全出于国民利益的出发,没有掺杂派系斗争利益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吴佩孚通过这些主张,其个人及其直系的威望与声誉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四、利益与权衡——政治宣传策略

“在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军事和政治集团,为了保存和壮大自己,孤立有效地打击敌人,克敌制胜,都需要争取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6]453}这在直皖斗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早在1918年8月,吴佩孚占领衡阳后他就以“停战主和”姿态取得南军的好感,并且与之签订了《救国同盟军草约》。这个草约名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起见,并非有党见性质”^{[6]449},实则 是以同盟关系来反对皖系的卖国外交与“武力统一政策”。可以说,西南军阀与直系的结盟,对吴之撤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后吴更是积极与长期主张南北和议的江苏都督李纯通电联络,获得“主和派”长江三督的大力支持。针对河南易督问题,吴佩孚也是数次通电为豫督赵倜抱不平,使得一向在直皖矛盾斗争中保持中立的赵倜最终转向直系阵营,成为了以直系为核心的反皖八省同盟之一。吴佩孚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罢战主和”等主张的宣传,来组成同盟联合组织。同时也积极声援、联络中立者,来壮大自身同盟的力量,孤立分化皖系的势力。

当然,对于直系是直接对手皖系及其政策,吴佩孚则是不遗余力的大加鞭挞。这在其衡阳撤防北归前后的诸多电文中都有所体现。诸如对于皖

段的倡导“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就言:“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管环生。无一非内争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19]在致电苏督李纯时,吴也批评南北战争造成了“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期间,耗费款数千万,靡烂十余省,有用之军服,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20]的严重后果。对于皖派支持的安福系,吴更是发电抨击“安福系毒虺四海,腥闻天下。卖国党不除,能否长治久安?安福系私许权利,能滞得偿夙愿?”^[12]在此之后的舆论宣传中,吴佩服不断对皖系及其“武力统一”政策进行无情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其祸国殃民的丑恶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宣传策略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体现了吴佩孚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的某些特性。这种策略手法在传播学中被称为“辱骂法”,即“给某思想赋予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不检查证据就拒绝和谴责这种思想”。^{[21]109}这一宣传手法被吴佩孚广泛地运用在其公开发表的电文及谈话中,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五、电报大战——为直系争取舆论优势

古语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吴佩孚,更是深谙“名正言顺”之道理。近代,随着西方新式传播媒介的传入,报纸已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亦是公众舆论的重要平台。可以说,报纸是北洋时期体现民意的重要媒介载体。因此,军人政客利用通电来发表他们的政治宣言,一方面可以与公众展开象征性的交流,以争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就是为自身发动战争获取舆论上的优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吴佩孚在直皖战前的电报大战,正是出于“正义”的舆论宣传,以期把握战争主动权的目的出发的。

其实,说到电报战,吴可是北洋时期少有的高手,正所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22]158}。此外,“吴佩孚秀才出身,自胜一筹”^{[23]704},他的电文大多

仿用《讨武则天檄》、《讨粤匪檄》等古典格式,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写的可谓是慷慨激扬又富于文采,使人看之不免生敬仰之感,传诵一时,对舆论宣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吴佩孚的电文往往能把握舆情,切中要害,“凡所通电,主题突出,皆中肯要”^{[22]158}。

6月中旬,吴军撤防北归驻扎保定,此时直皖矛盾已经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可谓是一触即发。此时吴也积极展开了其舆论上的动员,从《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到《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可以说将传播学中的“辱骂法”使用的淋漓尽致。他用电报战的方式,将皖系、安福系、交通系的罪状尽数列于民众面前,进而占据了舆论的上风,使得民众一时“同情”吴佩孚^{[22]161}。相反的则是皖系“理屈词穷,师出无名”^{[1]98},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电报战的大获全胜,其实也预示着这场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斗争必然以直系胜利而告终的结局。

六、结语

综上所述,吴佩孚凭借着其政治宣传智慧,通过媒体发表的一系列通电和谈话,牢牢地掌握了舆论话语权,于是“皖系”与“安福系”成为被动的政治标签,而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而自身与直系,则被宣传成新的公众领袖与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形象,总是,吴佩孚撤防北归前后的舆论宣传活动,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对北洋政局产中了莫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濂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M]//近代史资料:第二十七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
- [2] 外人之南北局势观[N].申报,1920-07-13.
- [3] 杰伊·G·卢布姆勒,迈克尔·古列维奇.政治家和新闻界:一篇有关角色关系的论文[M]//奥利弗·博伊德,克里

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4] 默.时评:继续用武[J].申报,1914-04-27.
- [5] 章伯峰.北洋军阀:第3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 [6] 李新,李宗一主编,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7] 吴佩孚先生集编委会.吴佩孚先生集:上编[M].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0.
- [8] 国内专电·长沙电[N].申报,1918-06-05.
- [9] 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0] 吴佩孚由衡启行消息[N].申报,1920-06-01.
- [11] 吴佩孚抵湘情形[N].申报,1920-06-02.
- [12] 郭剑林.吴佩孚大传:上卷[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 [13] 吴氏咏铁树开花诗[J].晨报,1920-06-06.
- [14] 濂江浊物.吴佩孚正传[M]//荣孟源,章伯峰.近代稗海:第五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15] 津代表致吴佩孚电[N].民国日报,1919-09-15.
- [16] 吴佩孚提倡国民大会[N].晨报,1920-06-22.
- [17] 鄂省两联合会致吴佩孚电[N].湖南大公报,1920-07-04.
- [18] 得一斋主人.吴佩孚战史[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续编:第八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 [19] 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N].申报,1918-08-25.
- [20] 请看吴佩孚之主和电[N].晨钟报,1918-08-23.
- [21] 沃尔·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22] 郭剑林,汤爱民.关于吴佩孚评价的若干问题[G]//唐锡彤.吴佩孚研究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 [23]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汪红亮

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探索

朱沁瑶¹,黄燕²

(1.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经营模式,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伴随着农业市场化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许多弊端日益显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家庭经营的小规模和土地细碎化问题。对此,国家应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推动农村经济的制度改革。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过去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形式,农民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加上“吃大锅饭”的社会风气严重,懒汉能够获得和辛勤劳作的农民同样的回报,极大的侵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先是由农民自下而上推动了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全国推广,逐渐发展成我国农村的根本制度,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对农民来说,取得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支配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平均主义的思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是适应农村生产力而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变迁。^[1]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家庭承包制对农村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其弊端和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归根结底,这些问题的产生在于小规模生产和土地细碎化问题。孙雁等(2010)将土地细碎化定义为:受人为或自

然条件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呈现零散、小块、杂乱分布的状态,无法建立起统一规模化的经营模式。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52亩,明显低于世界人均耕地3.38亩的水平,且区域间很不平衡。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小规模分散利用的土地类型是阻碍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最大难题。^[2]正因为如此,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确定合理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的建立与发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突出难题。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现状

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水利设施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使生产经营的责、权、利相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关系,使劳动者的收益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3]314-315}在当时的农业生产背景下,手工劳动依然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全国农业生产发展还十分落后,农业生产还主要依靠畜力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朱沁瑶(1996-),女,江西九江人,福建师范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经济学。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2.html

人力,农民大都依靠经验来安排生产,因此小规模经营的家庭承包制很好的解决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业生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据统计,201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625.0万吨,比1978年增长约31148万吨,翻了一番还多。全国农机总动力由1978年的1.175亿千瓦增加到2016年的11.44亿千瓦,农作物机收、机播面积逐年增加,小麦、稻谷、大豆等大宗农作物机械作业面积大幅提高。以1978-2016的相关数据为例,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2016期间,我国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呈现了一个显著上升趋势,由此反映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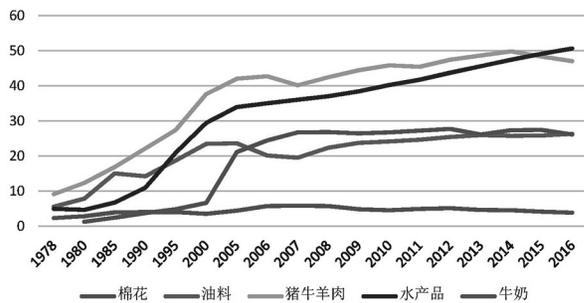


图1 1978-2016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公斤)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统计年鉴

在看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固有的弊端和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家庭经营规模狭小,土地分散,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收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模经济关系到大多数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如果一个农业市场是出于竞争状态的,对于生产者来说最佳的生产经营规模点就是平均总成本的最小值点($P=SAC=LAC=SMC=LMC$),这样的话生产者便能实现规模经济或者规模报酬递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按照每户家庭的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并将不同层次的土地均匀分配给每家每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农民平均承包的土地从8.35亩下降到更少的6亩,其中更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

亩,每户平均承包的土地大致被分成9-10块。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得农田分配碎片分散化,这给农民的生产经营带来极大挑战,一方面,农民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投入,另一方面,农业科技进步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土地上难以体现。加之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和农户数量的增加以及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农户最终承包的土地面积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分散的农田加大了土地的日常管理难度,影响了机械化操作的实施,给农户带来许多不便并因此消耗了许多不必要的体力支出。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并影响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的发挥。

2. 土地小块分散经营,农民缺乏组织纪律性,阻碍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和运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同样适应农业的发展,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显著差别就在于机器代替人力的程度。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参照农业生产发达的国家的做法,可以明确看到农业技术成果的运用和推广几乎贯穿于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这些国家将最新的科技充分运用到农村生活中,大力发展提高农村灌溉效率,普及农业生产机械化操作的知识和技能,全面推广生物技术并不断改革原始的耕作方法,这样一来,农业生产率和总体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承包制在全国推行后,未能及时找到一种新的适合农村新发展的组织形式,导致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所降低,形成了农户各自为政的局面,农民一方面缺乏扩大生产和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与知识储备,另一方面由于分散化经营,农民无需在生产经营中投入过多的时间,大规模的机器操作显得可有可无,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因此阻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3. 农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农户收入增速减缓,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近些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消费选择多样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农产品短缺的状况基本结束,农产品过剩、农民卖粮难的现象时有发生,

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愈发明显,直接后果便是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从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2003年已超过0.4,达0.479,2008年更是攀升到0.491。自2009年起基尼系数开始逐步回落,2016年已下降到0.465,但依然较高。这种情况下极大影响了农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和实际能力,不利于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隐患,在我国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一弊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显得更加突出。以2001-2016年为例,如表2所示,2001-2016期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收入比时常波动,但波动不大,绝对数值比依然较高。

表1 2001年至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情况

年份	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纯收入(元)	城乡绝对差距(元)	城乡收入比
2001	2366	6860	4494	2.90
2002	2476	7703	5227	3.11
2003	2622	8472	5850	3.23
2004	2936	9422	6486	3.21
2005	3255	10493	7238	3.22
2006	3587	11759	8172	3.28
2007	4140	13786	9646	3.33
2008	4761	15781	11020	3.31
2009	5153	17175	12022	3.33
2010	5919	19109	13190	3.23
2011	6977	21810	14833	3.13
2012	7917	24565	16648	3.10
2013	9430	26955	17525	2.86
2014	10489	28844	18355	2.75
2015	11422	31195	19773	2.73
2016	12363	33616	21253	2.72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统计年鉴

农民收入下降的原因表面上看在于农产品过剩,而这种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即那些符合市场需要的优质农产品比重还较小。^{[3]317-318}出现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家庭承包制下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供需矛盾,实行承包制后,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支持保护体系与相关政策还不能一步到位,需要一个较长的实施投入过程,导致处于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的农户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全面的市场信息和技术、购销、信贷

方面的服务,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就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4. 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难以得到尊重,农业资源浪费严重。

在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有的仅仅是使用权,因而农民无法根据意志自由支配土地。这项规定一方面束缚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另一方面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农民另谋生路的自由权。由于收入水平下降,许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又舍不得土地完全抛荒,许多地方出现了由妇幼老弱耕种的现象,且只挑较近较好的土地耕种,部分农民既不想放弃对土地的承包权又无法抵抗大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的诱惑,在留守耕地和外出就业之间游离,这导致农民中的兼业化愈加严重。因此,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土地荒芜现象屡见不鲜,农业资源被严重浪费。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目标和重难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所隐藏的弊端正在逐步显现,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产生了诸多矛盾,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专业化的发展进程。^[4]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而承包制立足于公平,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关于效率与公平重要性的讨论,从1993年中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都表明了虽然在特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能够统一,但客观条件的改变必然导致二者的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在初期帮助农业走出困境得到发展,但很快农业生产就陷于缓慢发展的境地中,城乡差距愈发明显。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具体表现在权利的不完全性、土地流转的低效益性与农民收益的非规模性,^[5]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应该围绕其内在缺陷展开。

1. 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所有权规定不明确,村、乡都拥有所有权,国家也时常根据需要征用土地,这就导致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产权概念的模糊又导致土地没有得到合理保护,土地资源浪费严重。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其它财产的产权一样,应当有明确独立的主体,并具备法人资格,执行集体经济的职能。^[6]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和职能分配可根据市场流通状况、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作适当的调整。实际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作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将逐步确立,从而推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2.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现阶段,土地的最终处置权仍归政府所有,农民不能够自由买卖、租赁、转让和抵押土地,当前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基本上还处于自发阶段,缺乏有效的市场中介和信息传递平台。同时,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权益关系、交易程序、执行原则和定价方式等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这些也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7]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就从体制上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扫除了障碍,让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成为可能。

3. 积极引导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

我国人多地少,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又使得土地分割频繁,土地细碎化问题突出。这不仅限制了农民的生产投入,而且由于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加之国家保障和支持政策落实力度的不够,导致农民无法承担起投资失败的风险,因而限制了农民的投资意愿,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极大的影响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从农户自身看,因受到自身知识水平和视野的限制,一般农户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国际农业技术变革的走向缺乏了解,大都靠以往经验组

织生产活动,生产中经常各自为政,随意性极大,不利于新产品的推广和应用,阻碍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此可见,发展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及时总结各地成功经验,并在适当地区推广。在社会服务方面也应大力发展合作组织,积极鼓励城乡的资金、人才、技术、物资、信息等通过各种形式合作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繁荣农村经济。^[8]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知识素养,进行定期培训,组成专家小组为农民讲解科学有效的生产方法。

三、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建议

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农业生产制度的一次良性变迁。也就是说,在进行制度变迁时,必须保证农民个人产权的持有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此外,还应保证土地使用权不被干扰和分散,同时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安排也能得到维护(黄少安,1995)。^[9]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制度就属于这类良性的制度变迁。(伍开群,2013)。^[10]黄少安(2008)指出制度变迁涉及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新制度在旧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产生。第二种是新制度由旧制度演变而来。第三种是旧制度中的一些部分自动消亡而诞生出新制度。第四种是旧制度总体不变而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引发了制度变迁。^[11]家庭农场制度是在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并没有脱离家庭承包制度的基本路线和核心观点,而是推动家庭承包制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家庭承包责任制度的变迁应属于第二种情况。

(1)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土地承包期将延长30年,这对于农村经济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都是极大的利好消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为此,相关部门应稳步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搞好土地承包的规范化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确保农民得到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此外,应加强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工作目的、意义、手续的了解和认知,提高农民的自我维权意识和素养。科斯定理(科斯,1960)中提到只要交易成本足够小,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不管一开始谁拥有产权,市场均衡后谈判双方会实现帕累托最优。^[12]应用到土地流转上可以说如果土地交易成本较小,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农民会逐渐掌握土地的使用权,这样便促进了家庭农场制的形成。因此,推进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改革,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便成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关键。

(2)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落实好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财政、信贷等扶持政策。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对社会化专业服务的需求高于小规模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健全的地方,例如,农产品价格波动大,政府惠农政策不到位,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解决的思路可以是政府在初期加大对适度规模经营的补贴扶持力度,例如,对经营规模农场的家庭进行财政补贴,还可以通过补贴相关的服务组织来支持家庭农场的运行,补贴可视情况取消。^[13]落实工作应从两方面做好:一方面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服务的规模化经营。对于兼业化问题突出的地方,政府应发展多种形式的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另一方面,支持引导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体制机制创新。金融机构应从融资、贷款、信用等方面加大对家庭农场经营的支持力度,帮助农户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3)发展多种形式并存的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并非越大越好,也不是某一固定的规模,适度规模经营的程度随家庭农场的经营能力而调整(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1996)。^[14]我国农业生产区域差异明显,各地应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提到了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各地应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带领群众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农业新道路。

参考文献:

- [1]伍开群.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到家庭农场[J].当代经济研究,2014(1):37-44.
- [2]罗必良,李尚蒲.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广东的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2(12):30-40.
- [3]陈征.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4]王蕙,李尚红.对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消极效应的若干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1):21-23.
- [5]陈爱娟,方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及其内在缺陷的经济学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4):69-72.
- [6]袁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与改革[J].理论观察,2013(8):71-72.
- [7]徐兆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流转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8,(11):526-529.
- [8]史继红.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J].理论导刊,2007(8):77-79.
- [9]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度土地土地经营权到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权”——理论矛盾、形成激励和解决思路[J].经济研究,1995(7):34-39+22.
- [10]伍开群.农场所有权形式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13(6):43-51.
- [11]黄少安.制度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5.
- [12]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C]//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6-147.
- [13]黄祖辉.转型、发展与制度改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
- [1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沿海地区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思路[J].管理世界,1996(1):177-186.

责任编辑:邱美玲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民族地区 精准脱贫的路径研究

何建功,武永超

(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针对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脱贫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创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新模式。新发展理念下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可遵循三大精准脱贫攻坚路径:加快推进民族地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维脱贫模式建设;高效发掘利用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资源;精准打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合作链条。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精准脱贫;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民族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展的特殊性,所以我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民族地区的发展,不断探索针对民族地区脱贫行之有效的良策。近年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例如,在建国后内蒙古工业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全面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在经济发展状况方面,内蒙古的经济增长速度蝉联全国第一。GDP的增速度在全国排名由先前的第24位增长到第16位;人均生产总值排名位列全国第八,连续六年在西部地区保持第1的桂冠。但是,这只是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依然比较落后,民族地区一直都是我国政府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之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一

次重申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发展所面临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落实党的新发展理念,让民族地区如期全面精准脱贫攻坚,在2020年同全国一道共同进入小康社会。党的新发展理念能够帮助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民族地区探索出精准脱贫攻坚多维新模式,走出一条精准脱贫新路径。

一、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战的现实困难

(一)生态环境脆弱,导致发展的机遇欠佳

民族贫困地区相对来说,自然条件恶劣,限制了民族地区的良性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地区脱贫和返贫的恶性循环现象。由于受自然生态的影响,制约了我国民族地区脱贫工作的进展。查阅地理文献资料发现,民族地方大部分散落在荒山野岭等自然生态脆弱区,同时我们也看以发现这些区域也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区。同

[收稿日期]2018-1-9

[基金项目]20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MZ026)

[作者简介]何建功(1990-),男,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治理与社会保障。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3.html>

时,与其他贫困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由于受生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信息等传播渠道制约缺少发展的机遇,造成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难度大。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民族地区与国内一般贫困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差异显著的原因。

(二)资源利用的模式落后,需求的精准定位不足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对特色资源使用的效率较低。因此,导致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攻坚面临一定的困难。由于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利用效率低,所以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攻坚需要重点解决好效率和精准定位两个问题。一是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切实转变民族地区传统的资源利用模式。而且绝大部分民族地方采用“大水漫灌”式的开发模式开发利用效率低。因此,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方的贫困现状。二是民族地区应科学发展精准定位需求。做好定位工作一直都是做好民族地区脱贫工作的难点问题。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条件不足与自主创新能力弱,所以国家需要需要针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但这也使得我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三)人口素质偏低,导致发展的后劲不足

要脱贫先扶智,人口素质的提升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由于受多重原因的影响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造成民族地区群众脱贫难上加难。第一,民族地区本身的教育体系不健全、教育设施落后、教育意识薄弱。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中,以高中教育阶段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在入学率方面,2013年除内蒙96.6%、宁夏88.4%基础较好外,新疆79.0%、西藏72.2%、广西78.0%以及民族人口较多的青海74.0%、云南72.1%、贵州68.0%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0%。甚至一些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更低,2013年云南省红河州民族比例占比较大的南部6县高中阶段的入学率仅为37.1%。由此可以发现,我国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第二,劳动者就业形式非常单一他们大部分所从事的是低端的第一产业。民族地区适龄人口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不大。第三,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导致脱贫攻坚缺乏一定的支撑,由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落后,以及自我发展的造血功能欠缺。因此导致实施精准脱贫攻坚需要注入更大的精力和成本。

(四)精准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脱贫攻坚难度较大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背景导致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往往与其他地区相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虽然我国目前制订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5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农村五保供养救助条例》等。这样一些法律的确为我国民族地方的脱贫工作提供了一些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依然缺乏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攻坚的专门性法律。因此,国家基本的脱贫制度可能并不总是能够契合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条件,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民族地区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群落散居、发展水平差异,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任务要求更为严格,需要国家出台相应针对民族地区脱贫的配套性法律。二是民族地区脱贫工作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政府在脱贫工作过程中出现政府管理缺位、管理越位、及滥用职权等现象,造成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无法落实的窘境。

二、新发展理念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可行

性分析

新发展理念下我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要做到精准,精准提升资源的利用能力、精准提升脱贫攻坚的效率。改善民族地方群众的生存面貌、增强动力以及强化国家精准脱贫政策对民族地区的支持等为主要内容。十九大发展新要求为我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科学指南。

(一)创新理念助力我国民族地区创新精准脱贫模式

传统脱贫攻坚模式缺乏体制支撑^[1]效能低下,造成民族地区的脱贫效果一直不甚理想。为了实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战略,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打造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带领我国民族地区同胞同步脱贫。民族地区的脱贫模式也要因地制宜有所创新,精准施策,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略尽微薄之力。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2016年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从创新体制机制、搞活金融市场、发展创业服务、搭建创业平台、激发创新活力、拓宽城乡创业渠道、加强统筹协调等九个方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政策,有利于新疆边远地区民族群众了解国家脱贫致富政策,尽早脱贫。施政者创新理念政策,能够为民族地区的脱贫提供有效的指导。

(二)协调理念提升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利用的整合能力^[2]

均衡发展是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要求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协调好政府部门的职责,助推民族地方与其他地区的均衡发展,精准瞄准脱贫攻坚对象,都要求协调我国民族地区的多方资源。民族精准扶贫是“一项协同性的集体行为,更是各方扶贫理念的一种协同,包括扶贫上下级、当地政府与外来扶贫者、社会力量、政府与贫困群体,以及参与扶贫各方的扶贫理念与扶贫行动的整合”^[3]。精准扶贫要将“微观脱贫与宏观脱

贫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个人和市场在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决定性作用外,更加强调通过顶层设计、整体施策,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公平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和政府在缓解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中的作用”^[4]。提高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利用的整合能力,坚守我国脱贫政策,处理好民族地方多方关系,有效提升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资源的配置效率,突破历史与现行因素的制约,把民族地区的工作看成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多方资源向我国民族地区倾斜。帮助民族同胞尽早脱贫。

(三)绿色理念助推生态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

造成民族地区脱贫工作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自然生态的脆弱性等原因。用绿色理念打造民族地区生态经济跨越式发展,是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攻坚的内在发展要求。如新疆乌苏市2016年“十三五”精准脱贫方案中就将生态保护脱贫纳入其中,强调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脱贫发展要重点突出生态脱贫,要坚持保护优先和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原则,把扶贫开发草原保护,与生态环境的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发展作为新疆地区民族群众脱贫的指向,多措并举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生态防护林建设等项目。同时该地创新生态资金的使用形式,利用生态建设和保护资金聘请当地富余劳动力充实到林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中。有机实现林业生态保护和脱贫的有机结合。帮助民族地区改善区域的脆弱生态、加强绿色生态建设、为减少民族地区的生态灾害树立一道绿色屏障。

(四)开放理念打造精准脱贫攻坚合作平台

开放的本质是鼓励多元参与。为了保证精准脱贫工作的实施效果,政府应当转变传统观念,敞开怀抱^[5],不管是民族党派、非公经济力量、民族宗教界人士、新阶层社会人士力量、海外战线力

量、社会工作主体都可以参与到我国民族地方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队伍中。在打赢脱贫攻坚的发展性问题当中,民族地方应以开放的姿态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精准脱贫,让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充分参与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当中。同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二十国领导集团峰会”、“亚信峰会”等这样一些高端会议及组织。加强我国与国际组织高端合作平台的建立,通过与国际组织建立长期高端脱贫攻坚合作平台,加强合作建立国际国内两套脱贫体系建设,切实加强民族地区脱贫的精准性。

(五)共享理念实现精准脱贫的惠民成果共享^[6]

共享理念强调脱贫效果的共同分享。共享是实施精准脱贫工作的最终价值所在,让民族地区群众共享精准脱贫成果是共享理念发展的要求。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解决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短板。切实使民族地区的全面脱贫攻坚做到切实如习主席所讲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决做到民族地方的脱贫做到“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意味着我国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或边远贫困地区的各族民众可以享受到共享精准脱贫带来的效益。充分保障发展成果为整个社会所共享,正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体现。解决民族地区整体区域性贫困现状,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社会的健康运转。

三、实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攻坚的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助推我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是引领民族地区取得脱贫攻坚战最终胜利的重要手段。在新发展理念下,实现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攻坚,可遵循以下脱贫途径。

(一)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维脱贫攻坚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倡导坚持以

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相结合,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做好济贫工作。以政府为导,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维脱贫模式是我国民族地区今后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的方向。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维脱贫模式:就需要政府加大脱贫资金支出,加大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项目的投入力度,突出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积极促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民族界精英人士的合作,保障参与主体的多元;通过市场的力量打造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攻坚的造血功能,以利益为导向使各参与主体在合作上达到共赢,给予热衷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事业的企业一定的政策优惠;引入社会工作力量介入到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当中,多元脱贫模式倡导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在这个模式中政府作为主要的主体,政府更多的是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来帮助民族地区贫困群众尽快脱贫;探索民族地区群众增加收益的形式,对于那些无力也没基础致富的民族地区群众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吸收支农资金,让民族地方群众与之成立合作社,带动民族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二)高效发掘利用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

我国民族地区的资源独具特色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攻坚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好民族地区独居特色资源,提升我国民族地区脱贫开发利用资源的效率。而民族地区要充分提升脱贫资源的效率就需要民族地区在精准打赢脱贫攻坚战中高效整合本地区的特色资源,要精准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积极助推我国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首先,要建立健全对民族地区脱贫资金的管理体系,按照《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纲要使我国民族地区的脱贫资金管理体系科学化,我国民族地区的脱贫资金管理应该因地制宜,结合本区实际发展情况灵活处理,在细化和完善资金管理制度的同时,又能够使我国民族

地区的脱贫资金管理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加强定期开展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评估工作,在民族地区不仅要精准投入脱贫资源,又要使脱贫资源的利用达到“精准”的要求^[7]。例如新疆自治区为了助力南疆脱贫攻坚印发《“十三五”南疆特色小城镇脱贫攻坚项目专项贷款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相应针对民族地区脱贫建设的优惠政策,能够为南疆特色小城镇项目的推进提供了总的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贫困地区脱贫的资金短板。最后,民族地区的各族党员干部群众要不断更新观念吸纳社会资源,要积极协调国内与国外两个主体参与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队伍中,民族干部群众要学会对社会资源汲取能力,调动充足的社会资源用以高效开发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

(三)建立民族地区产业脱贫和精准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特色产业资源,建立精准的特色产业脱贫机制有利于民族地区贫困群众快速脱贫。^[8]建立精准的产业脱贫增长机制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为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提供借鉴。第一,要建立民族地区产业脱贫的融资机制。这种融资模式是一种“政府选择产业+农民自主参与+金融扶持+企业参与”的新型模式,将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提供物质支持。第二,完善地区的产业脱贫的体系,将种粮补贴政策扩展到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原生态畜牧业领域。一是加大对比如像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畜产品储藏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二是设立民族贫

困地区专项培训使用基金。三是支持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建立民族特色畜牧产业合作社。四是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对生态产业的补偿体系。第三,完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支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民族精英人士、青年致富带头人、乡贤等,引领民族同胞发家致富脱贫攻坚。

参考文献:

- [1]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6(1):4-8.
- [2]刘解龙.经济新常态的精准扶贫理论与机制创新[J].湖南社会科学,2015(4):156-159.
- [3]穆莉萍.协同治理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9(4):44-48.
- [4]徐长玉.当前我国脱贫致富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对策建议[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05):50-52
- [5]姚茂华,龙永华,陈茜.民族贫困地区统战部门社会化扶贫模式研究[J].民族论坛,2015(12):81-85.
- [6]莫光辉.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多维精准扶贫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十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02):18-23.
- [7]莫光辉.价值导向与贫困治理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路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6(04):621-626.
- [8]苏海红,杜青华.“十三五”期基于精准脱贫视角的青藏高原区产业脱贫路径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6(03):122-127.

责任编辑:熊江鹏

反腐倡廉漫画的图像语义建构:基于视觉语法的多模态分析

张丽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反腐倡廉普法教育是我国普法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中,普法漫画作为新媒体发展下普法语篇多模态化的形式之一,起到了传递法律信息、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在视觉语法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2016年《人民日报》中涉及反腐倡廉的15幅漫画进行分析与统计,探讨其意义构建的方式,归纳出反腐倡廉漫画绘制的一般多模态特征,发现在人际意义、概念意义、构图意义三方面,普法漫画通过绘制近距离、面对面及俯仰等身体朝向的人物关系、读者旁观的无中介视角、类化风格的人物形象,采用低饱和度冷色调色彩,构建图像级差系统,绘制有象征意义的图像参与者,静态图像中绘制及物过程,整体上采用互补型图文关系以及图像内部采用扩展式融合型图文关系等方式,达到预期良好的普法效果。

关键词:反腐倡廉漫画;视觉语法;多模态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为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增强公民对法律常识的掌握,我国对普法教育这一国民教育的推行高度重视。普法教育(public legal education)主要形式之一,普法语篇(public legal education discourse),也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呈现多模态化,如普法漫画,普法动画,普法广告等,对这些多模态普法语篇普法功能的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MDA)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深受皮尔斯符号学(Semiotics)及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影响,将语篇意义构建的要素由单纯的语言系统及语义结构拓展至图像、声音、表情、动作等方面,使话语分析克服了一定自身局限性。本文沿用“视觉语法”(visual grammar)这一概念,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整合、统计并分析了2016年《人民日报》中涉及反腐倡廉建设漫画的具体实例,对其意义构建的方式进行考察并分析这

些普法漫画的多模态特点,以探讨这些普法漫画达到预期普法效果的途径。

一、反腐倡廉普法漫画与视觉语法概述

普法教育始于1985年11月,是由政府主导,以五年为一期,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后改为法制宣传教育)的一项国民性活动。普法效果与普法形式息息相关,从最初的传统单一语言模态普法方式,诸如手册、海报等,到现在的多模态漫画、动画、公益广告、微博等方式,而对这些多模态普法语篇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可被定义为“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因贪污腐败是当今倍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因其印象恶劣,后果严重,我国在建国之后便将反腐倡廉摆在了突出位置。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与日俱增与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在十六大首次提出“反对和防止腐败”,在十七大首次提出“反腐倡廉建设”,习主席执政之后,十八大、十九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张丽(1993-),女,河南漯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4.html>

大的召开,更是不断丰富充实发展了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方针和原则。在我国,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十分的必要。

视觉语法由 Kress 和 van Leeuwen 创立,将韩礼德的元功能(metafunction)思想发展延伸到视觉模态的交际行为中的一种单个图像分析模式。视觉语法的基本理论延承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和“语法是语言制造意义的源泉,在语言系统中体现为词汇语法”这两个观点^[1],且对应 SFL 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2],提出视觉语法三大意义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和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3]。

本文所指的视觉语法,是 2013 年由 Clare Painter, Jim Martin, Len Unsworth 等在理论层面进行了较大程度修正与补充后的视觉语法。Painter et al.(2013)将视觉语法从单一图像分析模式发展到了由多个图像组成的组图系统分析,在人际意义方面提出考察图像人物间关系的接近(proximity)系统,考察人物间身体姿态朝向的方位(orientation)系统,考察图像与读者互动以及图像提供何种阅读视角的聚焦(focalization)系统,考察图像所建构的情感基调的氛围(ambience)系统,考察图像人物表征风格的情感(pathos)系统和表情(affect)系统,以及考察人际意义的可分级实现方式的级差(graduation)系统;在概念意义方面主要讨论了参与者(participant)、过程(process)和环境(circumstances)三个要素;在构图意义方面主要构建了版面布局框架(layout)^[4]。从逻辑关系来看,各个意义之间,各个意义下的分系统之间均为合取关系。以上系统将在下文对反腐倡廉漫画的分析中逐一具体言明。



图一

二、反腐倡廉漫画意义构建分析

(一)反腐倡廉漫画的社会关系呈现

在 Painter et al.(2013)的视觉语法中,用以考察图像人物间人际意义构建的两个系统为接近系统与方位系统。通过人物之间的距离接近与否(closeness or otherwise)以及图像人物身体朝向(bodily orientation),前者可以较大空间隔开,或较为接近,或涉及近距离肢体接触等,距离较近代表一种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而距离较远则为一种较为疏远的社会关系,后者如直面对方,或肩并肩(暗示稳固关系),或相互偏离,或背对背等情况,来考察图像人物之间的社会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 Kress & van Leeuwen 的以框架表征大小(size of frame),考察的仅是读者与图像人物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权利(power)关系这些人际意义概念的理论。^{[4]16}

如在图二中,展示的是从“猎狐”专项行动,到“天网”及“红色通缉令”,我国的反腐行动织下天罗地网,不容一人逍遥法外的坚定信念。首先从二者身体朝向与姿态可看出关公与狐狸二者之间敌对的社会关系,身体距离较为接近,展示了关公紧随其后,对狐狸实施抓捕的可行性。关公与狐狸为俯视关系,体现了二者权力的高下立见,执法者终将伸张正义,将海外潜逃的违法犯罪者(海外一概念在单纯图像中未得到合理展现,但下方文字说明起到了补充作用,在下文中将就此进行分析)缉捕归案,体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执法信念。



海外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从“猎狐”到“天网”，再到“红色通缉令”，反腐的“国际天网”越织越密。据统计，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共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追赃金额85.42亿元人民币，“百名红通人员”已归案37人。这正是：

“狐狸”多狡黠，
避罪躲制裁。
海外非法外，
反腐不留白！

朱根华图并文

图二



近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宣布启动“天网2016”行动。从“猎狐行动”，到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再到集中公布外逃人员“红通”名单，追逃追赃的天罗地网越收越紧，必能让腐败分子在海外再无“避罪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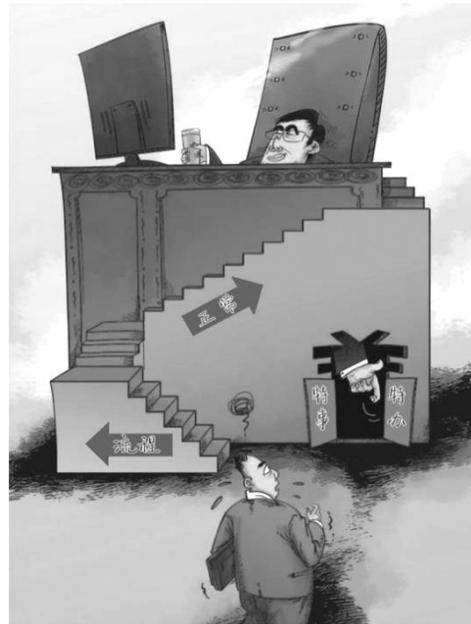
这正是：
贪腐罪责伤万民，
法之利剑悬头顶。
莫道天涯法难及，
顽鼠虽逃亦必擒。

贾 强图 吕 岩文

图三

而至于图像人物与读者的人际关系构建，Kress 与 van Leeuwen (2007) 在提供与求取 (offer and demand) 框架中提出图像人物凝视 (gaze) 读者即为求取这一主张，Painteret al. (2013) 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聚焦系统。聚焦系统通过眼神接触/

凝视 (contact) 和视角 (perspective) 两个参数在图像中的体现，来考察图像与读者的互动关系。^[4] 20 互动关系可分为两类，即图像人物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图像本身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如凝视可分为直接或邀请式 (direct/invited)，前者指图像人物正面凝视读者，后者指图像人物转头和/或回眸凝视读者；视角则通过有中介无中介 (mediated/unmediated) 区分了读者是否能够直观或较为直观地站在图像人物角度，参与到图像所描述的故事之中，抑或是以第三人视角旁观图像内容，而有中介方式又可分为引发 (inscribed) 和暗指 (inferred)，前者会在图像中出现可被读者代入的人物的身体部分，如手、脚或影子等，见图三，或通过在前景中描绘人物背部或通过肩膀，见图四，在背景中描绘所看到的眼前景象来建构读者与图像人物关联性与可替代性，建立一种双重有利地位 (dual vantage point)，后者则指在连续图案中构建这种可替代性，因本文中未涉及故暂不讨论。



特事特办，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在一些地方，存在特事特办被滥用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甚至拿特事特办作为享受特权的“挡箭牌”，让特事特办变味为“私事特办”，被群众嘲讽为“特事特办，腐败翻番”。

这正是：
有规有矩是长久，
特字滥用当可休。
言行法度无随意，
隐惠不存心自由。

曹 一图 那 山文

图四



图五 (最简 → 类化 → 自然)

如在图四中,描绘了前景中拿公文包人物的背影,通过这种跨越人物肩膀的身份认同图像构图方式(overshoulder of character with closer identification)可让读者代入其中,背景图中高筑的正常流程与特事特办的“钱型”暗门正是图中人物前景象,因而更易唤起读者的情感反应,更为直观地看到办事难,暗箱操作,官员拿钱办事这一系列社会现象。又如读者在观看图一时,与关公基本为平视,与狐狸为俯视,就体现了读者与关公为平等的关系,而俯视狐狸则读者本身为处于强势地位,在此处体现了普法的教育意义,即贪污腐败,携款潜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我国公民应以此为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

针对所刻画人物形象的表征方式,Painteret al.(2013)提出了情感与表情系统,并根据面部表征的真实度、表情刻画的不同方式,以及身体姿态与手势这三个维度来进行考察图像人物的表征风格,按具有活力(vigour)的程度以及读者情感介入的程度由低到高分鉴赏类(appreciative)的最简风格(minimalist)、移情类(emphatic)的类化风格(generic)和个体类(personalising)的自然风格(naturalistic),如图五所示。^{[4]30}其中,最简风格所展现诸如开心、悲伤等情绪的能力为最强,但会使读者与图像任务保持一定感情距离,而类化风格目的在于创建可辨识的一般人类。在普法漫画中,一般都选取绘制类化风格的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受因自身与图像人物外形相似而引发的参与感影响,更加客观地观看所绘图像,也会有异化(alienating)风格的出现,赋予日常情形以超现实的科幻色彩。^{[5]24}

如在图六中,图像人物在绘制时,考虑了脸部肌肉组织的构成,比如人物嘴唇的勾画方式不是单一的线条或者点,与真实人物较为相似,所以属于类化风格,这种风格的运用可以赋予图像人物以行为情绪(behaviour emotions),即与看、做、集中精力等相关的可展现活力的动作,并可对人物身体姿态与动作进行分析。读者可通过对图中人物扬头大笑的面部表情,以及翘着二郎腿的“潇洒”坐姿,感受到腐败分子对自身腐败行为的洋洋得意满不在乎,认为金额不大,就无伤大雅。以此来展现与抨击图中所指的“个别基层干部”的“雁过拔毛”式的腐败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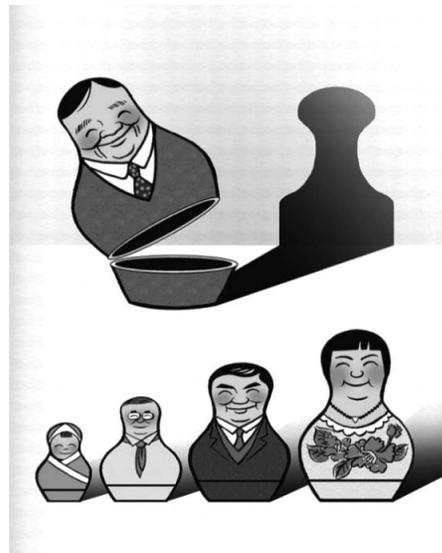


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在征地拆迁、涉农惠民资金、医疗卫生、农村“三资”管理、村级工程建设等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呈现出易发、多发的突出特点。一些干部频办“无事酒”,借机敛财,有的甚至私吞截留困难群众补贴、贫困生助学金。金额虽然不大,但是直接滋扰侵害百姓,贻害无穷。

这正是:
贪私利针尖削铁,
肥私囊黑鼠争穴。
伤民心雁过拔毛,
除穷小金瓶无缺。

王启峰图 吕 兵文

图六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提到,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近亲繁殖”现象引发公众关注。最近一年,中央巡视组、各地巡视组已披露多个国有企业单位的领导存在违规招聘近亲属问题,“萝卜招聘”、绕道进人、内部照顾等违规用人手段层出不穷。

这正是:
用人唯亲宦海深,
小家欢乐大家愁。
放眼门庭皆子侄,
只叹向阳易逢春。

孙宝欣图 吕 岩文

图七

Painteret al.(2013)的氛围系统认为颜色的人际功能在于其对读者产生的情感效应,将图像分为构建了氛围的图像与未构建氛围系统的图像,并从色度、色调、自然度三个维度考察彩色图像的情感氛围构建。但仅考察彩色图像是不全面的,原因在于除了简单的确实无情感氛围构建的黑白线条画之外,其他诸如构画了阴影、线影等,或强化了光影效果以构建氛围的黑白图像并不代表情

感氛围的缺失,而是情感氛围的淡化(down-play)。相较于注入式氛围(infused ambience)的彩色图像,单纯线条画之外的黑白图像可被归为缓和式氛围(defused ambience)范畴。因在其他学者研究中,基本都研究的是色彩激活式的图像,而对黑白图像不论在理论范畴内还是实际分析范围内均有所忽略,本文因而在此选择对黑白图像进行考察。同时,有学者认为,在氛围系统构建时可加入情态值这一概念,则框架更为完善,而不论是色度、色调或是自然度等,则可被归为情态标记的范畴内。^{[6]41}

如在图七中,读者可明显分辨出这是一副黑白图像,同时作者对黑白色彩的运用具有他的特殊用意。若该图以彩色来绘制,那么虽然能吸引到读者的注意力,贴近了生活中我们司空见惯的俄罗斯套娃,但这就让这幅图失去了深意,增加了搞笑色彩。而以黑白绘制,则让读者对图像内容感到陌生,更能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图像内容,从而对图像中的“套娃”的形象及表情产生联想与思考,方能体会到图像所展示的干部“近亲繁殖”这一现象。同时,图像的阴影运用也自有其用意,在图像上半部分的这位干部“套娃”的绘制中,读者如果仔细观看,可以发现作者为体现其身份,让其影子呈现为一个公章的形状。那么,对该图进行分析后可以得知,黑白色彩的运用,可以鼓励读者以冷静自持的态度去审视图像内容,并注意到图像在人物或背景绘制所进行了特殊处理的地方。

Painteret al.(2013)的级差系统是根据 Martin & White(2005)的评价系统而提出的。在 Martin & White(2005)评价系统通过对使用语言进行分析,揭示语言使用者的感情、立场与观念,也构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价值观念交流关系,而作为其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级差(gradation)这三大子系统之一的级差系统通过对态度的不同强度进行分级,构建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级差系统属于态度的调节范畴,分为语力(force)和“聚焦”(focus)两个方面,为与前文中聚焦系统有所区分,级差系统中“聚焦”将在文中加引号以示。其中,语力又分为量化和强化两种模式,前者包括总量(amount)(体积、比重和数量)、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远近及分布程度(scope and proximity in time and space),后者包括品质(quality)和过程(process)的强化;而聚焦又分为实体价和完成度。

^{[7]32}王荣斌(2007)将级差框架的观点运用到了视觉漫画的分析中,认为漫画中的语力强化表现为参与者的数量、大小、相对位置、及物型过程(对象)的数量、位置等,“聚焦”则表现在及物型过程本身或场景本身。鉴于王荣斌(2007)对强化的讨论是建立在 Kress 与 van Leeuwen(2007)的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这一概念上的,本文因沿用的是 Painteret al.(2013)的补充后的版面布局框架,故不再讨论这一方面。同时,“聚焦”所涉及方面,实体价与完成度,前者因与 Painteret al.(2013)的概念意义构建的描绘参与者特征部分重合在此暂时不提,后者据王荣斌(2007)所言,指的是动作过程的完成程度,“完整呈现的程度”,但因其对过程的进展并未构建相应等级系统,故在此不再讨论。

如在图八中,两位可辨识的残疾人,两人都衣着极为朴素,望“残保金”而疑惑沉思的绘制方式,比只绘制一位残疾人及其相关状态所呈现的作者的态度的程度要高,属于数量方面的级差应用。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并不认为漫画中的参与者大小表征与读者的距离,出于对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优劣势关系等诸多考量,漫画绘制者会在此方面有所取舍。如在图八中,所绘制的普通百姓与腐败官员所展现的体积大小,或所占空间大小差异明显,体现的不是官员与读者的距离更近,而是官员权力远压普通百姓的一种不平等权力关系。又如在图一中的“关公”与“狐狸”虽单独来看在与读者距离呈现上有所差异,但应被看作一个及物型过程整体来考虑,同时,二者所处图片位置不同,“狐狸”位于图片左下角,“关公”位于图片的中上部且所占版面较大,通过体积量化突出了反腐行动。

(二)反腐倡廉漫画的视觉概念表征

Painteret al.(2013)在 Kress 与 van Leeuwen(1996)对概念意义的构建三要素,即参与者、过程和环境的基础上,对三者进行进一步描述:如从描绘图像人物特征、辨别和跟踪人物时的人物重现形式,以及人物关系构建(在前文中所提的人际意义构建的人物关系构建,指的是图像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此处的概念意义的人物关系指的是人物的身份构建及特点描绘)方面描述参与者这一要素;从描绘动作过程,事件内部的动作间的展开或投射关系方面描述过程这一要素;以及从情景的增添或删减,以及情景的变换与否,且讨论场景未发生变化时视角是否发生变化,场景发生变

化时是为同一场景的内部外部变化还是由一场景变化至新场景等考察背景这一要素。^{[4]56}但不可否认, Kress 与 van Leeuwen (1996) 在对概念意义, 或再现意义的分类上——有矢量关系(vector)的叙述再现(narrative representation)和无矢量关系的概念再现(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二者——尤其是在对概念再现的分析上条理清晰, 值得借鉴。鉴于本文所选图像中, 不包含连续图像, 因而在此只讨论参与者这一要素的一些部分, 以及过程运用的一些特点, 不再分析情景变换方式。

如在图六中, 图像参与者有两个, 一个是个别基层干部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大雁。通过对身穿正装, 西服皮鞋领带一应俱全, 又带着眼镜, 这些特点, 都可以让人联想到有头有脸的公职人员, 对构建人物身份有一定作用。二者经由动作构成了一个及物性动作过程(transitive action process), 该动作为公职人员左手向上扬起, 手中拿有一根羽毛, 大雁在下方飞过。读者可看出这是公职人员在大雁飞过时拔掉了一根羽毛拿在手中这一动作过程的体现, 且右手中已经拿到了一把羽毛, 那也是已经拔过很多次羽毛的动的结果体现。同时, 通过“我可不贪心, 每次就拔一根”这一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的气泡呈现, 也构建了人物与话语之间的矢量关系, 可使读者意识到人物右手所持羽毛是反复多次的拔毛结果, 更引起读者对图像所描述现象的反感, 意识到这种腐败行为的多发, 易发, 反复的特点。

又如图七中, 一共有 5 个参与者, 分别均以“套娃”的形式出现, 参与者是以象征过程(symbolic process)以及分类过程(classificational process)的形式构建概念意义的。图像参与者均以“套娃”的形象出现, 但实际代表的是不同身份的人物, 而通过“套娃”这个概念的包装, 体现了一种“裙带关系”。同时, 图像上半部分的这位干部“套娃”为上级(superordinate), 而图像下半部分的这位干部的家属“套娃”们则为下级(subordinate)。通过这种外显型方式, 构建了一种上下级的从属关系, 展现了通过政府公职人员的职权之便, 违规招聘或特殊照顾配偶、子女等亲属, 这些腐败现象。

(三) 反腐倡廉漫画的视觉空间设计

Kress 与 van Leeuwen (1996) 认为, 构图意义将再现意义与互动意义进行整合以成为有意义的整体, 其构建可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 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取景(framing)和显著性(sa-

lience)。^{[3]177}通过对图像参与者诸如左右、上下或中心边缘的不同位置安排(类比于SFL中的主述位), 是否存在可将图像不同参与者分隔或联系起来的分隔线或框线等, 以及图像参与者因所处前景或背景、颜色、大小不同而导致的显著性不同的分析, 对图像参与者的不同地位, 图像参与者之间的意义构建关系, 以及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程度进行判断。其中, 信息值框架因过度主观化, 忽略了参与者社会因素, 过于笼统等原因, Painteret al. (2013) 通过对图文关系的版面布局(layout)的理论化研究对其进行了发展, 就模态间关系可分为文字与图像各占分隔开的一部分版面的互补型版面布局(complementary layout)和文字融入图像成为其一部分的融合型版面布局(integrated layout)。在融合型版面布局中, 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被分为扩展(expanded)和投射(projected)两种模式。^{[4]91}其中, 投射分为语言(locution)投射与思维(idea)投射, 以及非语言类声音(non-language sounds), 前者通过语泡(language bubble)的形式在图像中得以呈现, 见图五, 后者则不需要语泡来呈现。扩展模式可分为有文本块(text block)的恢复模式(reinstated)以及仅有文字呈现的放置模式(instated)两种(此处放置与回复的名字使用意指有文本块的模式是对文字的本身功能的强调, 相较于放置模式更多恢复了文字本身的功能性)。在放置模式中, 文字可直接呈现在图像参与者之上, 呈现包含态(subsumed), 抑或出现在没有图像参与者的空白区(有无底色均可), 呈现连接态(connected)。而在恢复型模式中, 文本块可用所绘制的图像参与者, 以物体形象(depicted object)呈现, 也可仅用几何图形的形状呈现, 同时, 文本块可用彩色也可采用黑白来作为背景颜色呈现, 这种文字以特殊背景出现的形式使文字的地位更高。其中, 区分包含态文字与恢复型模式文字的关键在于文字功能的高低, 前者更强调所处情景或语境, 后者更强调突出文字本身意义, 因此其分辨与图文重要性有关。与此相比, 在互补型图像中, 图像文字关系主要从图像与文字的对称性(axis)、重要性(weight)和位置关系(placement)三个维度加以考察。

融合型版面布局较为简单, 且易于辨识, 如图六中的“我可不贪心, 每次就拔一根”这句话以语泡的形式得以投射, 对图像内容起到了丰富和具体化的作用。在图八中, 文字以连接态放置模式

呈现,“招待费”、“考察费”和“各种费用……”出现在没有图像参与者的空白区域,是对捆住保险箱的绳索的一个附加说明,喻指抽丝剥茧式蚕食残保金,关乎扶贫对象切身利益。同时,“残保金”以恢复模式呈现,对保险箱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连接态与包含态图文布局的使用使图像所展现内容更加清晰明确,若缺少以上文字,图像信息恐会表述不清。



据调查,在一些地方,本该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生活的“残保金”,在使用和管理上乱象丛生。有的地区资金大量沉淀,“残保金”使用效率不高;有的则把“残保金”用作招待费、外出考察费,超范围开支现象时有发生。种种乱象,与设立初衷背道而驰,亟待整治。

这正是:
残保助残本姓“专”,
零刀割肉岂心安?
暗箱打破阳光照,
莫使关爱遭霜寒。

曹 一 图 杨立新文

图八



据调查,在部分地方,少数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吃拿卡要等惯用的违法方式外,一些更加隐蔽的手段,比如,有的干部搞“人情保”“关系保”,有的以帮扶为条件收取好处费,正成为蚕食脱贫对象利益的新常态。

这正是:
扶贫资金被人抢,
满嘴偷拿俱是奸。
手法翻新心术坏,
法当严治众开颜。

曹 一 图 滕山文

图九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人民日报的反腐倡廉漫画均以互补型版面布局呈现,体现了图像下方的文字描述与图像的互补关系,呈现上下关系(descending)的对称布局模式,漫画多以图像为主,读者首先被占大面积的图像吸引了注意力,鉴赏之后可看到下方文字描述,对图像所描述内容更起到了加深印象、明确化的作用。

三、反腐倡廉漫画的多模态特征

本文从2016年365份人民日报中,筛选出一共15幅反腐倡廉主题普法漫画,通过对它们的意义构建方式进行考察统计,得出以下数据,见图十,但因图像所表达信息的多样性,某一图像在某一系统的分析框架下,所占特点常不止一个,因而,比例间的相加总和并不是百分之百,而只考察某单一特征所占整体比重。

反腐倡廉普法漫画作为视觉图像,可选择的呈现方式确实多样,但经过对语料的考察,也可发现一些规律。

其一,就人际意义构建而言,反腐倡廉漫画倾向于绘制近距离,面对面及俯仰等身体朝向的人物之间关系,这是因为漫画意图在于刻画腐败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构建百姓之间的亲密平等关系;倾向于通过读者旁观,无中介视角来进行绘制,这主要是因为漫画更多希望读者能以客观的态度来理解漫画意图;倾向于在人物形象绘制时选择类化风格,以使读者能够将图像人物识别为无特指的一般个人;倾向于选取低饱和度、冷色调的色彩,以使读者对图像内容持一种冷静而警惕的态度;倾向于在图像中构建级差系统。

其二,就概念意义构建而言,反腐倡廉漫画倾向于刻画有象征意义的图像参与者,通过构建象征意义使图像更加生动形象,也从而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倾向于对及物过程的描绘,图像多为静态图像。

其三,就构图意义构建而言,反腐倡廉漫画在整体版面布局上采用互补型图文关系,即图像在上,文字在下的模式,图像为主,文字为辅;同时在图像内部,多选取融合型图文关系,文字多以图像参与者形式出现,为恢复型拓展关系,更强调文字本身的意义,使意义表达更为充分。

		比例			
人际 意义 构建	接近系统 与方位 系统	接近 程度	近	73.33%	
			远	26.67%	
			其他	6.67%	
		身体 朝向	面对面等亲密关系	53.33%	
			俯仰等权力关系	60.00%	
			其他	13.33%	
	聚焦系统	互动眼 神接触	接触	6.67%	
			旁观	93.33%	
		视角	有中介	13.33%	
			无中介	86.67%	
	情感与表 情系统	最简风格		6.67%	
		类化风格		93.33%	
		自然风格及异化风格		0%	
	氛围系统	饱和度	高饱和度	26.67%	
			低饱和度	73.33%	
色调		暖色调	13.33%		
		冷色调	86.67%		
级差系统	语力	量化	66.67%		
		强化	0%		
	聚焦	实体价	0%		
		完成度	0%		
概念 意义 构建	参与者	有象征意义		93.33%	
		无象征意义		6.67%	
	过程	动作	及物	86.67%	
			不及物	33.33%	
		言语		6.67%	
心理		26.67%			
构图 意义 构建 (图文 关系)	融合型	扩展	放置型	包含态	26.67%
			连接态	6.67%	
		恢复型	图像参与者	73.33%	
			文本块	0%	
			彩色	80.00%	
		黑白	13.33%		
	投射	言语		6.67%	
		思维		0%	
	互补型	对称	左右		0%
			上下		100%
		重要性	图像为主		100%
图文地位均等			0%		
文字为主			0%		
位置 关系		相邻		100%	
	分隔		0%		

结 语

普法漫画是我国普法语篇多模态化的形式之一,在我国的反腐倡廉普法教育中起到了传递法律信息、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本文基本借助于视觉语法的理论框架,同时对Painteret al.(2013)在在视觉级差这一概念上进一步整合学界观点,加以补充以弥补不足,并通过2016年《人民日报》中涉及反腐倡廉的一共15幅漫画进行实例分析与统计,首先探讨其人际意义、概念意义和构图意义构建的方式,而后归纳出反腐倡廉漫画在三方面意义的多模态特征,最后发现普法漫画通过绘制近距离、面对面及俯仰等身体朝向的人物之间关系,读者旁观的无中介视角,类化风格的人物形象,低饱和度,冷色调的色彩,图像级差系统的构建,有象征意义的图像参与者,对静态图像中的及物过程,整体的互补型图文关系,图像内部的扩展式融合型图文关系,达到了图像预期的良好的普法效果。本文对我国当前普法漫画的意义构建模式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并对日后同类型普法漫画的绘制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因所选语料数量有限,且因未涉及连续图像,因而存在一定自身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78:39.
- [2]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 外语学刊, 2007(5):82-86.
- [3] Kress, G. &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13-175.
- [4] Painter, C., J. R. Martin & L. Unsworth.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Image 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M]. London: Equinox, 2013: 15-103.
- [5] 冯德正. 视觉语法的新发展:基于图画书的视觉叙事分析框架[J]. 外语教学, 2015(3):23-37.
- [6] 张敬源. 关于视觉语法的几点思考[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3):38-42.
- [7] 王荣斌. 图文话语中的态度研究[D]. 浙江:浙江大学, 2014:32-33.

责任编辑:钟晓红

青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的科学立法完善

——以“扈强案”为切入

封韬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随着我国青少年犯罪近年来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凶残化的趋势,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条款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正受到质疑和挑战。“扈强案”所引出的问题是:当面对具有明显反社会人格的,比成年人更加残暴冷血的未成年罪犯时,如何通过科学的刑事立法实现罚当其罪。降低刑事责任的做法是草率且无效的。应当废除以年龄作为单一要素的立法观念,代之以“年龄+情节”的量刑模式,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的刑事责任立法,实现青少年犯罪的罪刑相适应。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科学立法;扈强案;量刑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一、案情简述与问题提出

2013年12月1日清晨,山东省东营市一所警察学院特警班的学生扈强,因琐事持刀连捅同学十余刀致其死亡。而距离此次作案五个月前,扈强曾用刀将人捅成重伤。案发当天清晨出早操时,在学生公寓楼一楼大厅,他趁宗磊不注意,先是一刀捅在他脖子上,捅进去之后又横着划了一下(尸检鉴定证实被害人脖子上有一个长达9cm的创口)。这一刀之后,扈强又冲着被害人胸部、腹部等要害部位捅了10多刀。“我当时就想割了他脖子动脉,就想让他死。这样我就会进去,进去后家里也不用管我,这样家里就没有我上学、就业、买房的经济负担,我在里面有吃有喝的,我家里最多给宗磊出个棺材费。”

2014年12月30日,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被告人扈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宣判后,扈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而东营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最终,考虑到扈强人身危险性大、可

改造性差、主观恶性极深,且死者亲属强烈要求对其从重处罚,日前,法院决定改判扈强无期徒刑。^[1]

对比近几年来那些引起一定社会反响的青少年恶性犯罪案件,“扈强案”可以说在犯罪手段的残忍、犯罪意志的坚决、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峰值。因此当该案被媒体公开后,特别是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之后,公众的舆论铺天盖地地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这种级别的舆论浪潮可以说是以往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中前所未有的。在公众的愤怒指责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甚至“取消刑事责任年龄”,这样的声音并不少见。

如果我们仅单从法律条文来进行逻辑推演,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针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其最高的刑罚就是无期

[收稿日期]2017-12-13

[作者简介]封韬(1993-),男,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5.html

徒刑。同时,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年龄要素是法定的减刑情节,那么,按照法条逻辑,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在无期徒刑的基础上再减刑,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审法院由此得出的十七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反倒是二审的无期徒刑判决从法条角度来看排除了第十七条法定减轻处罚条款的适用,这实际上是超越了法律条文的。

尽管大多数理性公民都会愿意给犯下错误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当这个未成年犯罪人相比于成人更加残忍、冷血,犯下如此残暴的杀人罪行且丝毫没有悔改,甚至说出“我在里面有吃有喝的,我家里最多给宗磊出个棺材费”这样的话,哪怕是再渊博的法学家,也会觉得仅十七年的有期徒刑并不能做到罚当其罪。其实有时候,未成年犯罪人身上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冷血,更让人不寒而栗。如前所述,扈强案的二审判决是在超越现行立法的情况下,通过检察院的抗诉,从实质意义上“破格”做出的,当然这一结果最终也让大多数人所接受,且形式正义的目标最终都要指向实质正义,但对于刑事立法,还是应当及时变革,以在下一个扈强出现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从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趋势来看,这其实已是迫在眉睫。

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可取

如前所述在扈强案中,夹杂在舆论浪潮中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十分强烈,公众的这种合理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只是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如果迈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这一步,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我国否定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扈强案虽然社会影响极大,但若据以此否定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仍要有所考量。当然更重要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实并未切中要害,因此收效甚微。

(一)公众“合理愤怒”的本质

公正的这种愤怒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公正世界假设(just world hypothesis)。即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尽管大多数的社会人能理性地认识

到这个世界并不公平或者只是相对公平,但是他们潜意识里还是愿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界公正假设导致的一个方向就是复仇情绪。各类复仇题材的影视文学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就是因为符合了人们心中的公正世界。公众的“合理愤怒”,本质上还是一种感性的认知。当然,任何人在听到扈强案的案情与一审裁判结果时,都会感到愤慨、不平。更有甚者希望自己可以充当执法者。笔者并非是在贬低公众这种朴素的法感情,只是,人们在沉浸于个别极端案件中的愤怒中时,自身的想法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极端、非理性。而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可以说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即当公众普遍偏离理性而整体越发暴戾,且试图蔓延发泄到其他领域时,法律给予了最后的一条红线。“因此,参加裁决的是公众的情感而不是理智。”^[2]但是只有公众的理智应该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应该由政府控制和调节。“扈强案”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实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

(二)刑法的谦抑性与比例原则

谦抑性是刑法的固有特征,尽管它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总的来说,它的核心在于刑事立法的“限缩”,即刑事立法者只有在确属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将一般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这也体现了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刑法的这种“限缩”和谦抑,才使得刑法在公民心中的权威性和敬畏感在其他部门法中相比之下程度最高。比例原则本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主要规制的是行使行政权力的限度,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在合法的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将比例原则合理地引入刑事司法活动中是十分有价值的。其实谦抑性和比例原则的内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其价值目标是追求合理的“良法”。边沁曾说:“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我国在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原因,以严厉的刑法来震慑犯罪是有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程度的不断完善,法律一定是越发温和的。因此,青少年犯罪有着深深的社会烙印,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在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并没有因为对其严厉治理而减少,相反,随着大量务工人员涌入城镇,流动青少年和‘留守儿童’增多,导致流动青少年犯罪和留守儿童犯罪不断增加。但该现象也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产物,最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减少。”^[3]诚然,法律条文永远不能涵盖所有的违法情节,当出现类似“扈强案”可能导致巨大社会反响的案件时,确实需要考虑科学地完善刑事立法,只是理应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并兼以考量刑法的谦抑性与温和性。一刀切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显然并不可取。

三、青少年犯罪立法的科学进路

(一)以修复性司法的理念为纲

修复性司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也并不只对青少年犯罪。只是基于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其理应以修复性司法的理念为核心,进行各项科学立法活动和刑事司法程序。修复性司法强调对法益侵害后果的弥补、修复,而不是单纯地在公权力角度惩罚犯罪人。正如霍布斯所说:“在报复中,也就是在以怨报怨的过程中,人们所应当看到的不是过去的恶大,而是将来的益处多。”^[4]因此理论上在刑事案件中,并不止于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甚至不是将其置于与公权力同等地位,而是要优先考虑具体的个体关系,因为犯罪首先是对人及人与人关系的一种侵犯。因此在刑事审判前,应当积极地组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调节工作,促使其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对话关系,以期犯罪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从而真诚地忏悔,更好地补偿被害人或其家属,而被害人通过沟通交流也有更大的几率对加害人表示谅解,并使自己的权益得到更好地弥补。修复性司法的核心问题就是将司法的国家权力本位理念向个人权利本位理念转变。^[5]在这个层面上,刑事司法系统的各个部门,在侦查、公诉、审判阶段应当积极主动地促使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而非作为公权力冷眼旁观,即应立足于修复而不是惩罚。参照国外司法经验,对于轻罪可以直接形成协商补偿方案而免于起诉,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则可以在审判中将这一情况作为从轻情节来考量,同时充分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可接受改造性。至此,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各方面的

救济,加害人主动承担其责任,国家的青少年犯罪政策得到更好地贯彻,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可以说是一种多赢的局面。

(二)年龄+情节的立法模式

关于第十七条第三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笔者认为,该条以年龄作为唯一要素,且是法定从轻或减轻刑罚条件,并不十分妥当。它很容易被不当地解读为:只要不满十八周岁,那么无论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都能够减轻处罚。从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对青少年造成一种鼓励犯罪的不好的暗示。但是,如果只是单纯地将该条中的“应当”修改为“可以”,即使之成为酌定量刑情节,似乎又赋予了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而我国各地区的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各不相同,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官很难说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大价值衡量基准,甚至有时会差异巨大。且当前民意普遍多边、非理性的前提下,尤其是这种酌定量刑情节更容易被民意所裹挟,法官容易迫于民意或舆论压力做出有违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过重的判决。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该条款,还是保留“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原则,辅之以一些具体的反面情节为例外,参照我国刑法目前对于老年人死刑适用的相关规定,完全可以将该条款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完美解决“扈强案”的法律适用窘境。此外,参照我国的死刑复核制度,该条款亦可以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原则上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法官基于相关情节认为不宜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可以报上一级法院核准后作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决定。”

总而言之,就是要抹除将年龄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定量刑情节的立法模式,代之以“年龄+情节”的立法模式,赋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上亦可作出由“上一级法院核准”的相关规定。使其针对极少数的未成年犯罪人,有法律适用的依据。

(三)其他相关条款的立法完善

关于刑法第四十九条:“犯罪的时候不满18

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据此有人认为,该条的未成年犯罪人的死刑适用也应做例外规定,即增加譬如“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可以不排除适用死刑。”等类似条款。这种观点在扈强案的舆论高潮时期尤为强烈。笔者认为该观点实属矫枉过正。在当前无论是从国际潮流还是国内形势来看,死刑的限制乃至废除都是大势所趋。时至今日,在任何一个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里,都没有因为死刑被废止而导致血案犯罪率上升。^[6]我国自刑法修正案八大规模地废除死刑罪名以来,便从没有再增设死刑罪名。尽管如前文所述,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恶劣程度,使公众的愤怒波及到刑事立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立法显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公众的期待,倘若立法开设了对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刑的先河,那后果无疑是不堪设想的。当前对于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域外,都应到无期徒刑为止。

对第十七条第二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以列举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八种行为未成年人须负刑事责任,但是这样列举行为的方式是有疏漏的,譬如在这八种行为之外但造成了被害人死亡或重伤等严重后果的,如绑架致使被害人死亡或重伤、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人员伤亡的,立法便没有处罚的空间;此外,在这八种行为类型中,“贩卖毒品”这样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尽管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极大,但相较于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还是并不匹配的,此外,我国刑法关于毒品犯罪还规定了制造毒品、运输毒品等行为模式,而该条仅规定了贩卖毒品,不免让人费解。

总的来说,关于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受制于早期立法的历史局限性,其严谨性与科学性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列举+兜底的方式来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范围,同时关于列举的罪名的社会危害程度应保持相对一致。笔者建议如下修改:“已满十四周岁不

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放火、爆炸、投毒罪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四、结语

无论如何,我国当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依然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因此,无论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抑或是开放未成年人死刑适用的立法等观点,实在是过于暴戾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青少年犯罪近年来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凶残化的趋势,社会经济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成为滋生青少年犯罪的“肥沃土壤”^[7],如果立法依旧按兵不动,也不可取。对此我们应当严格把握好打击犯罪与保护未成年人之间的尺度,“注重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尤其注重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力量的积极参与。”^⑧通过精细而独到的刑事立法,稳妥地规制青少年犯罪。

参考文献:

- [1] 法制网:14岁警校生捅死同学被判无期 称就是想让他死[EB/OL].(2016-09-26) [2017-12-21].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6-09/26/content_6816179.htm?node=81775.
- [2]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60.
- [3] 石艳芳.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新探[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1):41-46.
- [4] 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 [5] 李晓明.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204.
- [6] 巴丹戴尔.为废除死刑而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6.
- [7] 钟其.转型社会青少年犯罪成因剖析——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J].浙江学刊,2007(5):196-200.
- [8] 于华江,朱建美.试论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从英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借鉴的视角[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11-116.

责任编辑:钟晓红

民事伴侣关系立法模式的域外经验探析

朱琦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通过对不同国家调整民事伴侣关系这一同性伴侣结合和无结婚意愿的异性伴侣结合法律制度的介绍,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婚姻型、伴侣型和折中型三种立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现代多元婚姻观对传统婚姻制度带来的挑战,提出了现行婚姻家庭制度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思考。

关键词:民事伴侣关系;立法模式;域外经验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同性恋群体争取与异性恋人平等权的诉求日益强烈,现代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与接纳态度也日渐开放,逐步催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调整民事伴侣关系的立法。然而,由于传统婚姻观念、生育观念、社会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同性伴侣关系仍然未予法律层面上承认和保护,即便业已建立这一法律制度的国家,其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说,民事伴侣关系立法是现代与传统、进步与保守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产物。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同性伴侣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将同性伴侣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将是大势所趋。因而,我们对有关国家调整民事伴侣关系立法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事伴侣关系的基本含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安排

(一)民事伴侣关系的法律表述

民事伴侣关系通常是指同性伴侣结合和无结

婚意愿的异性伴侣结合的法律关系。这个概念起源于丹麦的“民事结合”(civil union),目的是给同性伴侣提供类似婚姻的权利、福利、义务,后来被大多数国家借鉴,是接近婚姻的一种关系。在一些国家它还可以用来表示没有结婚意愿的异性恋间非婚同居关系的结合。关于民事伴侣关系各国使用的表述有所不同,在丹麦、新西兰、瑞典、瑞士及美国的部分州均采用了“民事结合”(civil union)的表述^[1];英国采用的是民事伴侣关系(civil partnership)的表述;荷兰、比利时及西班牙均采用“同性婚姻关系”(same-sex marriage relationship)^[2];法国则采用“民事结合契约”(pacté civil de solidarité)^[3];德国采用“生活伴侣关系”(life partnership)^[4]。

(二)民事伴侣关系的立法概貌

目前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同性婚姻与民事结合在全球五大洲得到合法化,全球范围内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达到27个。在欧洲承认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主要有:丹麦(1989-2012;只适用同性伴侣)、冰岛(1991;开始只适用异性伴

[收稿日期]2017-12-22

[作者简介]朱琦(1993-),女,江西兴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法律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6.html

侣,从2006起不分性别公平适用)、挪威(1993-2009;只适用同性伴侣)、瑞典(1995-2009;只适用同性伴侣)、冰岛(1996-2010;只适用同性伴侣)、格陵兰(1996;只适用同性伴侣)、荷兰(1998;不分性别公平适用)、法国(1999;不分性别公平适用)、比利时(2000;不分性别公平适用)、德国(2001;只适用同性伴侣)、芬兰(2002;只适用同性伴侣)、卢森堡(2004;不分性别公平适用)、安道尔共和国(2005;不分性别公平适用)、英国(2005;只适用同性伴侣)、捷克斯洛伐克(2006;只适用同性伴侣)、斯洛文尼亚(2006;只适用同性伴侣)、瑞士(2007;只适用同性伴侣)、希腊(2008;开始只适用异性伴侣,从2015年起不分性别公平适用)、匈牙利(2009;只适用同性伴侣)、奥地利(2010;只适用同性伴侣)、爱尔兰(2011-2015;只适用同性伴侣)、马恩岛(2011;只适用同性伴侣)、列支敦士登(2011;只适用同性伴侣)、泽西岛(2012;只适用同性伴侣)、直布罗陀(2014;不分性别公平适用)、马耳他(2014;不分性别公平适用)、克罗地亚(2014;只适用同性伴侣)、安道尔(2014;只适用同性伴侣)、塞浦路斯(2015;不分性别公平适用)、爱沙尼亚(2016;不分性别公平适用)、意大利(2016;只适用同性伴侣)。

当前在亚洲民事伴侣关系的立法状况是:2015年3月31日,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的议会通过承认同性伴侣的法案,4月1日起生效,这是全亚洲第一例承认同性伴侣的地区法规。同年11月5日,日本的世田谷区也将根据相关条例接受“伴侣宣誓书”申请。2017年5月24日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针对同性婚姻是否违反宪法做出了解释,表示目前台湾的《民法》不允许同性结婚,被判定为违宪,自此台湾地区也成为亚洲第一个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的地区。这对于亚洲同性平权群体来说意义重大。

此外,以下国家和地区正在讨论民事伴侣关系入法问题: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古巴、以色列、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下加利福尼亚、巴拿马、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圣马

力诺、塞尔维亚、泰国、百慕大、委内瑞拉等。^[5]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民事伴侣关系立法呈现出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多数国家的民事伴侣关系立法目的都在于保护同性伴侣关系;二是对民事伴侣关系予以法律承认的国家多集中在欧洲;三是对民事伴侣关系予以法律承认的国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二、民事伴侣关系立法模式的域外经验

考察多数国家的民事伴侣关系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婚姻型立法模式

婚姻型立法模式是将民事伴侣关系等同于婚姻关系加以保护,同性伴侣可以完全享有与异性婚姻相同的权益,将婚姻制度同时适用于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

婚姻型的民事伴侣关系立法以西班牙为代表,2005年7月2日,西班牙国民议会(The Congress of Deputies)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次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同等的权利,并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子女。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最初是由各个自治区的章程规定同性伴侣以民事结合或者合法合伙的形式同居。^[6]直到2005年在全国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许多人反对同性婚姻是认为它改变了婚姻的意义。但是西班牙立法者并未从这个层面回应争议,而是主张缔结婚姻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巧妙地回避了不利于同性婚姻立法的问题。

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各种利益、各种信仰、各种观念的妥协和平衡的结果。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体现了法律的完善和自由平等的实现。立法者阐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要依据为《西班牙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承认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一样享有缔结婚姻的权利,赋予宪法条款的实践意义。^[7]从立法意义上看采用婚姻型立法模式的西班牙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更能深刻同性伴

侣结合法律保障之路的意义,并将对宪法精神的遵守和对人权的尊重真正落到实处。

(二) 伴侣型立法模式

伴侣型立法模式是区别于婚姻模式的同性伴侣身份立法模式,采取伴侣型立法模式国家有:英国、德国、丹麦等国。采取伴侣型立法模式国家和地区将同性伴侣身份结合与婚姻法调整的异性配偶身份结合进行了区分,同性伴侣的结合适用同性伴侣关系法调整,异性配偶结合用婚姻法调整。

伴侣型立法模式以英国为代表,2004年《民事伴侣关系法》出台,它的适用主体仅针对同性伴侣。该法共计264条,按照地域区分英格兰及威尔士民事伴侣关系、苏格兰民事伴侣关系、北爱尔兰民事伴侣关系及涉外民事伴侣关系。英国的民事伴侣关系的成立以登记为必要条件。由于同性恋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仍处绝对的非主流地位,出于对民事伴侣安全的考虑,登记机关将只公示他们的姓名和职业,而不公布他们的住址。这一点与异性婚姻不同,在异性婚姻的登记公示中,当事人的姓名、职业、住址都将被公开。这充分体现了民事伴侣制度的人性化。

英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英格兰1967年将同性恋行为“除罪化”开始,到2004年《民事伴侣关系法》出台,到2005年12月21日以来允许同性情侣缔结民事伴侣关系,再到2013年7月,英国同性伴侣婚姻法通过,直到2014年3月29日这项法律正式生效。在英国对同性伴侣法律权益保护的历程中英国的民事伴侣关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关键节点,基本赋予了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提供了几乎无差别的法律保障,让同性伴侣的身份得到法律的认可。

(三) 折中型立法模式

折中型立法模式是一种介于婚姻和同居伴侣制度之间的一种新型民事结合方式,以法国的“民事互助契约制度”(Pacte Civile de Solidarité,以下简称PACS)为代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法

国人就开始讨论同性伴侣的立法问题,但就此提出的多个方案均因时机不成熟而以失败告终。直到1998年,法国国民议会左派议员向议会提出《民事互助契约法》的提案,这一法案于1999年10月13日最终获得通过,PACS诞生。PACS是法国特有的同居关系立法模式,其主体涵盖了同性恋伴侣和无缔结婚姻意愿的异性恋伴侣,是提供人们的一种介于婚姻和同居制度之间的一种新型民事结合方式。在伴侣双方意思自治的前提下,PACS规定包括了物质上的互助义务和缔约双方的连带责任。财产方面,PACS合同订立前的双方财产独立,订立后如约定则为双方共有。但PACS合同不改变的双方当事人仍然是单身的民事身份。一方结婚,PACS合同立刻解除。

PACS的本质是共同生活的合同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依据自由意志确定,订立和解除手续相对缔结婚姻来的便捷,并且能很充分的体现自由意志,给没有结婚意愿的异性伴侣和渴望法律保护其结合的同性伴侣以相应的法律保障。实践证明了PACS在法国的受到欢迎的同时并没有威胁传统婚姻制度,而成为婚姻制度的良好补充和过渡,并为日渐普遍的同居关系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制和保障。

三、域外民事伴侣关系立法引发的思考

(一) 域外民事伴侣关系产生的背景

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文化也变得多元,同性恋属于其中一种亚文化现象。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和同性恋组织的壮大,自由、平等、民主等保护意识的不断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也变得多元,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也面临着挑战。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实质上是以共同生活为内容,两性结合与血缘联系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但是现在的社会需要决定了婚姻不再局限于两性间结合,同性间也应有结合的权利,同性的结合源于他们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他们的结合需要也已经成为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不能忽视的一部分。

随着同性恋群体平权的呼声日益增强,同性

间缔结婚姻关系的权利急需法律的保障,使得传统婚姻家庭制度面临挑战,首先婚姻主体要求发生变化,需要保障同性间结合的权利。其次同性伴侣结合相关权利和义务需要明确。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继承权、收养子女的权利等。相关民事主体的权利也需要法律的保护,包括收养关系中的子女的权利,同性伴侣父母的权利等。义务包括忠诚义务、同居义务、两者之间互负给予帮助的义务等。仅就我国同性恋者生活现状来看,据社会学家刘达临估测,当前中国男同性恋者约2000万,其中80%处于已婚状态或准备进入婚姻,据此估计中国同妻的数量至少约为1600万。最具有影响力的同妻志愿者组织“同妻家园”的统计数据显示,同妻在婚内遭受到家庭暴力和冷暴力的概率极高,婚姻满意度、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与普通在婚妇女相比均较低。同时,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中国艾滋病状况的报告显示,婚内配偶的艾滋病传染比例正不断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将“同妻”列入艾滋病易感人群。^[8]在相对保守和传统的中国国情之下,这些数据显然还是不完全统计的结果。可见同性恋群体在无法被认可的社会环境中并酿成同妻悲剧的状况下,需要改变传统的婚姻制度去保证其共同生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二)域外民事伴侣关系立法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突破

传统的婚姻制度中婚姻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其行为主体限于两性之间、缔结方式单一。当今婚姻立法模式渐渐走向了行为主体不限于两性、缔结解除方式更高效简便,并带来了婚姻制度基本概念、行为主体、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改变。

域外民事伴侣婚姻型立法模式改变了婚姻的基本概念,婚姻缔结的双方主体不再有性别上的限制,给予同性恋和异性恋同等的婚姻权利;伴侣型立法模式采取了单独立法的模式对同性伴侣缔结民事伴侣关系进行了调整,有区别地调整婚姻

关系和同性伴侣关系。该模式充分维护了原有的婚姻制度,虽然民事伴侣享受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都不及婚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事伴侣结合的需要与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对派的矛盾。尊重了民事伴侣主体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法有效的协议排除区别于婚姻自动归于他们的权利义务;折中型立法模式其主体涵盖了同性恋伴侣和无缔结婚姻意愿的异性恋伴侣,提供给人们的一种介于婚姻和同居制度之间的一种新型民事结合方式。它独立于婚姻制度,给予人们相较于婚姻制度更灵活变通的自由选择。其结合一般采取登记方式,比婚姻缔结手续更简便,效率更高。终止方式一般通过双方协议的形式,无需通过诉讼形式来进行解除,使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还能有效地避免双方关系恶化。

(三)域外民事伴侣关系立法带来的启示

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应当如何应对挑战,笔者认为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立“类婚姻”制度,就是本文提到的民事伴侣法律制度,给同性伴侣类似婚姻制度的身份保障。第二个则是扩大传统“婚姻”本身概念的包容度,把同性婚姻纳入传统婚姻范畴,对婚姻基本概念进行改变。在实践中可以针对同性伴侣包容度没有那么大的国家或地区先建立“类婚姻”制度可以调和与反对派的矛盾,同时及时为同性伴侣提供法律保障。在对同性伴侣已经足够包容的社会环境下,正式实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法律对同性伴侣关系的承认有助于同性恋者建立更稳定的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维护他们的情感依赖并实现生活上的互助,也能减少同妻悲剧的发生,增强社会稳定性和同性伴侣生活的幸福感。也能解决在同性伴侣共同生活中的争议,从而保障其应有的权益。无论是采取哪种形式法律对同性伴侣进行认可都有助于消除对同性伴侣的歧视使他们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尊重,给他们以保障和“走出柜子”爱下去的勇气,因为这本就是属于他们的权利。

关于我国同性伴侣的保护问题,在民众对同

性伴侣社会认同感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在我国同性恋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多同性恋者迫于压力进入了传统的异性婚姻,结果不仅害人且害己。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先出台一些保护同性伴侣的单行法规,让民众先了解同性伴侣关系的存在并消除对同性恋者的误会,认同他们并理解他们结合的正当需求。然后建立民事伴侣制度,采取确立互助关系的立法模式将同性生活纳入法律认可的范围中,将同性伴侣吸引到健康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中去,也让民众接受现实生活中的同性伴侣身份,再循序渐进地推进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相信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趋势随着多元婚姻价值观的建立会一步步推动同性伴侣关系的保护性法律制度在更多国家得到确立。

四、结语

虽然传统的异性婚姻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但民事伴侣制度的出现使得异性婚姻制度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独占地位被动摇,在法律上民事伴侣关系已在一些国家成为与传统的异性婚姻关系并立的法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国家也正在努力通过立法等途径将这种同性伴侣的结合关系和无结婚意愿的异性伴侣的结合关系纳入自身的婚姻家庭法调整范围中,可见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已经发生改变。说明在人们婚姻家庭生活观念和方式已实际发生了基础性变化的情况下,一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也应该适应变化进行调整。调整要以本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定国情为基础,并考量大众的价值观念的接受程度,努力平衡少数群体和大众群体间的利益,更好地实现法律保障的自由和平等的内在价值观念。对民事伴侣的立法模式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对不同性取向结合的立场、观点和

态度,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民事伴侣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同性平权的实现,使我们从更加广阔的视角观察民事伴侣关系对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带来的影响,最终有助于我们对民事伴侣关系作出满足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判断。

参考文献:

- [1] B.A. Robinson, "Religious Tolerance,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hommarr.htm-43k-Cached-Similar pages>, 于2016年10月访问,转引自熊金才:论同性结合的民法规范,北方法学2012年02期。
- [2] ILGA EUROPE, Same-sex Marriage and Partnership, <http://www.ilga-europe.org/europe/issues/marriage-partnership>, 于2016年10月20日访问并引用。
- [3] Civil Solidarity Pact Act (1999)(France).
- [4] Life Partnership Act 2000(Germany).
- [5] Wikipedia, Legal status of same-sex un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vil_union#cite_note-18, 于2016年11月23日访问并引用。
- [6] 参看:(西)Vid. JOSE-ALFREDO Caballero Gea Matrimonio "Contrayentes del mismo o diferente sexo. Separación y divorcio. Unión de hecho. Acogimiento y adopción. Violencia de Género, pensión impagada"一文, Dykinson, S. L. Libro-Editor, 2005年。转引自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探析陈阳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1月第23卷第6期。
- [7] 陈阳, 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探析[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107-115.
- [8] 唐魁玉, 刘冬. 社会建构中的“同妻”问题研究[J]. 学术交流, 2015(4):150-154.

责任编辑:罗 义

英美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封梦媛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将英美财商教育从教育政策、教育目标、课程形式和课程内容方面进行介绍和对比得出:英美两国财商教育年龄起点较早;均有完整的财商教育课程体系;都建立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共同体;两国各方积极研究制定财商教育标准的框架。对于我国的青少年财商教育开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商;财商教育;英美财商教育;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D431

文献标识码: A

为了顺应当前世界教育改革潮流,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教育家们关注的核心素养领域逐渐扩大,“财商”一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被教育界重视。“财商”是财力商数的简称,是指一种正确认识金钱、使用金钱和有效创富的能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手中有富余的钱用于除日常开销外的其他方面,如储蓄和投资。与此同时,青少年的零花钱也日益增多。理财能力成为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社会每个人都掌握的技能之一,青少年财商教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一、财商与财商教育

(一)财商

在国外,“财商”一词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由罗伯特·清崎(Robert Toru Kiyosaki)在他的著作《穷爸爸富爸爸》中提出。他指出“财商与你挣了多少钱没关系,它是测算你能留住多少钱以及能让这些钱为你工作多久指标。”^[1]“财商”是一种正确认识金钱、使用金钱和有效创富的能力,因此“财商”也被称作“财经素养”。对“财经素养”的解释,国外最常用的是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的定义:对财经概念和风险的知识和理解力,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和理解力的技能、动机和信心。使个体在各种财经情境下能作出有效决策,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利益,并能够参与经济生活。^[2]

Financial Quotient,英文直译为“金融智商”,国内一般译为“财商”。它指的是个人创造财富能力大小的量化值,由于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小不同,所以每个人的财商高低也不同。作为一种综合能力,财商可以后天挖掘和培养。财商的内涵包括观念、知识和行为三个方面:观念是指对金钱、财富及创造财富的认知过程;知识是指投资理财必不可少的知识积累,如储蓄知识、投资知识、法律知识等;行为是观念的表现载体,是观念和知识在实践中的展现,突出表现为个人在理财过程中的自我突破、自我激活、自我控制的素质和能力。^[3]

(二)财商教育

早在1982年,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就指出“财商教育就是能够让人们学会如何设立理财目标,认识个人收入基础,制定详尽的理财计划以及应用理财计划,调整理财计划,评价理财目标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封梦媛(1994-),女,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化教育、财商教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7.html

和理财过程的一系列环节。”^[4]美国学者马格特(Margart)将“财商教育”定义为“财商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更能觉察到理财机会,并感受到它们的影响,特别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积累资本的技能。”^[5]

上述定义比较准确、简明地概括了财商教育的本质。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心理学依据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背景是经济全球化,推动财商教育的主体是学校,但也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密切配合与大力支持。

二、美国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

自1982年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首次系统地提出财商教育的定义后,美国总结大量财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财商教育体系。本文将从财商教育政策、课程形式、课程内容和家庭与社会财商教育几方面剖析美国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

(一)美国中小学财商教育政策

1. 制定相关国家策略

2003年,美国国会建立了理财素养和教育委员会(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Committee, FLEC),FLEC在2004年推出了四个领域的国家策略来推进财商教育发展^[6]:

(1) 财商教育资源可获取策略

各个州、地方所提供的财商教育资源都可以获取,学习者可以高效地利用已有的财商教育资源。例如,理财素养和教育委员会设立了“管理我的钱”(www.mymoney.gov)这个网站呈现财商教育相关资料,并将网站中的资料分发给不会或不方便使用网络的人群。

(2) 财商教育资源针对性发放

上述提到的“管理我的钱”(www.mymoney.gov)网站涵盖了大量的理财信息,能够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把网站中已有的资料整理并分类分发给不同的青少年群体。

(3) 多部门共同合作

要提高全体青少年的财商水平,仅依靠联邦政府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公立与私立、私立与私立部门之间的合作在青少年财商教育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4) 研究和评价财商教育相关项目

美国想要使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来评价财商教育项目,财政部专门召集研究人员召开了座谈会,并出台工作草案。座谈会主要内容为调查当前美国财商教育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研究的潜在领域。

2. 出台相关财商教育法案

美国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都颁布了相关法案以促进中小学财商教育的发展。

联邦政府于1997年颁布了《储蓄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法案,主要内容是召开系列关于理财能力主题的相关会议^[7];2001年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该法案第一次把财商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组成部分提出^[8];2002年12月贷款事物法案第五款“提高理财能力和理财教育”中提到“成立理财素养和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青少年财商教育政策”。

田纳西州政府于2006年6月2日提出代码为SB3741/HB3753号法案,提出在公立中学普及理财素养的教育项目^[9];弗吉尼亚州政府于2005年3月提出代码为SB950Chapter741号法案,提出在初高中各个年级实行财商教育^[9];堪萨斯州于2003年7月提出《个人理财教育的发展与执行》法案,该法案要求教育委员会为个人财商教育提供指导^[9]。

(二)美国中小学财商教育目标

1944年,美国教育政策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第一次发表了关于教育需要的声明,其中包括财商教育的内容。ACE依据中小学生的年龄和身心发展规律制定了美国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具体行为目标^[6]:

3岁时,能辨认硬币、纸币;

4岁时,能知道一硬币等于几美分,明白商品的数量是无限的,因此要有消费选择;

5岁时,知道钱的来源及硬币有哪些等价物;

6岁时,能数小数目钱,能计算大量数目的硬币;

7岁时,能看懂价格标签;

8岁时,能明白可以通过兼职赚取金钱,把多余的钱存进账户;

9岁时,能制订一周消费计划,购买商品时对比价格;

10岁时,能知道节约用钱,存下的财产可供大笔必要开支使用;

11岁时,知道从电视广告中发现信息;

12岁时,能制订并执行两周消费计划,懂得并正确使用一些银行业务中的术语;

13岁时,尝试性地进行投资、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活动,能够通过打工等实践活动赚钱。

除上述具体行为目标外,美国还制定了青少年财商教育的阶段性目标:早期要学习钱的来源、各种用途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钱,意识到储蓄对未来生活的重要性;中期要了解影响人们的消费与储蓄的因素有哪些,学会提高个人理财能力;后期要掌握使用基本金融工具和服务,包括如何进行预算与储蓄。^[3]

综上,美国的财商教育目标有以下特点:一是财商教育年龄起点较早;二是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贯穿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三是目标非常明确,详细介绍了具体的经济活动;四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让儿童了解金钱概念的目标也有让儿童参与理财活动的目标。

(三)美国中小学财商教育课程

1.课程形式

美国的财商教育课程形式主要有两种^[5]:

(1)独立的财商教育课程

此种课程形式的表现方式为:将财商教育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整合进学校课程体系当中,把财商教育的相关知识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体系,与其他学科具有同等地位。

(2)财商教育与数学、阅读等课程相融合的课程

此种课程形式把财商教育内容与其他学科内容相结合,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

2.课程内容

美国政府2007年授权金融组织——跳跃开始联盟(Jumpstart Colition)发布了K-12国家教育标准,总结了往年大量学者在财商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名为《国家理财教育课程》的报告中呈现了中小学财商教育课程内容,包括收入、财政管理、消费和存款、储蓄和投资四大板块,每个板块又包含了与之相关的知识点。

表1 美国中小学财商教育课程内容^[10]

财商教育课程内容		
收入	影响收入的因素	职业选择;培训费用;教育水平
	雇佣单位的福利项目	储蓄计划;退休金;保险金;假期;股票购买;教育费用返还;奖励机制
	通过膨胀及其对购买力的影响	消费及商品的供应;消费对商品的供应及需求影响;通过膨胀对货币价值的影响
	税收的组成部分	税收的类别;个人和雇主应承担的税收责任;申报税收的各类文件
	税收消费及所带来的利益	政府的支出服务(警察、消防、学校、道路建设和社会保险等)
财政管理	个人理财方式选择和设计	-
	现行个人理财计划制定	-
	家庭财务预算	短期预算内容:储蓄和消费(衣食住行等);长期预算内容:储蓄消费(房产计划、遗嘱、保险和保健等)
	银行操作程序和服务	查账和账户储蓄;银行服务费用;支付方式;借贷、存款和自动取款机卡
	个人风险管理	健康;生活;汽车;残疾;租赁
消费和信贷	消费者经济的基本原则	存款的必要性;对比购物;采购;机会成本;信贷保险
	消费者保护和个人信息	个人职责;法律法规;欺骗、诈骗;侵权行为;租金
	消费者债务管理	信用卡的使用;信用卡成本;信贷合并;信贷产生的问题
	各种类型的信贷方式	分期付款;银行汇票;积蓄付款
	各种贷款对比	抵押;分期付款;现金支票业务;个人付款;当铺
储蓄和投资	储蓄和投资的原因	教育;紧急事故;短期目标;长期目标;退休;购房首付
	评估储蓄方式	存款证明;有息存款;个人退休账户;养老金计划;教育储蓄计划
	评估投资方式	股票与债券;基金;房产;养老金;商业投资
	其他储蓄和投资方式	应收/未收利息;货币的时间价值
	管理机构及他们的职能	联邦存款保险有限公司;有限债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财政部国家税收局

(四)美国中小学财商教育的其他形式

1.家庭教育

美国家庭很注重孩子的财商教育,并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和心理特点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关于美国家庭的财商教育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5]:一是教会孩子如何使用零花钱,学会预算;二是鼓励孩子课后兼职,靠打工赚取零花钱;

三是教会孩子如何存钱,明白存钱的意义及障碍,珍惜劳动成果;最后是模拟成人生活开支,训练孩子帮助他们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

2. 社会相关组织与机构

美国青少年财商教育不仅仅受政府重视,还得到各种金融组织的支持与指导。例如,美国各大学设立的财商教育中心,通过开展理财活动,发现和解决学校在财商教育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辅以学校财商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为财商教育的进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又如,跳跃开始联盟^[10]致力于提高美国青少年个人理财水平,并鼓励财商教育课程的开发等。

三、英国财商教育现状

英国个人理财教育组织(Personal Finance Education Group, PFEG)在2007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英国青少年在他们17岁时或在这之前就已经负债,而有三分之二(66%)的人每天都在考虑钱的问题。另外,有90%的青少年都因为他们的钱和花销而苦恼,却认为透支和信用卡是可以支付超过他们可承受能力之外的花销的简易的方式。2007年6月由英国自由民主党提出并获得全党支持的一项提议中指出,现今英国家庭的总负债额比英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大,而79%的消费者不知道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Rate, APR)是什么。^[11]

(一) 英国中小学财商教育政策

英国政府大力支持开展财商教育。议会跨党派小组(The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APPG)调查提出,个人财商教育应作为学生学校课程的必修内容。英国政府推动青少年财商教育的进行主要是通过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来实现的。

苏格兰政府要求将个人财商教育融入现有课程中。课程在关键目标中指出,青少年理财能力的培养包含于每个孩子的通识教育内容中,学校应将财商教育内容融入数学计算的教学中。

2008年,威尔士金融教育部门(Wales Financial Educational Unit, WFEU)成立,WFEU在国家学习网(National Grid For Learning, NGFL)经营者提供的教学资源的支持下,引导和建设财商教育网站促进财商教育知识在社会的传播,网站支持青少

年财商教育的区域数据库也在同步开发当中。此外,支持中小学跨学科财商教育的项目计划和相关教材的编写也在进行。

2007年,北爱尔兰引进了适用于7至16岁学生的修订版课程,在这课程中理财素养被定为法定素养。北爱尔兰教学大纲、考试与评估委员会(Northern Ireland Council for the Curriculum,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NICCE)发布了相关资料用于指导和支持修正财商教育课程。NICCE的教育工作者同300所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共同努力,给北爱尔兰中小学提供资金、项目和财商教育课程规划上的帮助。同时,在一些财商教育网站中发布了可供给一线教师的免费教育资源,包括课程指导和实践案例研究。

(二) 英国中小学财商教育目标

PFEG的组织章程中声明:“中小学的财商教育旨在让全体青少年毕业后具备处理金融事务方面所需要的自信、知识和技能,以便更完备地参与社会生活。”可见,英国中小学的财商教育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政府据此制定的青少年财商教育目标如下^[12]:

5-7岁,懂得钱的不同来源,钱可以用于多种目的;

7-11岁,学习管理自己的钱,认识到储蓄对于满足未来需求的作用;

11-14岁,懂得人们的花费和储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懂得如何提高个人理财能力;

14-16岁,学习使用一些金融工具和服务,包括如何进行预算和储蓄。

此外,苏格兰政府将中小学校财商教育目标主要划分为四大模块,^[13]每个模块都有各自的具体目标。

表2 苏格兰中小学校财商教育目标^[14]

总目标	总目标内涵	具体目标
理财理解力	理解金钱的本质、功能和用途;理解个人做出的每个理财决策的重要性	通过学习能够理解和鉴赏:金钱的本质和作用;金钱的来源;税收、支出、储蓄和投资;信用和债务;理财服务、产品和咨询服务;消费者权利、责任和保护;广告、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和媒体对个人财务的影响

理财胜任力	能自己掌握的相关理财知识运用到真实情境中	通过学习能够:保存消费记录和凭证;分析财务信息;衡量钱的价值;设计和进行预算;制定多样的财务决策
理财责任感	能够对理财活动中反映的道德、环境、经济、文化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反思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日益增强为自己负责的责任感;分析他人的理财决策对于社会的潜在影响;分析自己的理财决策对他人和社会的潜在影响
理财事业心	在虚拟情境中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对多种多样的消费方式进行评估、分析和决策;挑选最优的消费、储蓄和投资方式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评估潜在的风险和回报;以创新和自信的姿态来利用财物和其他资源;在一系列的情境中富有创造性地使用已有知识和技能

(三)英国中小学财商教育课程

1.课程形式和教学方式

英国的中小学没有采用独立授课的形式进行财商教育,而是在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中渗透财商教育的相关知识。例如,在“工艺与设计”学科课程中,老师引导学生理解供给的不同形式、比较不同材料的价格来提高学生的财商水平等。同时,学校在日常生活中为在校的中小學生开展了很多非正式活动以发展和应用他们的理财能力,^[13]如基于财经主题的项目学习、开设校内糖果店、为慈善活动募捐等。

2.课程内容

关于英国中小学财商教育的内容及其与财商教育目标的对应关系,可通过表3简要了解。

表3 英国中小学不同学段财商教育内容及其与财商教育具体目标对应关系^[15]

学段	财商教育内容	具体目标
小学阶段	钱的重要性、来源和用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使用金钱方面的道德问题;通过储蓄满足消费、借钱和负债的需求等。	5岁至7岁:懂得钱的不同来源和用途
		7岁至11岁:学习管理自己的钱,认识到储蓄对未来生活的重要性
中学阶段	学习预算、管理个人财产、处理信用问题;消费者以及雇主与雇员的权利和责任;离校生的收入来源;税务以及税收的使用方向;读懂账单及财务报告;学会储蓄和投资;不同方式获得理财建议;预测风险、购买保险等。	11岁至14岁:懂得人们的花费和储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懂得如何提高个人理财能力
		14岁至16岁:学习使用一些金融工具和服务,包括如何进行预算和储蓄

(四)英国中小学财商教育的其他形式

1.家庭教育

英国的家长与美国家长做法类似,即鼓励自己的孩子打工赚取零花钱或生活费。让孩子通过实践探索财富的本质和意义,藉此提高他们的财商水平。

2.社会相关组织和机构

2000年,英国成立“个人理财教育组织”(PEFG),现已发展为英国中小学实施个人财商教育的领导机构。其宗旨就是与教师、政府以及消费团体和金融行业共同合作帮助学习者达到较高财商水平,并给学校提供相关建议、指导及资源。

[14]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将英美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进行简要的对比,具体可参见表4。

表4 英美青少年财商教育比较

	美国青少年财商教育	英国青少年财商教育
国家政策	FLEC推出四个领域的国家策略推动财商教育发展;联邦、州政府均出台财商教育相关法案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均颁布相应政策
教育目标	财商教育起点在3岁;制定了具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财商教育起点在5岁制定了具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课程形式	独立课程;融合课程	融合课程
课程内容	包括收入、财政管理、消费和存款、储蓄和投资四大板块,每个板块包含与之相关的知识点	小学和中学阶段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相对应
家庭教育	教会孩子如何使用零花钱;鼓励孩子课后兼职;教会孩子如何存钱;模拟成人生活开支	与美国做法类似,鼓励青少年打工赚取零花钱
社会教育	有各种金融组织的支持与指导,如美国各大学设立的财商教育中心、跳跃开始联盟(Jumpstart Colition)等	英国成立“个人理财教育组织”(PEFG)与教师、政府以及消费团体和金融行业共同合作帮助学习者达到较高财商水平,并给学校提供相关建议、指导及资源

可以看出,当前英美两国在开展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做法上有一些共同点:

从财商教育的培养对象来说,英美两国注重早期财商教育。在美国,幼儿3岁时就开始接受财商教育,制定了能辨认硬币、纸币的具体行为目标。英国儿童也5岁就开始进行财商教育;从财

商教育实施主体来说,两国均建立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财商教育共同体,共同协作促进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发展;从财商教育课程体系来说,两国均拥有系统的学校课程体系,美国的财商教育课程除了像英国一样将财商教育内容与其他课程内容进行融合以外,还拥有独立的学校财商教育课程体系,将财商教育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整合进学校的课程体系当中,这样将财商教育相关的知识联结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体系,获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从国家重视程度来说,英美两国各方积极研究制定财商教育标准的框架。

英美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开展也不完全雷同,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有:

从国家政策角度看,英美两国均实行了一定的政策推动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发展。但美国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并颁布了大量法案,而英国仅仅依靠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推动青少年财商教育的进行,可以得出,英国财商教育缺乏国家高度的集中统一政策对财商教育进行管理和控制;从教育目标来看,美国的财商教育起点更早;从课程形式来看,美国青少年财商教育课程既有独立课程又有融合课程。英国财商教育课程形式只包含融合课程一种,这样不利于将财商教育以独立学科的形式与其他学科获得同等地位;从课程内容看,美国通过划分教育内容的方式青少年财商教育内容分为收入、财政管理、消费和存款、储蓄和投资四个板块。英国则是通过划分年龄段的形式,依据不同年龄的学生特点对其进行财商教育,这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和优势,具体哪种方式更有利于青少年财商水平的提升,要结合国情和当地的青少年财商水平才能作出判断。

四、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

目前中国财商教育政策、目标与内容的制定大体上是参照国外的做法,有些学校和地区甚至直接照搬国外财商教育的模式,国外的财商教育是否符合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值得探讨。

(一) 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目标与内容

国内已有学者依据我国国情厘定出了我国财商教育内容与目标框架。我国财商教育内容分为理财观念、理财知识和理财能力三大版块,依据青少年年龄特点对其进行递进教育。

表5 我国的财商教育内容和目标^[12]

	目 标	内 容	
理财观念	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为他们今后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主要包括财富观教育、义利观教育、消费观教育、劳动观教育等	幼儿园阶段	认识钱的来源和用途。识别金钱,通过金钱掌握一些人文知识,通过模拟游戏懂得等价交换原理
		小学阶段	学会赚取零花钱并知道如何使用。初步认识财、物,懂得交换、购物,学会储蓄和拥有自己的玩具、图书、文具等财物
理财知识	让中小学生学习金融理财的基本知识,其主要内容包括金钱知识教育、储蓄常识传授、消费知识教育、基础金融知识和基础经济学知识教育等	初中阶段	学会记账管好钱。掌握储蓄知识,了解通过劳动创造获取财富,树立起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理念
理财能力	这是以上两方面教育的外观,目的在于通过训练,提高中小生理财基本能力,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其主要内容包括钱币识别能力教育、合理使用钱币能力和习惯的培养,通过合法劳动赚取钱币的能力和习惯的训练、储蓄能力教育、基本投资能力训练等,以及中小学生学习思维能力、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高中阶段	学习投资如何起步。熟悉“以钱生钱”的方式,初步了解信贷、股票、基金等金融知识,培养其对经济社会的感知度
		大学阶段	开始独立掌管个人财富。控制个人消费、支出,了解基本投资理财知识,并尝试投资理财

(二) 当前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财商教育现状来看,近些年我国小学、初中思想政治课中适当增加了财商教育相关内容,但小学和初中的经济教育课程相当薄弱。^[16]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中小学生财商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参与全球竞争。当下我国财商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 中小学财商教育课程形式单一、课程内容少、课程范围窄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并没有独立的财商教育课程。在小学三年级的课程中,与财商教育相关的内容仅在“社会”学科课程中体现,主要表现在简要介绍从新中国建国到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在初中二年级的“公民教育”课程中,“公民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消费者依法享有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几部分涉及到财商教育内容;初中三年级中提到“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

济制度”的内容;我国的中小学财商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高一政治课中,内容涉及有商品和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和经营者、产业和劳动者、财政和税收、银行和储蓄等。^[17]在2004年实验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经济生活》中,基本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必修课经济生活的内容,包括生活和消费、投资与创业、收入与分配、面对市场经济等;二是选修课经济学常识的内容,包括古典经济学巨匠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走进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初期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18]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经济教育的内容少、窄、分散,且教学内容与高考以及本科课程内容挂钩不大,学生难以产生学习动力。

2. 缺乏家庭财商教育

2014年羊城晚报一期关于少儿财商意识的调查显示,在给孩子支配零花钱方面,24.1%的儿童表示自己没有零花钱,26.8%的家长表示不给孩子零花钱;当子女消费愿望与家长产生分歧时,11.6%的家长表现出专制型取向;24.7%的家长表现出权威型取向,44.9%家长表现出民主取向,还有18.8%的家长表现出放任型取向;81.3%父母肯定财商教育的价值,但他们对财商教育的本质以及如何开展家庭财商教育几乎一无所知,执行力低下;在是否愿意给孩子进行财商教育方面,虽然有50.1%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但是没有合适的方法,只有25.4%的家长对孩子进行了财商教育;在财商教育的目标方面,35.9%的家长认为财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珍惜劳动成果,24.6%的家长认为财商教育是为了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23.5%的家长认为财商教育是要培养孩子理性的消费观,6.9%的家长认为财商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形成投资观念,剩下的0.9%注重保险理念;在财商教育方法方面,65.6%的家长选择了让孩子通过实践劳动,如兼职,获取报酬,41.9%的家长选择让孩子自己支配自己的收入(压岁钱、零花钱等);34.3%的家长选择引导孩子进行简单的投资理财活动;32.1%的家长鼓励孩子参与公益活动;只有19.8%的家长选择了让孩子参加财商教育专题讲座等。^[20]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9]:

(1)我国部分家长限制甚至替代孩子的必要消费行为,轻视孩子理财能力的培养。

(2)在家庭财商教育方面,我国依然存在很大比例的放任型、专制型家长,这些培养方式均不利于孩子养成正确的理财观念。

(3)我国家长在财商教育上普遍存在着高认同、低认知、弱执行、效果差的现象。

(4)我国部分家长理财教育观较传统,对利用保险保障与投资等新型方式进行理财还不甚了解。

(5)我国部分家长仅倚重自身经验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而相对轻视专业金融理财机构和专门的财商教育课程。

3. 缺乏社会系统支持

目前,我国的教育相关部门并未提出开展中小学财商教育的明文规定,国家财政部也没有相关组织为我国青少年的财商教育提供资源和指导,因此,发达国家的财商教育与我国的财商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五、英美青少年财商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英美两国财商教育起步较早,财商教育体系较完整,且发展水平较其他国家更高。通过对英美财商教育的教育目标、相关政策、课程形式及课程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宏观把握了两国财商教育的整体脉络,可以对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得出以下启示。

(一)在中小学设立独立财商教育课程

我国目前的财商教育仅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以融合课程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应当意识到,经济学不单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也不单纯是一门学科,而是人类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决策的工具,它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多种学科都有密切联系。这种做法越来越不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美国的独立财商教育课程将财商教育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整合进学校的课程体系当中,这样将财商教育相关的知识联结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体系,获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更有利于青少年财商素养的提升。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定位当前

的教育目标,建立有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的财商教育体系。在课程发展初期,财商教育内容可以与其他课程内容相整合,但应该逐渐规划独立的目标体系与教学方案,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研究与教学。^[17]

(二) 降低财商教育年龄起点

英美两国的财商教育年龄起点都很早。美国要求儿童3岁时就要学会辨别硬币和纸币,英国要求儿童5-7岁时要懂得钱的不同来源,明白钱可以用于多种目的。为使学生从小就能正确地认识金钱,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我国中小学财商教育应从低年级开始。

(三) 发挥家庭与社会的推动作用

英美两国的青少年财商教育说明,要培养青少年的理财能力,并非学校一者之功。需要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财商教育共同体。家庭教育方面,家长不应对孩子的消费行为采取过多的干预,但也不应放任孩子擅作主张,应采用“民主型”的管理方式把控孩子的消费行为,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金钱,合理使用金钱;社会教育方面,国家应颁布相关法律或政策从宏观上调控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同时,社会的金融组织和机构可以与学校建立联系,为中小学提供财商教育资源或指导,与学校共同协作促进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发展。

综上,英美两国相对的财商教育体系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青少年财商教育的高度重视,而我国的青少年财商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要推动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发展,不仅需要从小给儿童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建立完善的学习教育体系,更需要学校、家庭与社会的相互配合,共同促进我国青少年财商教育和谐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清崎. 穷爸爸富爸爸[M]. 海口:南海出版社, 2011:19.
- [2] Atkinson, A. & Messy, F-A. Measuring Financial Literacy: Results of the OECD INFE Pilot Study [EB/OL]. http://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measuring-financial-literacy_5k9csf90fr4-en, 2012-03-26/2016-09-08.
- [3] 王赵亮, 韩宏立. 美国财商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0(1):147-148.

[4] 高佳. 美国中小学理财教育的四个发展阶段[J]. 外国教育研究, 2008(7):34.

[5] 李真. 美国中小学理财教育及课程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8.

[6] 周华薇. 美国人的少儿理财教育[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23.

[7] Carolynne LJ Mason and Richard M S Wilson. Conceptualising Financial Literacy Loughborough [J]. University Series Paper 2000(2):37.

[8] Sandra Braunstein, Carolyn Welch. Financial Literacy: An Overview of Practice, Research and Policy [EB/OL].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bulletin/2012/11021lead.pdf>.

[9] The bills issued by the American State Government [EB/OL]. http://www.jumpstart.org/state_legislation/index.cfm.

[10] National Curriculum in K-12 Personal Finance Education, Jumps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EB/OL]. <http://www.jumpstartcoalition.org/>

[11] Liz Ford. Government urged to provide student finance lessons. Wednesday June 20, 2007 <http://education.guardian.co.uk/schools/story/0,,2107330,00.html>.

[12] 洪明. 国内外儿童理财教育研究概要[J]. 少年儿童研究, 2010(19):16-17.

[13] 叶菊艳. 苏格兰5-18岁儿童学校理财教育实践及其启示[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07(2):62-63.

[14] Scottish Consultative Council on the Curriculum (1999). Financial Education in Scottish Schools: A Statement of Position [EB/OL]. http://www.ltscotland.org.uk/financial_education/images/financialstatement_tcm4-121478.pdf, 2006-08-19.

[15] 黄丽. 英国中小学经济素养教育初探[J]. 普教研究, 2008(3):38.

[16] 刘丽湘, 赖德胜, 裴秀芳. 当前中小学经济教育的现状及实施建议[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19):25.

[17] 徐丽群. 俄罗斯中小学经济教育研究[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05.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 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试行)[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19] 程行欢. 帮孩子理财更要教孩子理财[N]. 羊城晚报, 2014-05-09.

责任编辑:钟晓红

谷歌翻译与百度翻译APP的功能 三维度之比较

涂正正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基于百度翻译与谷歌翻译APP功能特点,试从软件语料库容量、翻译质量、操作的易用性三维度对二者进行功能对比分析,百度翻译与谷歌翻译各有千秋,谷歌翻译以长句中译英为特色,而百度翻译则以短句翻译及文本英译中为亮点。通过对谷歌翻译与百度翻译APP的功能对比,为用户今后选择翻译软件提供参考。

关键词:谷歌翻译;百度翻译;三维度;功能比较

中图分类号: TP391.2

文献标识码: A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翻译软件作为帮助人们消除“语障”的工具,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使用,目前国内市场上有许多翻译软件,如灵格斯翻译、Babylon、百度翻译、谷歌翻译和金山词霸等。面对种类繁多的翻译软件,用户们往往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翻译软件,所以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翻译软件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解决选择翻译软件的困惑,从而提升用户语言学习的效率,更好地发挥翻译软件的应用价值。

一、国内外翻译软件现状分析

广义上来说,翻译软件就是计算机上辅助人们进行翻译的所有工具,包括文字处理、语法检查工具等。^[1]狭义上来说,它“专门指的是为提高翻译效率的设计的翻译软件或者在线翻译软件。”^[2]下文提到的翻译软件是狭义上的。

翻译软件的研究与探索虽然已有数十年,但翻译效果却不尽人意。事实上,机器翻译的真正目的是让计算机来帮助人类完成某些翻译工作,

而不是让它完全替代人的翻译工作。早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记忆工具就已经出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被开发和应用。随后,国内外翻译软件不断涌现,为越来越多的用户了解和使用。

(一)国外著名翻译软件

国外较为著名的翻译软件有Lingoes(灵格斯)和Babylon(巴比伦)。灵格斯是一款简明易用的词典与文本翻译软件,支持全球超过80多种语言翻译的词典,具有查询、全文翻译、屏幕取词、划词翻译、例句搜索、网络释义和真人语音朗读功能。灵格斯在各方面的功能表现都比较抢眼,特别是对于专业词汇和小语种的支持。如果用户需要小语种翻译软件,或者需要进行专业词汇的翻译工作,可以选择使用灵格斯。而巴比伦则是以色列一个非常优秀的、支持多国语言互译的免费翻译软件,它提供了超过10种语言之间的两两翻译。近几年来巴比伦和灵格斯的发展速度较快,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涂正正(1994-),女,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化教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8.html

先后都推出了中文版。由于它们使用免费、便捷,且功能强大,成为了众多学习者的新宠,也推动了国外翻译软件研究的发展。

(二)国内翻译软件发展现状

国内翻译软件研发起步较晚,1998年国外CAT软件进入国内翻译市场,我国在借鉴国外翻译软件技术的基础上,陆续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翻译软件。我国现有的翻译软件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词典翻译软件,词典翻译软件是我国翻译软件领域中出现较早的一种翻译软件,我们所熟悉的电子词典便是词典翻译软件最早的应用形式,这种翻译软件的核心技术就是把原来词典的词汇存储到计算机中。用户只要输入源单词,就会出现对应的目标单词以及标准的发音,比利用传统词典来学习单词更为方便有效。另一种是支持文本全文翻译的全文翻译软件,“全文翻译”^[3]是指整个翻译过程都由翻译软件完成,不需要用户的插手,尽管全文翻译软件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多方便,但也会出现一系列如句法、语序混乱,中式翻译等问题。因此,用户不能完全依赖翻译软件,只能将其作为辅助工具。

二、百度与谷歌APP的功能介绍

百度翻译和谷歌翻译是我们日常使用较为频繁的两种免费翻译软件,都有各自的PC版和手机APP版。其翻译本质都是将源语本转换为目标语本,其目的都是帮助广大用户消除语言障碍,提供高质量的语种翻译服务。两种翻译软件APP的主要功能如下:

(一)百度翻译功能介绍

百度翻译于2011年7月初正式推出Web端,2013年2月正式推出手机客户端。百度翻译支持28种热门语言之间的互译,既支持离线翻译功能,无需联网即可查看专业词典释义,又覆盖500万云端词条,用户联网也可查看网络释义。不仅如此,百度翻译还拥有独特的语音识别功能及拍照翻译功能,包括实物翻译、菜单翻译等实用功能(详见图1),无需输入,拍照或对准单词即可获得译文。



图1 百度翻译小应用界面

除上述提到的基本功能外,百度翻译还提供多种常用场景的双语例句,支持离线发音并提供百度翻译独家整理编辑的双语文章、视频、音频内容,丰富阅读体验。如图2。



图2 百度翻译拓展阅读界面

(二)谷歌翻译功能介绍

谷歌翻译软件提供102种语种之间的互译,拥有海量的词汇库并于2015年1月推出即时语音翻译功能(见图3),除了语音翻译功能之外,谷歌公司于14日推出摄像头取词功能(见图4),但仅限于水平拍摄的角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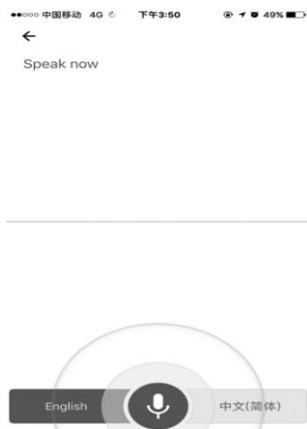


图3 谷歌语音翻译界面



图4 谷歌摄像头取词界面

总之,百度翻译APP与谷歌翻译APP是两款集翻译、词典、海量例句于一身的移动应用,能够便捷的满足用户的翻译需求,是我们生活、旅游、学习不可或缺的帮手。

三、百度翻译与谷歌翻译APP的功能比较

百度翻译与谷歌翻译APP的比较维度有两种取向。一种取向是从软件的操作层面考虑,如早期的BEOHM质量模型认为软件质量应从软件的易用性、可维护性和可移植性来评价。或者ISO9126质量模型,从软件的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效率、可维护性、可移植性^[4]6个方面来考虑软件质量。这两个模型都考虑到了软件的易用性、可维护性以及可移植性。

另一种取向倾向于从其内部翻译系统比较。作为翻译软件,百度与谷歌翻译APP都是由翻译记忆系统、术语管理系统、对齐工具系统三个模块构成。^[5]翻译记忆系统是翻译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存储资源(词汇句法等)以达到匹配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本的目的。翻译记忆库中存储的内容越多,则翻译的可重复使用率越高,术语管理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创建、维护和管理各种术语,存储的主要是术语词汇或短语。术语管理系统里拥有着各个专业领域中的专业术语,并且术语管理系统中术语还提供及时更新的服务,术语的准确性、丰富性是衡量翻译质量好坏的一项重要指标。这两个系统都与软件的语料库建设有关。对齐系统的主要作用是让用户将已经完成的翻译文本进行对齐处理。经过对其处理的翻译文

本会比没有处理的更好。

结合软件操作层面的比较维度,需要考虑软件的易用性,主要考察其界面布局、取词方式、特色功能等;结合软件内部翻译系统的比较维度,翻译记忆系统和术语库可以归为软件的语料库容量,对齐工具关系着软件的翻译质量。所以从语料库容量、翻译质量、操作的易用性三个维度对两个APP进行比较,以使用户之后根据需求的选择翻译软件,其中,对软件内部翻译系统的比较是重点。

(一)维度一:语料库容量对比

语料库包括词库容量和翻译语种支持量。首先,词库容量是衡量翻译软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倘若软件词库的容量太小会影响翻译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对于翻译软件来说,词库的容量越大,其翻译的准确度也会相应的提高。据了解,谷歌和百度翻译都拥有着上万余的词库并且通过在线升级或者安装词汇资源包可以来扩充词汇。所以两者的词库容量都很丰富。其次是翻译语种支持数量,语种支持是衡量翻译质量的另外一个指标,翻译语种支持的数量越多,翻译结果的概括面就越广。谷歌翻译提供102种语言互译功能,其语种支持量在众多软件中都是最多的。而百度翻译的语种支持数量则不及谷歌翻译,它仅提供28种语言互译功能。另外,百度翻译提供中英、中日、中韩、以及相关的语音包(需要收费)。谷歌翻译提供英语、世界语、中文、丹麦、乌克兰、俄语、保加利亚语、克罗地亚语、冰岛语等多达五十种语言的离线数据包。因此,从语料库容量这一维度来看,谷歌翻译略胜一筹。

(二)维度二:翻译质量比较

1. 单词和文本翻译质量

在评测一项翻译软件时,高水准的翻译质量是用户使用翻译软件的最终目的,单词和文本翻译质量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以下从单词释义丰富度、扩展度及文本的翻译质量三个方面来比较这两种翻译软件的单词和文本翻译质量。

(1) 单词释义的丰富度

当我们对某个单词进行翻译的时候,可能会

由于单词本身的多词性或者多意义而出现一词多义、一词多性的现象,而单词释义的丰富度是指要考虑到单词的不同词性的不同含义。以输入源单词“heavy”为例,谷歌翻译得到的结果比较简单,只有形容词“重”,以及其相关词“大:big,large,great,majority,heavy”等等。这种释义有利于理解与拓展单词积累。但是,百度翻译得到的结果相对丰富,有形容词、名词和副词,并且每个单词底下都有两个以上的含义,另外词意底下还有单词的复数形式,比较级与最高级。可见百度翻译在单词释义的丰富度上比谷歌更加全面化,百度翻译还注明了该单词属于高考、CET4、考研单词范畴,更适合中国学生与面向中国市场。

(2) 释义的扩展度

释义扩展度的测试主要是在翻译软件中手工输入单词进行翻译,并由此查看释义的内容,在此还是以“heavy”为例来看看翻译软件的扩展释义。很明显在谷歌翻译中仅仅是局限在简单的单词翻译功能上,对增加了单词的其他含义的近义词,但没有进行任何的例句说明,而百度翻译中除了丰富的单词释义外,还给出了每个词性常见含义的例句,比如形容词“重的”,情境例句就有30条。另外还有各种词典(牛津、柯林斯)对该单词的解释与例句。这对于想学习外语的用户来说,百度翻译额外功能有非常大的帮助。百度翻译比谷歌翻译在单词释义的丰富与拓展度上都表现更好。

(3) 文本翻译质量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的双语转换,即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6]转换的主要性能指标是它的有效性,有效性是指目的语在编码过程中要保留与原文同样多的信息量和保留原文的信息重心。“信息翻译强调的是信息和意义的传递,它要求打破语言的外壳取出其实质。因此,句法作为语言的外壳应彻底抛开。信息与语言此时就像商品与包装的关系”。^[7]所以,合格的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实现译文信息的完整性。下面,用几个具体例子来对比百度与谷歌的中译英与英译中文本翻译质量。

1) 中译英长句翻译表现

原文:法国数据保护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今日宣布,将对 Facebook 处以 15 万欧元(约合 16.6 万元美元)的罚款。

谷歌翻译:French data protection agency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Freedom Committee" announced today that it will be on Facebook to 150,000 euros (about 16.6 million) fine.

百度翻译:The French data protection agency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Freedom Committee" announced today, will be fined 150 thousand euros for Facebook (\$166 thousand) fine.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原文用中文习惯对两句话进行了断句:“…今日宣布,将对…”。谷歌翻译在这里把后半句变成了从句用了一个 That 引导,从而将第一句改成了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长句。而百度翻译在这里还是按照中文的断句,对英文进行了同样的断句,属于中式翻译,不符合英文翻译的逻辑规律。因此,谷歌翻译相对于百度翻译来说,翻译出的文本更地道自然。

2) 中译英短句表现

如下利用两个短句进行比较:

A. 老师喜欢花儿

百度:The teacher likes flowers.

谷歌:Teachers like flowers.

两个翻译软件在翻译时除了动词的单复数不同,翻译没有什么区别。

B. 洪荒之力(网络热词)

百度:I have give my full play.

谷歌:Prehistoric force.

洪荒之力是指用尽了全力,可见百度翻译比较贴切,而谷歌仅仅是把词语直译出来,并没有表达出“洪荒之力”的原意。实际上,不仅“洪荒之力”,绝大多数流行网络用语,谷歌都无法正确识别翻译,很显然谷歌翻译在短句翻译时的本土化水平不及百度翻译。

通过上述对比,可见百度翻译在短句中译英上处理比谷歌准确,而谷歌则在长句的中译英处理上比百度准确。

3) 英译中文本质量对比

“You have weighed the pros and cons and carefully assessed the impact. After in-depth consideration, you have decided to accept that new job, or launch your own business, or take time off to be with your children. You know it's the right choice — but your bos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ren't convinced. What should you do when people you respect disagree with your decisions?”

谷歌的英译中结果比百度出现了更多问题。比如原句中“or take time off to be with your children”。这里的最佳翻译应是:或者抽出时间陪陪孩子。

百度翻译:或者抽出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

谷歌翻译:或者与您的孩子一起休息。

再比如原句中:“What should you do when people you respect disagree with your decisions?”这里应该译作:当你尊重的人不同意你的决定时,你该怎么做?

百度翻译:当你尊重的人不同意你的决定时,你应该怎么做?

谷歌翻译:当你尊重不同意你的决定时,你应该怎么办?

可以看到英译中谷歌翻译还是不够准确的,经常会遇到句子不通顺,结构不对的问题。相比之下,百度翻译的翻译结果更加注重译文的规范和流畅。

软件翻译需要借用加减词法、拆句与合句法等手段,同时也需借助词性、语态、时态及肯定与否定句等句法结构的转换技巧。百度翻译在运用上述翻译技巧上,在词性转换和词序调换方面完成的比谷歌翻译好,在增词和减词方面两者都表现一般,而在融合简单句、拆分复合句的技巧方面都表现较差。

(三) 维度三:操作的易用性比较

1. 使用界面

使用界面是用户打开软件的第一印象,其简明性与实用性直接影响着用户的使用体验。百度与谷歌翻译在界面的设计上存在细微的差别,最

上方都是翻译界面,只需要输入相应的源文本,点击“翻译”就会出现相应的目标文本。谷歌翻译底部是三个功能标—翻译、加星、设置(见右图6),而百度翻译底部的功能图标更多,支持查看情景例句和词典(见左图5)。可见二者的使用界面都比较简明。



图5 百度翻译界面



图6 谷歌翻译界面

2. 取词方式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翻译软件开发的也相对较为成熟,翻译软件中所涉及的取词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手动输入以外,还有摄像头取词与语音识别功能。

(1) 语音识别

谷歌翻译的语音录入非常准确,且支持中英文语音混合输入。百度翻译的语音识别水平则明显低于谷歌翻译,其语音识别的准确度低、识别过程繁琐而且不支持中英文语音混合输入。

(2) 摄像头取词

百度翻译支持多种拍照翻译模式(实物翻译、涂抹翻译、取词翻译、整屏翻译和菜单翻译),如实物翻译只需要用摄像头对准实物拍摄,百度翻译即可识别该物体并给出翻译结果。采用涂抹翻译时,用户只需用指腹在屏幕上涂抹需要翻译的文本,软件就会识别文本并提供相应的翻译结果。谷歌翻译在 Android2.5 版新增摄像头取词功能,但其摄像头取词功能较为单一,仅局限于水平拍摄。因此,不论是从摄像头取词类型的多少还是从其准确度来考虑都是不及百度翻译。

在取词方式上,谷歌和百度翻译都具备摄像

头取词和语音识别的功能,但也是各有千秋,谷歌语音识别功能胜于百度,而百度的摄像头取词功能胜于谷歌。

3. 特色功能

谷歌由于刚进入中国市场,其特色的功能并不多。百度的拍照翻译提供长句、菜单、实物翻译,其关键词检索十分实用,为其增色不少。

经过上述对比,可见百度翻译和谷歌翻译各有所长。百度翻译的单词丰富度、扩展度高并且中译英短句翻译及英译中文本翻译质量高;而谷歌翻译中译英长句翻译更为准确。因此,长句中译英使用谷歌翻译更佳,而短句翻译以及英译中文本翻译使用百度翻译更佳。(详见表1)

表1 百度翻译与谷歌翻译功能比较

维度	百度翻译	谷歌翻译
语料库容量	词库容量大;语种支持数量较多(28种);单词的扩展度、丰富度高	词库容量大;语种支持数量多(103种);单词的扩展度、丰富度一般
翻译质量	中译英短句翻译更为准确;英译中文本翻译质量高	中译英长句翻译更为准确;英译中文本翻译质量较差
操作的易用性	简易性强;拍照取词方式多样、准确;语音识别一般;特色功能较多(关键词检索等)	简易性强;拍照取词方式单一;语音识别准确;特色功能较少

四、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收集数据、例证、列表等方法,系统地比较了百度翻译APP和谷歌翻译APP在语料库容量、翻译质量、操作的易用性三个维度上的优缺点。在语料库容量上,谷歌翻译语种支持数量

远多于百度翻译;在翻译质量上,百度翻译擅长短句的中译英,谷歌擅长长句的中译英;在操作的易用性上,百度翻译的特色功能比谷歌多,且拍照识别技术优于谷歌,但谷歌在语音上的识别性更强。

综上,虽然两个APP从上述三维度来说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并且作为英语翻译软件,它们在翻译的准确性上相对人工翻译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存在,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的思考。用户要做的就是明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当的翻译软件“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 [1] Bowker, L.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2.
- [2] 徐彬, 郭红梅, 国晓立. 世纪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J]. 山东外语教学, 2007(4): 79.
- [3] 徐波, 史晓东, 刘群, 等. 2005统计机器翻译研讨班技巧报告[J]. 中文信息学报, 2006(5): 2.
- [4] 朱玉彬, 陈晓倩. 国内外四种常见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比较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1): 69-70.
- [5] 陈宁. 浅谈英语翻译软件的开发与应用[J]. 电子测试, 2013(7): 276.
- [6] 黄海英, 冯剑军. 英汉专业翻译软件质量的人工测评[J]. 中国科技翻译, 2008(21): 21.
- [7] 刘春燕. 论科技文体的翻译原则与方法[J]. 中国科技翻译, 2004(3): 13.

责任编辑: 钟晓红

中部地区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评价

阚大学

(南昌工程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9)

摘要:基于中部地区本科高校数据,运用DEA方法对其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整体来看,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较低,不理想,技术效率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原因主要在于规模收益递减,科研产出水平较低。分省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综合效率依次是山西、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和安徽,技术效率依次是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规模效率依次是山西、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据此,各省和未达到DEA有效的高校均需要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改进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

关键词:中部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前,如何提高高校科研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国外学者关于高校科研效率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高校或各院系科研效率,更多是关于自然科学院系,极少有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的研究^{[1][2]}。国内学者对高校科研效率的研究则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以全国高校为研究对象进行科研效率分析。二是分析单个高校、院系或学科科研效率。三是以各个不同地区高校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四是将高校分成不同类型来研究各类型高校科研效率^{[3][4]}。这些文献也较少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姜彤彤(2013)、陈俊生等(2015)、黄炜和程慧平(2016)、程慧平(2016)等人的研究^{[5][6][7][8]}。二是分类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如徐超(2015)、李瑛和任裙楠(2016)等人的分析^{[9][10]}。综观这些文献发现,对不同地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的科研效率研究过少,对单个省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及其差异几乎没有关注。本文将中部地区本科高校为样本,运用DEA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进行评价,并分省进一步探讨,以了解中部地区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绩效的全貌,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为中部地区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正确地评价本省各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效率,合理配置不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资源提供实证依据。

一、指标设计、学校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科研效率指标设计

限于现有统计数据的获取情况,选择以下指标来衡量中部地区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投入产出,具体如表1所示,投入指标为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当年拨入额,产出指标为课题数、著作数、学术论文篇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获奖成果数、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

[收稿日期]2017-11-18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规划重点项目(17ZD060)

[作者简介]阚大学(1982-),男,安徽合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经济。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49.html

表1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投入指标	研发人员(人)
	研发经费当年拨入(万元)
产出指标	课题(项)
	著作(部)
	学术论文(篇)
	研究与咨询报告(份)
	获奖成果(项)
	获国家与省部级奖(项)

(二) 学校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是对中部地区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进行研究,而民办本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院系更多是以教学为主,而非科研,对科研效率的重视力度普遍不够。故将研究对象定位为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鉴于指标数据可得性与时效性,选取样本时间为2016年。2016年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共176所,山西19所,安徽30所,江西23所,河南36所,湖北36所,湖南32所。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给出的2016年统计数据中并未给出中部地区所有公办本科高校数据,如2016年中没有长治医学院相关数据,故评价分析时不予考虑。最后,统计资料中缺乏大部分军事警察类院校相关数据,分析时只包括警察类院校。

二、中部地区各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

(一) 综合效率分析

运用软件DEAP2.1计算发现,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14所,分别为太原师范学院、运城学院、太原学院、山西能源学院、景德镇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长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中南民族大学,约占总数的7.955%。这表明,整体来看,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较低,不理想。在162所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高校中,江西理工大学、宜春学院等32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

率在0.1以下的院校,亟待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这些非DEA有效的高校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理工类、艺术类、师范类、农林类、医学类、军事警察类、财经类所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985高校、211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与此同时,14所DEA有效的高校中,也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主要是师范类、理工类、民族类、医学类高校)和综合性高校,也有985高校、211高校和其他公办本科高校。这表明综合效率是否DEA有效与学校类型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计算结果可知,导致有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如太原理工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49所高校。其中太原理工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93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DEA有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56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还有导致有些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完全在于其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如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12所高校。计算发现,导致规模效率无效的原因几乎均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减,只有太原工业学院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增。另只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完全在于其技术效率非DEA有效。

(二) 技术效率分析

依据计算结果,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26所,约占总数的14.77%,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且在非DEA有效的高校中,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在150所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非DEA有效的高校中,师范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医学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低,其他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居于上述两类高校中间。原因可能在于师范类高校往往既有理学,也有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

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这些高校近年来纷纷加强了其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弱势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建设,使得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分配增加,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间竞争更加激烈,促使技术效率提高。而医学类高校是以医学为主见长的非常专业类高校,近年也发展了人文社会科学,如江西中医药大学,该校就有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这些学科往往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实力相对较弱,正在引进高学历高级职称人才,目前正谋求和该类高校医学、药学学科相结合,走特色发展之路。再者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学科发展中分配资源有限,不受重视,研发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欠佳,致使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较低。最后,该类高校可能将人文社会科学定位于服务医学学科发展,定位于服务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全面发展,并没有给予学科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三)规模效率分析

计算发现,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达到 DEA 有效的是 15 所,占 8.52%,剩下的 161 所规模效率非 DEA 有效的高校中太原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160 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非 DEA 有效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减,只有太原工业学院 1 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增。进一步从松弛变量和剩余变量的角度考查这 161 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原因,结果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中部地区太原理工大学、南昌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 101 所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安徽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75 所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因为它们的研究人员松弛变量都为 0,这说明导致它们规模效率非 DEA 有效的原因之一并不在于研发人员过多,而是相对既定研发人员投入来说产出少了。中部地区华东交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 10 所公办本科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太原理工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166 所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因为它们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松弛变量都为 0,这表明导致它们规模效率非 DEA 有效的原因之一并不在于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过多,而是相对既定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来说产出少了。同时发现,整体来看,6 个产出指标中,著作数是影响它们未能达到 DEA 有效的最大因素,因为 77 所高校该指标松弛变量大于 0,其他指标松弛变量大于 0 的高校数均小于著作数指标,其中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大于 0 的高校数为 0。因此,该指标不是影响上述高校未能达到 DEA 有效的因素,其它影响较大的指标则依次是论文数、课题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获奖成果数。

从横向来看,中部地区山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湖北大学等 34 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太原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昌大学等 77 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太原理工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 52 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山西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等 30 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山西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 27 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获奖成果数。因此,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非 DEA 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产出水平较低,这为它们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中部地区各省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

(一)综合效率分析

首先,就山西省而言,计算发现,山西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达到 DEA 有效

的有4所,分别为太原师范学院、运城学院、太原学院、山西能源学院,约占山西公办本科高校总数的21.05%。这表明,整体来看,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不高。在15所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山西高校中,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211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与此同时,4所DEA有效的高校中,也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和综合性高校,但均为其他公办本科高校。依据计算结果发现,导致山西15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相比之下,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DEA有效,太原工业学院、山西农业大学等7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而山西财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完全在于其规模效率非DEA有效。

其次,就安徽省而言,安徽省没有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且除安徽师范大学外,其他28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较低,均小于0.5,其中26所高校小于0.2。这表明,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很不理想。在29所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安徽高校中,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985高校、211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计算发现,安徽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17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DEA有效,淮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2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

第三,就江西省而言,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的仅1所,是景德镇学院,其他22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综合效率均小于0.5,其中15所高校小于0.2。这表明,整体来看,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令人堪忧。在综合效

率非DEA有效的江西高校中,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211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计算发现,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赣南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DEA有效,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7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而江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完全在于其规模效率非DEA有效。

第四,就河南省而言,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3所,分别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约占河南公办本科高校总数的8.33%,其他33所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均为DEA无效,其中23所综合效率低于0.4,11所综合效率低于0.2。说明整体来看,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不高。在33所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河南高校中,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211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与此同时,3所DEA有效的高校中,均为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属于其他公办本科高校。计算发现,平顶山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15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DEA有效,南阳师范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等11所高校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DEA有效,而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7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完全在于其规模效率非DEA有效。

第五,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6所,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长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中南民族大学,约占湖北公办本科高校总数的16.67%。其他30所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均为DEA无效,其中28所综合效率低于0.5,13所综合效率低于0.2。说明整体来看,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不高。在 30 所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湖北高校中,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 985 高校、211 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与此同时,6 所 DEA 有效的高校中,也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和综合性高校,既有 985 高校、211 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计算发现,湖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 17 所高校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 DEA 有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等 12 所高校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 DEA 有效,而武汉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江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原因完全在于其规模效率非 DEA 有效。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原因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非 DEA 有效各承担一半责任。

第六,就湖南省而言,湖南省没有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达到 DEA 有效,且除吉首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其他 30 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较低,均小于 0.4,其中 24 所高校小于 0.2。表明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很不理想。在 32 所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湖南高校中,既有传统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也有综合性高校,既有 985 高校、211 高校,也有其他公办本科高校。计算发现,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 24 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非 DEA 有效,吉首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等 7 所高校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非 DEA 有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非 DEA 有效的原因则完全在于其技术效率非 DEA 有效。

最后,从表 2 可知,各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依次是山西、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和安徽。即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最大,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最小。但显然中部地区六省的公办本科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均小于 0.5,且综合效率是否 DEA 有效与六省高校类型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中部地区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整体远未达到 DEA 有效,中部地区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偏低,不理想,亟需提高。

表 2 中部地区六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相对有效性测度结果

省份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山西	0.410	0.652	0.599
安徽	0.152	0.382	0.376
江西	0.226	0.537	0.443
河南	0.381	0.696	0.551
湖北	0.390	0.651	0.558
湖南	0.180	0.563	0.346

(二)技术效率分析

首先,计算结果显示,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达到 DEA 有效的有 5 所,约占总数的 26.32%,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且在非 DEA 有效的 14 所山西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但其中有 8 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低于 0.5,说明山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较低,不理想。在技术效率非 DEA 有效的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中,大部分综合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低,原因可能在于山西这些综合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投入不多,但学科种类较多,分给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往往难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其次,计算发现,安徽公办本科高校没有 1 所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达到 DEA 有效,和综合效率、规模效率的情况相同,且在非 DEA 有效的 30 所安徽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但其中有 24 所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低于 0.5,说明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很不理想。其中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非常低的多是理工类或医学类高校,原因可能在于这两类高校均是非常专业的高校,这些高校发展的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

社会科学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整体实力较弱,难以引进人才,也难以和自身优势特色学科相结合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在两类高校学科发展中一般处于弱势,科研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调动起来,且两类高校可能将人文社会科学定位服务于自身优势特色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全面发展,在两类高校中往往难以受重视,获取科研资源有限,致使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较低。

第三,依据计算结果,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2所,约占总数的8.70%,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且在非DEA有效的21所江西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但其中有11所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低于0.5,说明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较低。在技术效率非DEA有效的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中,理工类和医学类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低,这和安徽省情况类似。

第四,计算发现,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10所,约占总数的27.78%,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且在非DEA有效的26所河南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但其中有10所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低于0.5,说明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较低。在技术效率非DEA有效的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中,大部分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低。

第五,计算结果显示,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9所,约占总数的25%,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且在非DEA有效的27所湖北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但其中有12所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低于0.5,说明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还不高,不理想。在技术效率非DEA有效的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低的大多是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

第六,计算发现,所有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技术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与综合效率情况相同,且在非DEA有效的32所湖南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普遍高于综合效率,但其中有11所湖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低于0.5,说明湖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很不理想。在技术效率非DEA有效的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中,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相对较低的主要是理工类和医学类等以某类学科见长的高校,这与安徽省和江西省情况类似。

最后,从表2可知,各省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依次是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即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最大,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最小。中部地区六省的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均低于0.7,均高于各自省份的规模效率,但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技术效率整体未达到DEA有效,说明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提高科研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

(三)规模效率分析

首先,依据计算结果,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是4所,占21.05%,剩下的15所规模效率非DEA有效的公办本科高校中,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14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非DEA有效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减,占93.33%。只有太原工业学院1所高校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增,占6.67%。进一步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11所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山西财经大学、吕梁学院、太原工业学院等8所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因为它们的研发人员松弛变量都为0,这说明导致山西部分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之一并不在于研发人员过多,而是相对既定研发人员投入来说产出少了。山西传媒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则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其他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因为它们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松弛变量都为0,这表明导致它们规模效率非DEA有效的原因之一并不在于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过多,而是相对既定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来说产出少了。同时发现,整体来看,影响山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依次是论文数、著作数、课题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获奖成果数,而山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均为0,因此,该指标不是影响山西高校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从横向来看,山西高校中山西师范大学、长治学院等4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等6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8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山西师范大学和山西传媒学院等2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山西大学、忻州师范学院等2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获奖成果数。

其次,计算发现,所有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30所安徽高校是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原因是规模收益递减。进一步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15所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安徽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5所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淮北师范大学和合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则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其他安徽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同时发现,整体来看,影响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依次是著作数、论文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课题数、获奖成果数,而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均为0,因此,该指标不是影响安徽高校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从横向来看,安徽高校

中安徽财经大学、皖南医学院等3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1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6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安徽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5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3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获奖成果数。

第三,计算发现,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有1所,22所高校规模效率是非DEA有效,原因是规模收益递减。进一步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南昌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18所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5所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则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其他江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同时发现,整体来看,影响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依次是著作数、课题数、论文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而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数和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均为0,因此,这两个指标不是影响江西高校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从横向来看,江西高校中江西财经大学、萍乡学院等5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南昌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10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等5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4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

第四,计算结果显示,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是3所,占8.33%,33所高校是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原因是

规模收益递减。进一步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20所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16所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和河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则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其他河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同时发现,整体来看,影响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依次是课题数、著作数、论文数、获奖成果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而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均为0,因此,该指标不是影响河南高校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从横向来看,河南高校中郑州轻工业学院、新乡医学院等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2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周口师范学院、黄淮学院等4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获奖成果数。

第五,依据计算结果,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达到DEA有效的是6所,占16.67%,30所是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原因是规模收益递减。进一步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等15所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21所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湖北师范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则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其他湖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同时发现,整体来看,影响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依次是著作数、论

文数、课题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获奖成果数,而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均为0,因此,该指标不是影响湖北高校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从横向来看,湖北高校中武汉纺织大学、湖北大学等10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13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13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武汉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纺织大学等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获奖成果数。

最后,计算发现,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达到DEA有效的仅1所,31所是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原因是规模收益递减。进一步发现,在产出不减少的情况下,湘潭大学、中南大学等22所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需要减少研发人员,而湖南大学、吉首大学等10所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发人员。湖南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则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而其他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均不需要减少研究与发展经费当年拨入。同时发现,整体来看,影响湖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依次是著作数、论文数、获奖成果数、研究与咨询报告数、课题数,而湖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获国家与省部级奖数松弛变量均为0,因此,该指标不是影响湖南高校未能达到DEA有效的因素。从横向来看,湖南高校中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长沙医学院等3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立项课题数,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20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出版著作数,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11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发表论文数,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8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

定投入下应增加研究与咨询报告数,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9所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既定投入下应增加获奖成果数。

最后,从表2可知,各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依次是山西、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即山西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最大,湖南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最小。中部地区六省的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均低于0.6,均低于各自省份的技术效率,且中部地区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模效率整体也未达到DEA有效,主要原因在于非DEA有效的各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投入的产出水平较低,这为各省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中部地区本科高校2016年数据,运用DEA方法对这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整体来看,中部地区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水平较低,不理想,技术效率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情况要好,规模效率非DEA有效原因主要在于规模收益递减,科研产出水平较低。分省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六省公办本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综合效率依次是山西、湖北、河南、江西、湖南和安徽,技术效率依次是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规模效率依次是山西、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

依据上述结论,中部地区各省和未达到DEA有效的高校均需要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改进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而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投入的技术效率具体表现为投入要素配置是否合理,科研投入规模效率主要是指科研产出规模是否达到最佳状态,这均取决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水平,故需要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

作的管理。首先,加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才梯队建设规划管理,建立学历、职称、年龄、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通过引进与培养有机结合,提高科研学术水平。其次,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与惩罚制度,形成科研氛围,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最后,完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资源配置方式,需建立基于科研效率的资源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 [1] Brennan S, Haelermans C, Ruggiero J.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education productivity incorporating nondiscretionary input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utch school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234(3):809-818.
- [2] Kuah C T, Wong K Y.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universities through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1, 3(1):499-506.
- [3] 王洪礼, 贾岳. 基于SFA和DEA的高校综合投资学科的科研效率评价[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306-309.
- [4] 梁文艳, 袁玉芝, 胡咏梅. 研究型大学自然科学学科科研生产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两阶段模型[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4(10):70-76.
- [5] 姜彤彤. 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全要素生产率评价及分析[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3, 25(5):90-97.
- [6] 陈俊生, 周平, 张明妍.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评价[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12):44-46.
- [7] 黄炜, 程慧平.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学位论文产出的效率研究[J]. 情报杂志, 2016(4):137-140.
- [8] 程慧平.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效率及收敛性研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16(3):82-87.
- [9] 徐超. 基于SFA模型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效率评价研究[J]. 科技与经济, 2015(3):16-19.
- [10] 李瑛, 任裙楠.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评价研究[J]. 科研管理, 2016(4):571-577.

责任编辑: 罗 义

大学生气质类型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刘华,曾九江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6)

摘要:依据心理学气质类型理论,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大学生气质类型对其就业能力及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将积极的职业干预前延至高校学生就读期间等对策,以期帮助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现状下实现职业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气质类型;就业影响;职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1. 气质的定义与类型

“气质”一词在《辞源》中的释义为人的心理和生理等素质,犹言风骨、风格^[1];在《辞海》中有如下释义:人在进行心理活动时或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强度、速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等动态性的人格心理特征。气质的决定和影响因素有遗传因素,也有人的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影响^[2],后者更为重要。

由此可知,气质是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禀赋经后天努力雕琢、锤炼、再塑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个性特点。这一稳定的心理个性特点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及行动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形态各异风格气度。当接触到亲密的人或是陌生人群,有的人始终热情自如,有的人一贯沉稳内敛,不同的人有所差异。

已有气质类型理论将人类的气质类型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等四种及以此四种气质类型为基础形成的混合型气质类型。

胆汁质气质类型,也称作不可抑制型气质,在

与外界的交流沟通中或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周遭的人交往交流时体现出让人温暖的直率和热情。通常做事积极主动,高压环境下仍能精力旺盛,但持续性欠佳,控制情绪能力也是弱项。因此,胆汁质气质类型的人就业时容易得到用人单位和招聘人员的青睐,更适合做主持人、导游等相对挑战性比较大的工作。

多血质气质类型,即活泼气质类型。观察能力及应变能力强,对工作的适应性强,善于人际交往^[3]。但受挫能力相对弱,遇到较大困难或挑战时易退缩和放弃。这种类型适合的职业范围较为广泛,新闻工作者、人力资源管理者、律师等创新性、灵活性的工作均比较合适。

粘液质气质类型,也叫做安静型气质。在工作和生活中无论是面对众人的赞扬还是别人的诋毁,都能宠辱不惊、稳重和踏实,自制力强。但人际交往的灵活性,突发事件处理能力都较相对较低^[3]。由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可以严格遵守各项工作要求和规章制度,适合从事文员、秘书、图书管理员等细致、程序化的职业^[3]。

[收稿日期]2017-11-12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13GL19)

[作者简介]刘华(1978-),女,江西南昌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酒店管理。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50.html

抑郁质气质类型,在大多时候表现为性格内敛,感情细腻,多愁善感。与人相处平和,但不擅长人际交往^[3]。此类型的人更适合做文字处理、报社编辑、美术类等需要细心和耐心的相关工作。

在现实的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属于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混合气质类型的混合体。本质上看气质类型无所谓好与坏,只是不同气质类型的人群对同一种职业会出现适合程度不同。而气质类型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教育与社会影响,则充分说明气质具有后天的可塑性,可以针对性进行培养,趋利避害。

2. 问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近年,应届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攀升,2017年国内大学毕业生人数逼近800万人。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国家出台创新创业等系列政策积极引导大学生群体重视就业问题。高等院校则更应重视,引导大学生结合专业技能与自身气质类型选择适合的、展示优势的、提升自身价值的职业方向^[4],以实现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如若大学生在校阶段及明确自己的气质类型特点,有的放矢寻找最佳职业方向,无疑对解决大学生“难就业、乱就业、不就业”这一突出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大学生就读期间可以分析把握自己的气质类型,结合自己的职业梦想做出调整方向的判断,并有计划地实现调整目标。

正确判断与认识自己的气质类型,是及时发现、正确认识自身个性及心理品质的不足之处的前提。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及学校教育通常普遍重视学业成绩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个性心理及性格特征的养成^[5]。

这意味着在大学生入学之前普遍不清楚自身的气质类型,在这一阶段做出与今后就业、从业密切相关的气质类型分析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并科学进行分析。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帮助大学生主观上保持积极有益的性格品质,干预、改造已有的

消极性格品质。

(2)大学生可以将自身个性化的气质表现与向往的职业理想相联系,增强自身职业选择的的目的性。

从我国对发达城市大学生就业情况统计及比对中发现:近五年内,应届大学生在毕业一年内更换工作或改行的比率逐年升高。虽然仅凭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得出应届毕业生工作稳定性较差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说明相当部分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后并未找到明确的职业方向。

产生这一现象的源头存在于高考填报志愿时的盲目性,或者听从家长的建议,或者跟从其他同学的选择,亦或者由于对某学科老师的崇拜而选定了报考专业,在大学阶段又由于不够感兴趣而不能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才智去学习,于是临近毕业,学业不精加之对自己认知不清,就出现了职业稳定性较差的普遍现象^[6]。频繁地辞职、找工作、再辞职、再找工作,极易陷入否定用人单位、责任感缺失或自我否定、盲目悲观的怪圈之中。

若在校就读阶段明确了自身的气质类型,更有目标地选择职业类型,那么毕业到稳定就业的周期将会明显缩短,跳槽率降低,用人单位对应届毕业生评价也会趋向正向。

(3)对自我气质类型的清晰认知有助于双向人才选择,实现人尽其才。

用人单位与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的过程中,被招聘人员对提供岗位的职业适应性有明确了解,那么进入职业环境的都将是拥有职业热情的。对员工而言,爱岗敬业,自我满意度高,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有为有位,劳动效率提升。

相反,如果双向选择时没有足够考虑到这些因素,比如胆汁质气质类型为主的人担任办公室文员,工作热情可能更易忽高忽低,加上急躁、粗枝大叶,用人单位的工作效率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用人单位在聘用人员之前,充分了解应聘大学生的气质类型,不仅是对有效提高企业的工作

效率有很大的帮助,也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实现双赢。

二、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

学术界目前关于高校大学生气质类的理论研究较多本文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分析被试的气质类型特点,并结合专业、性别等因素,期望找出气质类型对就业倾向和就业能力的影响,反证应将气质类型判定过程前延至大学生入学及就读阶段。

1. 被试选取及分析研究过程

笔者随机选取了南昌市3所综合性高校的大学生为调查样本,依据理论对大学生气质类型进行分析,结合就业倾向进行实证分析,筛选有效样本数据获得不同专业类别、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气质类型的分布规律,再选取就业范围与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的文科专业大学生为被试,了解不同气质类型的大学生在职业取向倾向性的差异,得出应前延大学生自我气质类型认定,提高就业质量及成功率的研究结论。

2. 方法与工具

在大量阅读了学术界关于气质类型相关文献及专著,选取了盖伦的“四种气质类型”理论和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的“人格维度理论”中测定人格内外向的E维度和情绪稳定性的N维度理论作为此次实证分析的理论依据,结合《艾森克人格问卷》,实际调查大学生气质类型与就业倾向,获得大学生气质类型与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数据。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

笔者随机在我省某高校校园内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总计35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90份,问卷调查对象男生148人,女生142人,其中文科类专业的调查问卷数为100份,理科类专业调查问卷为97份,医科类专业调查问卷93份。下面对问卷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分析:

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中问卷中E量表是内外向性量表,N量表是神经质,即情绪稳定性量表。本次调查选用上述两个量表用于对大学生气质类型的测定。

具体数据如下所示:

表1 气质类型评定表

N量表T分数	E量表T分数		
	T<43.3	43.3<T<56.7	T>56.7
T>56.7	抑郁质	胆汁-抑郁质	胆汁质
43.3<T<56.7	粘液-抑郁质	多种气质混合型	多血-胆汁质
T<43.3	粘液质	多血-粘液质	多血质

表2 290名大学生气质类型分布

气质类型	多血质	胆汁质	粘液质	抑郁质	多血-胆汁质	多血-粘液质	粘液-抑郁质	胆汁-抑郁质	多种气质混合型
人数(%)	17.93	7.24	2.07	5.17	21.03	12.41	4.48	10.34	19.31

表3 290名大学生气质特性的分布

人数(%)	内外倾性			情绪稳定性		
	外倾性	中间性	内倾性	稳定性	中间性	不稳定性
	45.52	42.41	12.07	31.03	45.52	23.45

表4 不同专业大学生气质类型的人数分布比例(%)及其比较

	多血质	胆汁质	粘液质	抑郁质	多血-胆汁质	多血-粘液质	粘液-抑郁质	胆汁-抑郁质	多种气质混合型
文科	16	4	3	6	23	12	7	12	17
理科	15.46	3.09	1.03	5.15	19.59	10.3	4.12	11.34	29.89
医科	22.58	15.05	2.15	4.3	20.43	15.05	2.15	7.52	10.75

表5 男女大学生气质类型人数分布比例(%)及其比较

	多血质	胆汁质	粘液质	抑郁质	多血-胆汁质	多血-抑郁质	粘液-抑郁质	胆汁-抑郁质	多种气质混合型
男生	15.54	6.75	1.35	6.08	20.27	13.51	6.08	9.46	20.95
女生	20.42	7.75	2.82	4.23	21.83	11.27	2.82	11.27	17.61

表6 文科专业大学生就业取向表(%)

气质类型选择职业	多血质	胆汁质	粘液质	抑郁质	多血-胆汁质	多血-粘液质	粘液-抑郁质	其他复合气质类型
文学艺术类(如传媒、文学评论等)	10.88	10.86	11.80	27.45	8.55	18.67	24.89	12.5
管理类(如项目经理、行政助理等)	22.50	26.78	19.66	13.55	26.36	19.58	12.55	28.57
技能型(如摄影师、调查分析师等)	17.48	15.89	16.50	16.67	14.55	14.55	17.70	10.71
研究型(如高校教师等)	9.00	9.67	25.89	18.87	16.46	13.55	19.65	8.93
社交型(如公关、销售人员等)	26.77	25.50	12.56	9.99	22.55	23.70	8.66	26.78
其他	13.37	11.3	13.59	13.47	11.53	9.95	16.55	12.5

1. 分析结论

(1)根据表二抽样调查结果可知,在290名随机抽取的大学生中,复合气质类型中属于多血-胆汁质类型的人数最多,占到了总人数的21.03%,单一气质类型中多血质的人数最多,占到了样本总数的17.93%,粘液质气质类型的样本人数最少,仅仅占被调查总数的2.07%。

(2)结合表二与表四的调查结果我们不难看出:现实中大学生的气质类型确实与理论分析一致,多数为混合型气质类型,高达样本总数67.57%,组合方式多种多样;同时,气质类型不以专业划分,无论其学习文科、理科或医科,普遍呈现出一种气质类型或者是同时具有两种气质类型相结合的特点。

(3)表三为参与问卷调查样本中E量表和N量表中T分数的分布人数,突出不同气质类型大学生在内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倾向。根据表三我们知道,具有外倾性的大学生数量最多,占到了被调查总数的45.52%,具有内倾性的大学生数量占比较小,占被调查总数的12.07%,具有外倾性的大学生数量明显多于具有内倾性的大学生数量;样本中情绪稳定的样本数占到了被调查总数的31.03%,情绪不稳定的样本数占到了被调查总

数的23.45%,具有稳定情绪的大学生数量多于情绪不稳定性的大学生数量,但数量差距并不显著。

(4)表四是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气质类型分布及比较,我们根据表四内容可知,无论文科、理科或医科专业大学生,各种气质类型都具备。以多血质气质类型为例,文科学生占被调查总数的16%,理科专业占被调查总数的15.46%,医科专业占被调查总数的22.58%。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学习文科的大学生气质类型数量与理科专业、医科专业的大学生气质类型数量上相差不多,即并无明显差距。

(5)表五对290名大学生中大学生气质类型人数按男女性别比例分布做了归纳。据表五可知,具有粘液质气质类型的男大学生数量占被调查总数的1.35%,具有粘液质气质类型的女生人数占被调查总数的2.47%。对男女大学生气质类型分布进行归纳和分析后可知,男女大学生在各种气质类型占比数量接近持平,男女大学生气质类型归属方面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男女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女学生大多因行为自觉受到更少的行为干预和行为矫正,加之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对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关注度与培养路径差异不大,

女学生和男学生面临同样的学习与竞争环境,传统观念中简单地认定男生比女生更外向,女生比男生更文静与调查的实际结果并不相符。

(6)表六中数据说明各种气质类型的大学生在管理类和社交型的就业人数占比都较高。管理类职业中,胆汁质复合型学生人数更多,粘液质从事研究型工作比例较高。不同气质类型一定程度上影响择业类型。

由上,我们得出结论:我国高校中超半数以上大学生拥有复合型气质类型,文、理科及医科等不同专业类型与大学生气质类型变化不直接相关,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气质类型人数分布相对均衡,即大学生气质类型与专业文理医、性别没有显性相关。不同气质类型一定程度上影响择业类型。

2.根据研究结论得出引导大学生明晰气质类型,提前做好择业就业准备的对策。

多数人具有复合型气质类型不仅意味着现代大学生中大多数人性兼具内外向,与就业影响直接相关的是由于气质类型的复合型导致大多数大学生存在对自身气质类型特点认识不清的问题。即自我认知不清晰,进而带来择业方向不明确、就业能力弱化等问题。

(1)明晰气质类型,减少择业盲目性。

大学生各种气质类型虽然在各类职业中均有分布,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大学生们的择业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在严峻的就业供需环境下,积极前延大学生自身气质类型判定,引导大学生提前对自身气质类型形成相对清晰、准确的认知,提前对不利于择业与就业的因素作出干预,实现最优择业。

(2)明晰气质类型,提升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大学生的自我控制与管理能力、社会交际与人际交往能力及智力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大学生自身的气质类型对他们培养和具备这些能力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所以,要提高应届大学毕业生稳定就业能力,需要大学生有意识地依据自身气质类型做出积极干预与改造。

综上所述,不同气质类型的大学生有不同的职业适应性,不同气质类型制约着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大学生在大学就读阶段自觉分析测试自身气质类型,给自己足够时间干预、调整与完善,提前明确职业方向,提前进行有利的职业选择,提前做出能够发挥自我优势的职业规划,减少择业盲目性,提升步入社会的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 [1]辞源(1-4合订本)[G].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0922.
-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G].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763.
- [3]胡高喜,林丽桦,曾祚莹,叶翔鹏.大学生气质类型与职业选择关系探讨[J].价值工程,2016(6):256-257.
- [4]李璟璐.大学生专业类型对就业预期和毕业意向的影响[J].社会心理科学,2010(7):816-819.
- [5]张凯,吴海庆,张希海.大学生气质类型与就业指导[J].商场现代化,2011(13):99-100.
- [6]周振华,李燕.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气质类型的关系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6):114-115.

责任编辑:邱美玲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情感教育对策

王永保, 许静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宿迁经贸分院, 江苏 宿迁 223600)

摘要:选取江苏省连云港市和宿迁市五所五年制高职校两个年级的“留守学生”,作为样本,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进行测量,并作统计分析、讨论。提出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教育对策:学校坚持以学为本,完善留守学生人格,广泛开展体育、文艺等兴趣爱好活动,教育留守学生善于应对学习压力,提高自尊水平,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和体验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情感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变迁,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能力把子女带到城市随自己生活,而是将孩子留在农村、乡镇,成为留守学生。据调查,这些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大多生活在“单亲”家庭、隔代家庭里等,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等,在外打工的父母常常无法及时关注、呵护到。而这些留守学生,由于情感的缺失,必将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本文试从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在情感教育应对方面进行探讨。

一、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实证调查研究

主观幸福感指人们根据自定的评价标准,对自身的生活质量和情感所作的总体性的评估与心理体验,划分为认知和情感两个成分,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是衡量

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本研究选取了江苏省连云港市三所学校和宿迁市两所学校五年制高职校“留守学生”,共274名(见表1)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对他们进行测量。“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定式型测量工具,用来评价个体对幸福的感受。该量表共有33个项目,包含6个维度,分别是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总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1]。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段建华修订后的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版)作为测量工具。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生源地			年级			
男	女	县城	乡镇	农村	一	二	三	四
105	169	32	56	186	78	54	83	59

[收稿日期]2017-12-26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D/2016/03/77)

[作者简介]王永保(1965-),男,江苏连云港市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11.G4.20180309.1724.051.html

研究程序是: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主观幸福感因素及情感状况按照统一指导语要求,利用晚自习时间,对被试进行了追踪访谈。收回问卷后,进行整理并录入数据,使用调查结果如下: 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对部分留守学生

1.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对照组的差异检验(M±SD)

表2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与对照组的差异检验(M±SD)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	对生活满足和兴趣	忧郁或愉快的心情	对情感和行为控制	松弛和紧张	主观幸福感(总分)
留守学生	14.48±2.55	13.66±3.24	17.12±1.57	30.95±5.12	16.87±2.23	16.19±3.55	109.14±11.85
对照组	14.87±2.43	13.08±3.34	17.67±1.68	31.03±5.20	17.00±2.43	16.67±3.52	125.12±11.43
t	1.02	0.92	1.43	0.82	0.86	2.04	3.56**

注:**p<0.01

2.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表3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M±SD)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	对生活满足和兴趣	忧郁或愉快的心情	对情感和行为控制	松弛和紧张	主观幸福感(总分)
男	14.34±2.89	13.59±1.69	17.34±1.87	30.56±5.45	16.67±2.23	16.80±4.21	109.45±13.23
女	14.35±2.46	13.64±3.04	17.57±1.65	30.68±4.89	16.89±2.19	15.89±3.57	109.12±11.52
t	-1.15	0.41	-0.12	-1.01*	-0.14	2.83**	0.27*

注:Vp<0.05;**p<0.01

3.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生源地上的方差分析

表4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在生源地上的方差分析(M±SD)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	对生活满足和兴趣	忧郁或愉快的心情	对情感和行为控制	松弛和紧张	主观幸福感(总分)
县城	14.50±2.42	12.97±3.03	17.15±1.67	30.55±5.41	16.88±2.39	15.84±3.69	107.54±12.56
乡镇	14.87±2.46	13.58±2.89	17.12±1.58	31.22±4.34	16.79±2.23	15.89±3.24	109.23±10.20
农村	14.34±2.45	13.68±3.23	17.34±1.69	30.69±5.27	16.93±2.13	15.39±3.63	109.65±12.22
F	0.29	3.97*	0.991	0.46	0.07	1.70	1.22

注:*p<0.05

4.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年级上的方差分析

表5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M±SD)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	对生活满足和兴趣	忧郁或愉快的心情	对情感和行为控制	松弛和紧张	主观幸福感(总分)
一年级	14.23±2.76	13.54±2.89	17.21±1.71	30.91±4.91	16.58±2.21	16.45±3.23	109.30±10.89
二年级	14.61±2.72	13.73±3.22	17.67±1.70	30.65±5.23	17.42±1.79	15.28±3.56	108.61±11.77
三年级	14.23±2.31	13.41±3.12	17.40±1.59	31.67±4.68	17.21±2.23	16.23±3.48	109.87±10.78
四年级	13.23±2.65	13.78±3.30	17.31±1.87	30.46±5.73	16.81±2.34	16.81±4.03	109.20±13.76
F	4.53**	0.89	0.72	1.21	4.26**	4.94**	0.28

注:①**p<0.01;②五年级学生外出实习。

二、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初步分析

1.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对照组的差异检验

通过表2可看出,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平均分为109.14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142.7分^[2],他们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健康状况,对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意,表明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中等偏低,但大部分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有愉悦的情绪和较好的精力。

在整体上,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对照组(非留守学生)。在各因素上,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上显著低于非留守学生;在精力上高于非留守学生;在对健康的担心上差异不显著。

2.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3可知,五年制高职留守男生主观幸福感总分显著高于女生($t=0.27^*$)。五年制高职留守男生在愉快或忧郁的心境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女生($t=1.01^*$),而五年制高职留守男生在紧张与松弛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2.82^{**}$),说明得分越高越愉快。这可能是由于女留守学生在体力和精力方面不如男留守学生,且其多愁善感、心思细腻、情感丰富,女留守学生在宿舍人际关系比男留守学生的复杂程度高,情感上的波动比男留守学生都更加强烈,心理处于调节失衡、不满现状之中,女留守学生常出现自卑感。

3.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生源地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4可知,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不同生源地上总体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家在县城、乡镇、农村三者相比,家在县城留守学生得分最低。家在农村留守学生在精力这一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家在县城和乡镇留守学生。家在县城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最低且精力较差,可能原因是,家在县城留守学生的教育水平、家庭生

活条件、环境比乡镇和家在农村留守学生优越很多,但不满的感受和内心失落会更加强烈,因此其主观幸福感自然较低。

4. 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5可知,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不同年级主观幸福感总分没有显著差异。但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在对健康的担心、松弛与紧张、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在对健康的担心维度上,一年级的留守学生与三、四的留守学生相比得分显著高,二年级的留守学生与四年级的留守学生相比得分显著高,说明三、四年级的留守学生更加担心自己的健康;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在松弛与紧张维度上,二年级留守学生与其他三个年级留守学生相比得分显著低;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在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上,二年级的留守学生与一、四年级的留守学生相比显著高,得分越高,说明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控制得越好。研究表明,二年级留守学生显得更加紧张,比一、四的留守学生更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感,其主观幸福感最低。

三、学校情感教育的价值

国内最早研究情感教育问题的学者朱小蔓教授认为,“情感教育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性的教育形式”,“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追求某种情感性教育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作为教育意识、教育思想渗透于诸育之中”,她更关注的是“为什么和如何把情感作为人的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而对其施以教育的力量”^[3]。所以,“情感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它关注教育过程中学生的态度、情绪、情感以及信念,包括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以及他们的自尊。人际关系和社交技能被认为是情感教育的核心”^[3]。

在欧洲,通过对各种各样的情感教育表述的综合基础上,情感教育研究组织就情感教育给出了一个比较折衷的定义:“情感教育是与认知教育紧密关联的,以促进学生的态度、信念、自尊、情绪

等情感素质发展和人际关系能力、社会适应性技巧形成归依的教育过程。”^[4]他们认为,“情感教育的目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培养学生自尊素质,主要包括自我价值、自信、自我概念、自我效能等方面的内容;二是促进学生的情绪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情绪能力是指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调控能力,社会能力是指一个人的社会沟通、交往、处置问题与合作等方面的能力。这两种能力主要包括自我认识、自我调节、动机、感情移入、社会技巧等方面的内容”^[4]。总之,“情感不仅是学习的动力源,决定着学生的学习动机、对知识的兴趣、对挫折的化解等,而且决定着学生存在的价值,影响着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高低”。^[4]因此,学校开展情感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学校情感教育对策

结合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心理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学校情感教育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坚持以学为主,完善人格,体验主观幸福感

在教育教学中,引导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以学为主,唤起积极情绪、情感,用心塑造完美人格。首先,对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实行分层管理,分类引导。要根据不同年级留守学生存在的不同问题,有的放矢,引导其成人成才,增强其主观幸福感。如,对刚入学的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加强心理适应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三、四年级留守学生强化专业理论和实践学习,尤其是实训操作练习,加强对四、五年级留守学生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就业指导。其次,教育五年制留守学生妥善处理好学习、生活的关系,减少或避免不满因素,张扬积极因素,从而产生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学生作为情感教育的承受者,是情感教育的主体。由于五年制留守学生处于不稳定的人格阶段,心理发展尚不成熟,遇到困境不能顺利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还不能正确地面对消极情绪、情感。情绪上表现为易出现波动,情感上易变化,各种消极的情绪、情感问题如抑郁、孤独、紧张、不安全感、焦虑、自卑感等,

这些消极的情绪、情感会导致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降低。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情绪、情感发展的特点,帮助留守学生控制情绪情感,学会自我调节,分析自我,接纳自我,从而增加主观幸福感。

(二)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主观幸福感的体验

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是增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学校教育应该帮助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开设相关人际关系的课程,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理念,让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掌握交往技术,提高交往水平,进而在交往中获得情感支撑。同时,加强五年制高职学生会及班级干部的管理,让留守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以学年为单位进行轮换,让留守学生尽可能更多感受到生活在一个互相关爱的团体之中,服务同学,结交朋友,忘却琐事烦恼,缓解紧张和压力,进而提高留守学生幸福感的体验。

(三)应对学习压力,增强学生主观幸福感

“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呈中等程度的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5]。“学习压力是个体面对学习时所产生的异常反应,是人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是机体的内部状态,是一种强烈的生理和情绪上的唤醒压力”,“采取积极、主动学习应对压力的学生,幸福感指数较高,而采取消极、被动学习应对压力的学生,主观幸福感指数相反较低”^[5]。应对方式对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有较大的影响。留守学生学习压力源包括: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课程又分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理论课和实训课等;面对课程多、要求高、难度大,特别是信息传媒学、电子科学学等,发展速度快,更新周期短,对学生素质的要求高,使部分留守学生较难适应。学校应根据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特点,转变被动学习习惯,鼓励文科如商贸系留守学生多接触社会,参加社会实践,理科如机电系多在实训室,锻炼技能等。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要培养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其从而达到缓解学习压力的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各种考试是五年高职留守学生面临压力的重要因素。首先学校让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理解学习的内在价值和意义,端正学习目的,把学习和将来就业、未来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提高学习积极性。其次,根据各专业的具体情况,改革考试的形式和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制订合理的测评标准,设定比较具体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等。如,闭卷与开卷、测试与作业、平时练习与期中期末相结合,各占比重不同。这样,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寓考、测于乐。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以此来减轻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学习压力,增强主观幸福感。

(四)广泛开展体育、文艺等兴趣爱好活动,增强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

学校应科学规划,具体指导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南京师范大学王晶等研究证明,“运动锻炼对学生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6]。学校可开设体育选修课,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比赛、展示等,让每一个留守学生都有自己喜欢的锻炼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等比赛,体操、啦啦操等展示,使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融于其中,乐在其中。这样既营造了体育锻炼活动氛围,增强了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体质,又提高主观幸福感。

有研究认为,“兴趣爱好广泛的学生比几乎无兴趣爱好的更幸福。良性音乐有助于缓解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紧张、忧郁、焦虑等不良心理状态”^[7]。学校可根据自身条件,开设音乐赏析、美术写生、象棋围棋、读书吧等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满足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兴趣爱好,陶冶情操,缓解生活、学习中的压力,从而获取持续快乐的能力,提高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

(五)提高自尊水平,增强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

在学校的日常教育中,通过提高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自尊,改善留守学生自我评价的方式

来提高主观幸福感。自尊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有满足了对学生作为人的尊重,情感教育才能促进认知活动的发生”^[8]。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有的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期望值过高,目标往往大而空,一时无法或难于实现,这就必然给他们带来挫折感,使得他们自尊心受挫。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应尊重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引导留守学生了解自己、把握自己、分析自己,制定目标,并针对每个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情感发展的年龄、性别等心理特征,把握好留守学生自尊的标准,制定并逐步实施目标,增强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

同时,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处,可建立针对五年制高职留守学生的电子情感档案,通过在线的情感咨询及留守学生表现状况,跟踪记录他们情感的变化及发展状况,及时帮助他们排遣消极的学习生活情绪情感,激发其积极的情绪情感,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生活质量,进而提升其自尊水平,增强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83-86.
- [2]段建华.总体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4(1):56-57.
- [3]朱小曼.情感教育论纲[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
- [4]丁饰宏.英国学校情感教育探析[J].教育探索,2003(11):94-96.
- [5]杨海荣,石国兴.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12(6):416-419.
- [6]王晶,蔡厚德.在宁六所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 [7]付文宇,刘冰.商洛市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5):743-746.
- [8]洪宝玲,刘丽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高校培养策略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0(2):58-59.

责任编辑:邱美玲